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001

前 言 004

高如松精神永存 序一 009

如松光辉照千秋 序二 011

鄂北赤子高如松 001

一、充满激进的学生时代 002

二、只身投入鄂北革命运动 009

三、领导谷城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023

四、辗转南京，寻找党的组织 037

五、坚持不懈地领导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047

六、几经生死，回到党的怀抱 073

附：

一、有关高如松情况的片断回忆 110

二、董副主席办公室给高如松同志的一封信 114

三、高如松《我的一段经历》 115

四、高如松年谱 142

五、对父亲高如松的回忆片断 150

六、难忘的关怀 183

贺《鄂北赤子高如松》出版 189

跋 189

后 记 192

写在前面的话

高 军

我与张璞同志是在 2021 年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在南湖宾馆举行建党百年两书首发式上认识的。我读过他写的《红九军传》和《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及《襄枣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觉得他是个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同志。所以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专门约他和市史志研究中心梁发双同志到家里谈及父亲高如松的事情，并把绍文妈妈多年前想为父亲高如松写传的事情谈给他们听。

那是 1973 年春，我受单位委派到东北的佳木斯调查抗战老干部王又春的历史问题，顺便看望父亲和绍文妈妈。父亲那时身体已很羸弱，靠在藤椅上，显得十分羸瘦。他问我来北京做什么，我说是单位派来搞外调的，顺便来看看您。我知道他是怕我专门来看他，耽误工作。父亲见是这样，便说：“搞外调是件严肃的事情，万不能凭个人感情，要多听同志的意见。”我说：“是的，走时领导也交待过。”父亲又和我谈了许多，最多的还是怎样做人做事，说不要怕吃苦，怕受冤枉，受委屈。后谈了些他在谷城闹革命所吃的苦头等。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几乎没有半点虚伪，处处事事都

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这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他去世后，我很少到北京。还是1992年6月我调到市水利局后到北戴河学习，去北京看望绍文妈妈。这时绍文妈妈已处于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问：“有人为如松写传吗？”我说：“暂时没有。”绍文妈妈说：“你父亲风风雨雨一辈子，为了找党，吃的不是苦，我听了就流泪。一定要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做个念事。”我拉着绍文妈妈的手说：“放心，政府会考虑的。”不久，绍文妈妈撒手人寰，这件事情便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发双同志听后，很是感慨，当即推荐张璞同志来写。张璞同志没有推辞，只是说手里有关如松资料太少。我便把我这些年积累的资料给了他，梁发双同志也想办法提供了一些资料，后我又在微信中常与张璞交流，补充有关于父亲的资料。7月起，张璞同志便正式开始了《鄂北赤子高如松》的写作。

为弄清父亲大革命时期那些根根绊绊，我多次到省市档案馆、省农运所及硚口区查找资料，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时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热情接待，这使我尤为感动。父亲离任襄阳行署专员到武汉后，即任武汉市委企业书记兼硚口区委书记，硚口区志也有记载，我特复印了一份交给了张璞同志。张璞同志很是实事求是，写完初稿后拿给我看，我认真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觉到脉络十分清晰，就像是一条完整的父亲走过的足迹，而且没有虚构，全是实事实写，这让我们全家都感到欣慰。可以说，这就是我母亲和绍文妈妈及我们全家期望看到的

如松传记，它不仅真实记录了父亲大革命时期为党奔波的背景及过程，而且对有关事件的记述用前后比照和他人证词方式，还原了历史真相。如龚春林被杀事件，这是父亲当年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到北京时，父亲曾提及此事，为此摇过头，《鄂北赤子高如松》中所写与父亲所说完全相符。父亲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从没有一点虚伪。他从担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至任谷城县委书记，多次主动让位与人，而且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从没闹过个人情绪，对党始终如一，这是我们作为后人感到最为敬重的一点。父亲恩爱分明，知恩图报。曾搭救过他的郭洪昌（襄城区泥嘴人，现襄城区卧龙镇人），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我到北京时，父亲曾嘱我找到他，要感谢这个人。后我遵嘱找到了郭，那时我在三道河管理局，月薪二十多块钱，我接郭到我家玩了很长时间，并用很多方式给予报答，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当然，还有很多同志在与父亲一起战斗时都帮过父亲，像韩化龙、李明友、赵歧周、李金铭、傅春泉和李亚声、赵彬贞夫妇等，我和家人都没有忘记，至今还与这些烈士的后代有交往。我相信，这些烈士之后看到《鄂北赤子高如松》后一定和我一样高兴，愿父亲高如松在天之灵也为之欣慰，他不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好好做人，继承烈士遗志，为建设美丽襄阳竭尽绵薄之力！

高军
辛丑年冬写

前 言

高如松同志是鄂北苏区创始人之一，襄阳和谷城党史很早就有介绍。20世纪80年代初期，谷城党史部门组织专班对高如松的革命活动情况进行了搜集，出版了《高风亮节 如松长青》等有关高如松的传略，这些便是我写《鄂北赤子高如松》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为什么要写《鄂北赤子高如松》，主要是想完成高如松妻子谢绍文的遗愿，用高如松的长子高军老人的话说，就是想用出书的形式为高如松立个传，留给后人珍藏。当老人向我谈了他的意图，尤其是梁发双同志推荐我来写高如松的传后，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对高如松的生平并不是很熟，尤其是手里拥有的资料，不足以写出一部高如松的书来。本想退却，高军老人却认准了我，这叫我骑虎难下。怎么办？一个80多岁的革命前辈真诚邀请，我不能就这么让老人失望。于是，我只好答应等搜集好资料后再说。

从2021年7月起，我正式开始了搜集高如松生平资料。其间，高如松的孙子高威武提醒我，说高如松在延安的同事姚家栋曾写过《陈云在延安》回忆录（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其中谈到了高如松到延安抗大后的有关学习情况。我当即从网上搜索，购买了这本书

(1995年出版，刘家栋曾任陈云秘书)，发现书中确实提及了高如松。接下来，我又购买了很多资料，其中有张光年回忆录、李实同志的回忆录、傅伯绩的回忆录及李澄清的回忆录。重要的是，高军老人还向我提供了亲身经历蕪山革命斗争和盛暴动的李晓葛的手写稿，我如获至宝，连续三天逐字打印，其中有关高如松之情节可谓壮观。为此，本书中引用李晓葛的回忆录最多。为了防止遗漏，我反复查阅了《鄂豫边斗争史》《谷城革命史》《襄阳斗争史》及《宜城革命史》，将其中涉及高如松的内容一一摘抄下来。如《襄阳革命史》中记载有高如松离任襄阳宣传部长到谷城任职的过程，高如松是先到汉北组织李自修等开会，部署罢农民武装事宜后才到的谷城，而不是直接到的谷城；《宜城革命史》记载有高如松1930年春从南京回来后与赵英等到王家集传达特委指示，准备暴动的情节，另外还有高如松遭到谷城伪政府通缉后到王家集避难的过程。这些在过去的一些传略中都没有载入。

于是，我决定细读现有的史料（包括手稿），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尽量完整地呈现高如松在国民党重重围攻之下那种顽强、忠贞而不屈的形象。

在写作中我还发现，高如松作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民主理想在青少年时代就逐渐形成。早在1924年初，高如松就在董曦轸的引荐下，与萧楚女晤面。后高如松革命热情倍增，与董振、李金铭等引导襄樊学生运动正式转向反帝国主义之革命斗争。那时日货、英

货、美货充斥中国市场，为激起国人的爱国情绪，高如松不顾自己安危，带领学生会成员发传单，抵制仇货，可见其爱国热情何等炽烈。1926年2月，高如松接替谢远定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后对襄阳党团特支进行改组，成立了襄阳党团特支干事会；1927年7月，中共襄阳县委成立，高如松任襄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农民协会负责人；10月，高如松任谷城县委书记，与枣阳人余益庵、李金铭及宜城人胡培洲等陆续到谷城参加和领导谷城农民革命运动，筹建薤山农民协会事宜。自此，他开始发动群众力量，把“大刀会”“红枪会”组织成农民武装，正式开展以武装为主要性质的群众斗争；高如松先后领导和参与了盛暴动、茨河暴动、石花暴动和谷城暴动等重大行动，以至于被敌人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在避难过程中，他对党至死不渝、忠贞不贰，无论条件如何残酷，都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1930年初夏，他回到谷城续任谷城县委书记，其间，他革命意志不减，先后到均房与纪大纲、李民权进行联系，组建农民武装，伺机暴动；从均房回后，又与姜步赢联系，说服姜步赢把新发展的游击队与傅春泉的游击队合并，组建成一支红军游击队；到太平店与肖元凯等一起策划了太平店暴动事宜；与李陶庵在薤山脚下秘密发展游击队，至1931年初，队员发展到30多人。同时，他还把当铺、三官庙、庙滩三支游击队拉上薤山，合并成一支70多人、30多条枪的游击队。1932年，当鄂北革命斗争处于危

难关头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与朱佑文、王振三一起商定建立了襄阳道委，为襄阳革命斗争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直到1936年春，高如松历尽艰难曲折找到江西上饶，好不容易找到韩采芹（韩化龙，中共鄂北交通总站站长）和赵歧周（襄阳人，曾任鄂豫边枪炮厂厂长）。此时，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高如松病倒，韩采芹（韩化龙）把他送到开封南关让爱人王新陆进行照护。直到1937年夏，他方大病初愈。由于他找党心切，日夜托人打听，在武汉活动的李荣群（文彬）终于来信告诉他，武汉已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正在招收工作人员。他听说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在李荣群（文彬）的引荐下，他幸运地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被董老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

从1940年起，高如松开始参加中央组织部开展的基本理论学习，他抓住时机，珍惜点滴时间，搞好自己的学习。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很快得到提高。在此期间，他一直在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等同志身边工作，能经常听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尤其是1942年他参加了党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和1945年中央党校的学习，使他的领导能力和政治素质得到大步提高。之后的他，无论在何地工作，身上都带有延安时期的那种良好作风。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延安抽调一大批优秀干部奔赴内蒙古、东北等地作解放区的发展建设工作。1945年冬，高如松被派到热河林西县任县委书记

记，1946年又任热河赤峰市委书记及南穆陵县县长等职，1947年调嫩江省任省民运部部长，1948年任嫩江省委研究室主任。

1949年5月，高如松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从东北调回襄阳，任襄阳地区解放后第一任专员，地委常委；他光明磊落，不徇私情，为党兢兢业业的工作，堪称一代楷模，更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干部做出了示范。他位极一机部机车制造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等职位，始终如一地忘我工作，直至病倒，从不停息。写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到高如松是一位值得立传之人，为此我在书中感慨：“如松抱忠忘躯，犹松卧雪守节，令人仰止”。

可以这样说，《鄂北赤子高如松》放出了高如松同志政治上最美的光辉，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它的可贵之处，是它真实地记载了土地革命时期鄂北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斗争的经历，尤其是高如松在众人的信仰产生危机之际所表现出的忠贞和担当，以及那种不倦地探索，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高扬的主旋律。

襄阳的党史是壮烈和感人的，更有诸多俊秀堪为楷模。我所写的仅是高如松同志于鄂北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片断，还有许多诸如热北、硃口、北京等地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撰写，本书遗漏之处，敬祈各位专家、同仁不吝指正，以促再次修订。

张璞 2022年9月16日于襄阳

高如松精神永存

序一

李世久

我参加工作时就听同事谈到过高如松，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襄阳行署首任专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着许多曲折的革命经历。听说张璞同志在搜集其宝贵的活动史料，为他立传，我感到很是高兴，并觉得十分必要。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屡遭挫败、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情境下，极少数共产党人经受不住严峻考验而屈服变节，然高如松在身无分文、饥寒交迫、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宁肯藏山洞，挨饥饿，以致抱病，仍然坚守共产党之信仰。他长年累月涉水，徒步江西、河南、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或打短工，或教书，或混入军阀队伍，始终以党的解放事业为要务，不顾一切地寻找光明。试想，在当时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作动力，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高如松同志就是这样辗转奔波，最后于武汉找到董必武，持其介绍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多年漂泊外乡的游子回到母亲怀抱，归入到革命大家庭。为此我为我们党有这样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他那种矢志不

渝，抛家别舍，探求救国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气概，那种抛头颅，洒热血，一心向党，舍生为民的革命情怀，一个孤独而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品质，实在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景仰、膜拜和继承。

愿高如松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李世久 2022 年 9 月 22 日于襄阳

注：李世久，原襄阳市委副书记

如松光辉照千秋

序二

资深记者张璞先生倾心倾力倾情打造的《鄂北赤子高如松》震撼出炉，我十分有幸能在第一时间竭诚拜读，却又十二分忐忑于高军、张璞两位先生向我索序。亲情故知相邀，虽自知德薄才浅、人微任重，但最终令我勉为其难、恭敬从命者，原因有三：

一是高家出了个大英雄，倍感亲切和骄傲。实话实说，我开始关注、研读高如松，其初衷确因他是高家人，是千千万万高姓人中赫赫有名的一个老革命、一个大英雄！尽管共和国史册上英雄辈出，群星璀璨，但作为高氏后人，对高姓英雄模范，总是听起来有着天然的荣耀感和自豪感，读起来平添亲切的趣味性和自觉性。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国家新定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自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从襄阳、从高家，走出湖北，走向全国的英雄故事——《鄂北赤子高如松》不啻为传承红色文化、开展现代家教乃至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鲜活教材。

二是革命历程光照千秋，催人奋进。高如松是苦寒家庭出身、襄阳土生土长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优秀党员干部，凭着对党赤胆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

一步步从鄂北农村转战大半个中国，成长为新中国成立后襄阳地区首任行署专员，继而迂回进京，担任我党中高级领导干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华儿女，特别是生在襄阳的后来人，都应该倍感自豪、引以为傲。知身边事，学身边人，讲好襄阳故事，传承襄阳文化，这本英雄传记，堪作教科书，值得我们研读和传承。

三是创作初心体现了忠孝两全，功德无量。把高如松的革命事迹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概有三方面动因：高军母亲的遗愿，高军本人的拳拳孝敬之心，众多乡亲和善良人们的朴素感念与真诚期待。高军年过八十且体弱多病，心中有爱不服老，抱定对革命先烈以及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与作者一起追寻着高如松闪光的革命足迹，查党史，访见证人，阅地方志，甚至跑部进厅，以史为鉴，务实求真。最终以作者八万字之泼墨，成功推出了迄今第一部由襄阳人亲笔书写、系统完整真实反映高如松早期革命人生的壮丽画卷！文如水洗，字字珠玑，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必将与日月同辉，历久弥新。

“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这是松树的风格，也正是高如松人如其名的真实写照！祈愿能有更多更多的人，读到这本好书，领略这一先贤，坚定而自信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高中华 2022年9月28日于襄阳

鄂北赤子高如松

(湖北襄阳 张璞)

高如松 (1905.5 ~ 1974.5) ，又名高祥、高子明，化名李成明，1905年5月5日生于湖北谷城茨河高家垭子。父德贡期盼儿子如松柏一样顶天立地，正直为人，故赐名如松，取如同松柏正直有用之义也。高姓祖传，茨河高氏先祖与河北景县高姓同源，尊北齐高欢为始祖无疑义也。据考，景县乃高氏郡望，源于东汉，渤海高氏皆出于此。至清末，德贡曾祖于湖南任职，歿后请师堪舆，择茨河高家垭子入葬，衍成高氏一族。曾祖遗有袍带一只，上有玉珮，如松幼时常拿出把玩，后传与子高军。其族谱曰：“士德如恒正，仁新世照昌。安怀开国义，子路定家邦。”取定国安邦之义也。德贡父辈有仁，高士龙、高士府、高士良，同住三进院落，从未分家，可谓四世同堂。至如松出生，盖有人丁五十余口。院落坐西面东，左右两眼水井，皆甘甜。高家的发迹遭到当地富户嫉妒，他们请来风水先生将狗血、经血等物丢入井中，设法致高家衰败。并云：高家欲抬头，除非百人祭井。世事果有巧合，清末民初时期，有一百多土匪手握棍棒刀枪从牛首流窜过来，抢了新集抢南漳，所过之处，伤人无数，血流成河，然后到茨河境内的回龙寺大摆酒席庆功。当地民众气愤不过，纷纷拿起刀叉和地方团练一起，将这伙土匪从回龙寺逼进了高家垭子，一百多名土匪全被扔进了高家两口水井，真应验了“百人祭井”之说。从此，高家垭子威震四方，门前花园内黄杨树再度茂盛。斯树近看如伞盖，远看似奔马，至今尚存。到此瞻仰如松者多与此树留影，以佐证自己到过如松家乡，算作纪念。真可谓人因地而名，地因人而彰。

一、充满激进的学生时代

由于命运的造就，高如松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子。他是在姨母章哲卿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上学的机会，通过学校“读书会”活动大开眼界，接触到新的思想，从而成为一名爱国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

1915年，如松10岁，母亲章氏因无钱医病而离世。姐姐遂与伯父生活，如松辄寄居外祖母家。时外祖母与姨母章哲卿皆在襄樊城内一小学任教，如松至读小学便随姨母生活。外祖母与姨母教学皆严谨，要求如松背诵课文不打磕巴，并按时完成作业。在二位长辈严教之下，如松未敢怠惰，学习成绩颇优，直至小学毕业。

1920年，如松年方十五。经人介绍，娶茨河黄家湾王达三之女王玉娥为妻。玉娥聪慧能干，兼识草药，常常自挖草药为邻里治病，又用治病所得供如松读书。加之姨母章氏倍加呵护，如松学业可谓长进。

1923年，如松考入襄樊鸿文中学。此系基督教会所办学校，只许学生专研《圣经》，不让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然时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自1918年1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委张联升为襄郢镇守使以来，襄樊人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同清末相比有增无减，光田赋就有地丁、漕粮、屯饷、租课四大类，杂捐名目就更多了，有月捐、灶头捐、纺车捐、门牌捐、壮丁捐、团防捐、枪捐、草鞋捐，闹得人民怨声载道，纷云：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这种“奸吏刮洗劣绅剃，土匪梳子军队篦”的剥削局面，一度被称为襄樊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豪绅掠夺贫民不竭，军阀刮募骚扰无休，致使许多忠烈赴死，英杰殒命，更引起襄樊各校学生声援。是年，柯柏年在教会所办上海沪江大学领导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之斗争，对襄樊影响之大可谓空前。鸿文中学系外国福音教鸿恩会所办私立

性质学校，校长乃加拿大人，尚有进步思想。但所聘教师或加拿大籍，或英国籍，对学生宣讲之课除宗教和中国国学文化外所剩则是帝国主义侵略文化。高如松入校时，襄阳县邓城村进步学生董振（1927年4月被选为襄阳县农协主席，5月因购枪开展农运被捕牺牲）借该校校监董曦馨系其叔父之关系，已在该校学习。又知董振是个热血进步青年，便经常和他串联进步学生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读书会”，把一批品学兼优生拉了进来，为开展社会活动奠定基础。一次，一个外籍英语教师在课堂上挑衅性地提问：“西藏属哪个国家领土？”董振答曰：“毫无疑问是中国之领土。”教师又问“西藏地方政府是听中国政府号令还是听英国政府号令？”面对帝国主义之挑衅，之污辱，高如松和董振一起，带领“读书会”学员硬将此教师轰出教室。后高如松与董振翻阅文献，查找资料，了解帝国主义侵华历史，写成墙报，批驳帝国主义者否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之谬论。

时有朝鲜爱国女士金在天经武汉学联介绍临襄进行反帝宣传。金女士演讲《亡国惨》，用自己亲身经历沉痛宣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亡国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日本侵略者在朝鲜随意奸淫烧杀，凡是爱国者一律关在监狱，稍有反抗，就用刺刀戳，惨死者不计其数！”最后，金女士于黑板写下一个繁体“爱”字，鼓动大家：“爱字中间是个心，爱国就须使出衷心，否则国破家亡，后悔晚矣！”

高如松心潮澎湃，满腔悲愤。他与董振先后登台呼吁：“我们岂能单纯读经撰文，眼睁睁地看着中华民族重蹈朝鲜覆辙，当把满腔热血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去！”以此打开同学们的心扉。

如松常云：“心中抱着信仰，黑暗和苦难即无法将你吞没。”此即其斗争动力也。

1923年5月，借襄樊各学堂举旗纪念“国耻日”之机，高如松和董振一起，带领鸿文中学学生，来到街上，

挨户查抄各种日本货物，限期卖完，不准再进，迫使外货降价销售，给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以有力打击。

1924年初，董曦轡的学生孟宪章携萧楚女来到鸿文中学。高如松得知后即求董振说服其叔父董曦轡，引荐自己与萧楚女晤面。董曦轡爽快答应，高如松便与萧楚女有了接触，从此看到了《向导》《中国青年》及《独秀文存》等进步刊物，了解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思潮。是年春，枣阳籍进步青年黄火青也来到鸿文学校，高如松除带他们到校长室谈些进步思想外，还一起畅谈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禁锢的理想，引导读书会会员逐渐由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化。黄火青说：“说洋人友好可以，说他们有进步思想，怕只是一些漂亮话而已，别信那一套。”之后事实证明黄火青所说甚有道理。通过实践活动，只有萧楚女带来的新思维才真正使读书会学生感到了一片清新的新鲜氛围。随着各种活动的开展，读书会成员迅速猛增，到年底便占全校学生的70%以上。

不久，黄火青因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而离开鸿文学校，但始终与高如松、董振、李金铭一直走得很近。至1924年冬，“读书会”渐成气候。高如松常与董振发起声援会和查账活动，于此，与李金铭、李庚尧等十余名进步骨干很快显现出来。一日，在查账过程中，董振发现洋人校长宠爱的学生会主席陈书虚报洋钱三串，为打击洋人垄断势力，董振要求校方开除陈书。这时，洋校长露出本质，只同意陈书当众认错，对高如松等人之要求却置之在一旁。洋校长庇护，竟使陈书反咬董振等“污辱了人格”。高如松挺身而出，为董振声援，坚决要求开除陈书。洋人校长不肯，高如松、李金铭、李庚尧等便与董振一起，一反常态，率百余学生走出校门，罢课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校长纵容亲信贪污、利用课堂污辱中国等罪行。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洋人手里的教育权”等口号响彻云霄，当日

消息就传到武汉，引起轰动，此即为湖北史上著名的“鸿文学潮”。

洋人教会为挽回面子，武断地开除董振、高如松、李金铭、李庚尧等 10 名学运骨干。时有人告密：“校监董曦轡有暗地支持学生闹事嫌疑。”于是，校方宣布将董曦轡一并辞退。然鸿文中学没想到襄阳十中挺身而出，立即接收该校开除的 10 名学生和校监，给了鸿文洋人响亮一击。洋人方知在中华大地之上，华夏儿女乃一脉相承，岂容轻易践踏。有外侮者，必共起而御之。诚哉斯言，是以襄阳鸿文诸生更具烈焉！

1925 年春，高如松与董振等来到襄阳十中，在此又接触姚昭德、孙孝承、宋良猷等进步学生。高如松召集他们到老龙堤商议襄阳鼓楼集会事宜，准备再次进行革命斗争。后决定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天（3 月 13 日），于鼓楼搭台演讲，举行悼念。斯日，高如松和董振等十余位骨干先组织停课，后聚集鼓楼举行追悼，并上街游行。5 月 18 日，萧楚女从上海来信，鼓动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斗争。高如松、董振、李金铭受到鼓舞，引导襄樊学生运动正式转向反帝国主义之革命斗争。随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襄樊，高如松即与董振筹划“五卅”学潮。时武汉地委派谢远定临襄，以十中校监身份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并着手在学运中发展党员、团员。

谢远定，号伯平，1899 年生于湖北省枣阳县随阳店太平村，1916 年考入湖北省立中学，1917 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秋参加恽代英所倡导的“互助社”，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团地委书记，在《觉悟》《向导》《中国青年》发表近 40 篇文章，成为青年们的贴心朋友和引路人。1925 年担任共青团武汉市第十二支部书记，同时任《江汉》小报主编。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党组织即派他回鄂北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到十中后，谢远定首先领导襄樊学联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和“国货维持会”，

支持高如松、董振鼓动襄樊二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成为高如松走向革命斗争道路的引路人。

6月18日，高如松和董振带领国货维持会会员在襄樊商业区上街演讲，坚决抵制英货和日货。逐户告诫：“次日一律罢市。”北洋军阀政府地方当局慌得手足无措，襄郟镇守张联升与襄阳道尹熊宾奉湖北督军萧耀南电谕，贴出告示：

飭各地方官遵公法保护侨属，以维持外交，严防奸党假学生名目，妄惹事端。襄阳县知事谢震亦以县署名义张贴通告：三奉督谕，现近暑假，飭各校先行放假。并谕学生父兄，各自召回子弟，勿得妄听讹惑，自废学业，而肇事端。

高如松及国货维持会会员们见此告示，即挥笔在旁批语：

亡国奴，放狗屁。

后继续与学生执旗击鼓，挨户查禁英日货，通街所卖仇货者收拾不及，竟抛掷满地。

时北洋军阀充当帝国主义之走狗，豢养之犬张联升赶紧贴出压制学生运动之告示，严禁联队游行，并派军警荷枪实弹上街镇压，企图把“五卅”学潮强压下去。然高如松等不畏强暴，继又组织十中、二师、鸿文等学校五百余学生组成联盟，抵制日、德、英、美商货。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戴着印有“誓雪国耻，共赴国难”的袖箍，兵分多路检查仇货，或到襄河船上，或到襄樊二城商店进行搜查。

反教会斗争及“五卅”运动，使高如松等一批先进分子很快崭露头角。1925年7月谢远定介绍高如松、方复生、宋良猷等第一批加入共青团；10月，又发展董振、傅良驹、李金铭、崔大泉、孙孝承、张明汉、熊玉珩、朱启林、宋正德、张国威等人入团。随后，谢远定又在共青团员中选拔一批条件成熟的人转为共产党员。

第一批入党的有：高如松、宋良猷、李金铭、焦如松、董兴国等人，随后马适安、董振等人亦先后入党。

11月，为使学生运动如期开展，高如松、董振、孙孝承、宋良猷通过“读书会”与各班联系，趁夜晚召集骨干学生到十中院内进门第二排教室秘密开会，不点灯，由高如松宣布开会，然后由宋良猷讲话，布置同学们学习进步报刊，搞好宣传。要求寒假回家做到“一个人宣传三个人，宣传革命，宣传北伐”。

时黄火青及河口学生熊玉珩相继来到十中，二人与进步学生张国威配合，在谢远定门口场子里演出董曦轸和谢远定编写的小话剧《五分钟》和《农夫李二之死》。后高如松亲率黄火青、熊玉珩、张国威等一批学生骨干分赴老河口、谷城等地宣传，带查仇货。高如松常亲自动笔写文章，编剧本，让当地青年儿童张光年等登台表演，还教张光年朗诵《三民主义》，使之从小就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从老河口、谷城回后，又募捐4000多元寄往上海支持上海工人正义斗争，被上海学联列为榜眼。张光年后终于成为革命诗人，位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第三、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改名光未然，他创作的组诗《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均被谱曲唱遍祖国大江南北。后他在《我在老河口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一文中这样记述高如松在老河口时的情景：

高如松、方纪刚对我非常友好，我非常佩服他们，他俩把我当小弟弟。我当时只有12岁，个儿又长得不高，他们经常把我抱在膝盖上，讲一些改造社会、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我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高如松就是这样，走到哪里，把革命道理宣传到哪里。

1925年11月，经上级批准成立中共襄阳党团特支。谢远定任特支书记，高如松任宣传委员，宋良猷任组织委员，使鄂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从此有了领导核心。在中共

襄阳党团特支领导下，高如松率领学联按照谢远定的指示不断壮大党团员组织，使很多学运骨干都成为党团员的后备队伍。为此，众人皆云，萧楚女来襄阳撒下了马列主义之种子；谢远定到襄阳培育了共产党之苗子。正所“萧（楚女）、谢（远定）皆为马列主义于襄阳传播者”之谓也。以此，高如松成为襄阳首个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二、只身投入鄂北革命运动

由于不断组织和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高如松很快成为襄阳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正如黄火青同志（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4年11月21日在接受谷城县党史办严华山、王志成二同志采访时所说：“高如松同志是襄樊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襄樊学生第一批入党的党员。我一九二六年入团时，高如松就是团支委，他那时还是我的领导哩！”并说：“给他个人立传很需要，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应当写他的传记。”以此对高如松大革命时期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6年2月，高如松接替谢远定任中共襄阳党团特支书记，后对襄阳党团特支进行改组，成立了襄阳党团特支干事会。春，共青团襄阳地委建立，高如松任书记，并负责与上海共青团中央通信联系。根据革命形势发展之需要，特支积极组织党团员学习革命理论，输送党团员到各县工作，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组织和领导襄樊学潮运动。3月，率学生骨干上街游行，因遭伪警察阻拦被打伤，后避于檀溪舅父章大河家数日，方摆脱伪警察之搜捕。至5月，襄阳党团特支实行分立，成立中共襄阳特别支部委员会，李实（抱一）、马适安、高如松先后任书记。从此，高如松由领导襄樊学生运动正式转变到领导鄂北革命运动上来。

1926年8月，高如松受组织委派到宜城联络王家集共产党员王全芝、王全成、王文锦等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领导和发动了当地的农民运动。他把演讲稿写好，连同标语一起送给了三王，让他们组织青年学生逢热集到街上搞演讲，贴标语，呼口号，大造革命声势。到是年秋天，便正式成立了王家集农民协会，由王全芝、王安芝任负责人，隶属襄阳县农民协会领导。在高如松的策划下，王家集农民运动闹得火红。广大农友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高唱革命歌曲，向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王全芝亲自教唱革命歌曲：“天上星星颗颗稀，莫笑穷人穿破衣，军阀豪绅命运短，莫哀叹，农民协会已成立。要团结，把心齐，困龙也有上天机。”

他人在襄阳，对家乡的农民运动却没少参与。一次，他听老家来说茨河镇开药铺的江西人李永宏在茨河镇组织商民协会，李自任主席，以小商人和贫民为主，把保长大绅一类的商家都排出协会之外。而茨河区旧政权又为大地主宋家（太平店区宋家的近门）所把持，或者为太平店区胡姓、刘仁昌（绅士）、罗佩绅（大姓数千户）在茨河开行的胡家把持。因为武汉被打下后，太平店胡仲文介绍茨河胡家刘任昌、罗佩绅等大绅士组织国民党分部想继续把持镇村政权。高如松说：“这肯定不行！”当即赶回茨河，支持商民协会，提出商民协会是商人的协会，不是绅士的协会的口号，以反对胡刘罗等。为反对罗佩绅等大绅士，高如松住在茨河镇，直到商民协会站稳脚跟。

是年冬，高如松被派到谷城盛家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居住于傅湾村青年骨干李陶庵家，重点在九里坪、薤山坡、铜山等地开展工作。此前，国民党左翼组织成员、谷城城关镇黄康村张茂修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派遣，于学生暑假期间返汉回谷组建谷城县党部，并担任党部常委，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高如松得知在

盛家圪有威望者李晓葛正和回谷骨干张登星、胡宗授、杨献之、江云桥等组织区分部，便与之积极串联，在盛家圪发展组织，同时筹备农民协会事宜。很快，一区党部便成立，常委 9 人，有顾善卿、冯英桥、黄宗有、李陶庵、饶风階、李麟、李月如、李晓葛等。党部地址定盛家圪雷祖殿。同时成立农民协会，主席黄宗有，副主席沈德琪。不久，又在盛家圪陕西馆成立妇女协会，孙志烈为妇女主席；还成立了盛家圪儿童团，李健凌为团长。于此，农民被发动起来。铜山、孙家峪、白庙沟、薤山坡、傅家湾、当铺、后河等地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很快呈现出轰轰烈烈之态势。

1926 年底，枣阳人余益庵、李金铭与宜城人胡培洲等陆续到谷城参加谢远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使谷城成为一方革命热土。高如松抓住机会，与余益庵、李金铭、李晓葛等商量起以薤山为基础扩展农民协会事宜。

李晓葛是盛家圪人，对薤山熟悉。他就薤山周围（以薤山脚下为度）进行了粗略估计，薤山计有 200 余里，对面是盛家圪，间距 20 余里，中央夹有一条南河，一名粉河，一直绕到盛家圪里坪（即今里平乡）沿岸。薤山即迎着盛家圪的这半面坡，下至薤山脚均属于九里坪，而李晓葛的家及其家族均居于九里坪。故九里坪是薤山往来盛家圪的要冲，高如松和余、李二人听后，甚为赞同，决定立即施行。

自此，农民协会日渐发展，上至薤山三里坪、铜山和乌谷，中至张蓬、周湾、付湾、龙滩，下至任家营，旁至老鸦山、骆家坪均次第成立农民协会。高如松嘱将这以上各乡村由李晓葛多负责，以便方便开展工作，对于这以上山村和这些乡村和农民协会的活动计划，亦由李晓葛负责写出。盛家圪以东之大王当铺、官坡、雷神殿以及庙滩、付家湾等各乡村，高如松嘱由傅伯绩同志负责，以便开展工作。对于以上乡村和农民协会的活动由傅伯绩同志写出计划。

方案既定，高如松即召集各乡村农民协会，统一口号并发动会员张贴标语。口号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分田地。”并张贴标语：“联俄、联共……”于此，蕪山东西两百余里，很快热闹起来，树上、房上到处皆为标语；街上、路上处处可闻口号。一时间，各村恶豪恨之入骨，坐卧不安。不少劣绅日夜奔走接洽伪军队，串联大流氓，密谋惩戒农民运动之计策，使风声日益紧张。高如松得知此情后，速与余益庵、李金铭、李晓葛等商议应付办法，一再叮咛，务要团结党内和农协忠实同志，并主张积极联系农民群众，将他们武装起来，做好准备。农民群众则怒气冲天，云：“大家不趁此时出头还待何时！”于是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办滚头大刀的，办红缨长枪的，统称为红缨大队，决定与恶绅们以死相拼。当地悍匪王老六，受恶豪之蛊惑，召集河南匪帮，来到蕪山，不论贫富，肆行奸掠，乡里富户们，多由大刀会藉资抵御，一般农民群众无法抗拒，只得各自办大刀会。成立有农民协会者，即靠协会同志在前面抵挡。对此，恶豪们尤为仇视，屡思报复，扬言手里有枪，又有土匪撑腰，农民协会终究不堪一击。然农民群众在高如松等人领导下，纷纷参加农民协会，都说：“恶豪有枪支，我们有大刀，怕他们做甚。”于是便在农民群众所办的大刀会中挑选忠实勇敢同志成立红缨大队，用以抵御悍匪恶豪。

因李晓葛负此区域重责，为确保万无一失，只在族人中考查把信得过的串联加入，先后有李陶庵、李鼎臣、李月如、李光让、李楚昭、李楚俊、李麟、李春富、李世湘、李世贵（即李庚尧）等，连李晓葛共 11 人，坚守蕪山要冲，居高临下，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距城镇亦最近，其间经历数战，个个奋勇杀敌，竟无一后退和叛变者。

每念及此，晓葛及众同志皆曰：“是如松同志指挥有方矣！”与其说指挥有方，不如说是宣传有道，高如

松用真实的事例说服了农民，不与反动派拼命就会失去生命甚至一切。

1927年3月初，传闻蒋介石有叛变动向，高如松与李金铭等召开秘密会议，由农民群众公选一位野战团团长，以应付动荡时局。此举甚得各协会会长之拥护。5日，高如松来到盛家垵首大场上，召集三千余农会会员，按举手方式，选举李晓葛为野战团团长。高如松宣布时，台下竟一片欢呼，可见群众杀敌心切。然各恶豪闻此，愈加惊慌痛恨，彼此加紧串连，大张其词，并勾结伪建国军正副旅长黄鹄、刘昆，速带伪军赴谷城摧毁县国民党党部。先头部队，约400人，日夜兼程赶到盛家垵，驻扎盛家土康武昌庙内。两日后，正副旅长亦陆续赶到，他们探知浙峪朱团总预备缴区党部十多支步枪和洋台等武器，便有意将朱团总停在老鹁山河中之船调出，又派分队将县民团大小枪支一并提出，押送公安局内。翌日，遂派人来找李晓葛前去谈话，晓葛因有如松嘱咐，未悉其来意，便未见面。当晚伪建国军又派四、五人，挎着盒子来捉晓葛，晓葛早有觉察，又借故推脱。后发现果然是伪建国军捉拿晓葛之诡计，目的是捉晓葛后继而捣毁党部。而晓葛时刻记着自己负的团长之责，懂得捉住了团长一切都容易解决之道理。晓葛于紧急之下，火速与如松等同志协商对付办法，决定连夜将人和武器准备齐全，于次日上午听令进攻。晓葛遵嘱宣布：“不准走漏丝毫风声，因野战团以刀敌枪弹，以少胜多数，倘若失败必被消灭，故大家势必进无退，不胜不归。”

信心和勇气乃胜战之本。第二日上午，即初八午时，野战团一部把守各路要口，一部把守镇门，另一大部去马桥庄卡断敌人外围。时敌人近百人枪距武昌庙约半里，我方人数尚不满百。但时辰已到，且闻枪声已响，农军毫不畏惧，顿时踊跃高跳，齐呼：“共产党胜利万岁！”便如烈马上道，奋勇奔前。尤晓葛胆壮气豪，荷枪持刀，与李麟、黄宗友、沈德琪、沈忠明、李陶庵、傅万忠、冯弼寿、刘胜余、王华国、帅正国、龙作云、冯英桥、

李兴让、任在俊等率大队直扑武昌庙敌伪旅部。敌人见之，惊慌失措。敌旅长黄鹄、刘昆硬着脖子大呼：“我们人多枪多，怕什么？尽管和他们干！”而我方喊杀连天，愈攻愈烈。加之四方农民闻声纷纷荷扛拖刀、持叉举锄，前来助战，更有翻墙越屋持砖头瓦块砸向敌人，敌人只得东躲西藏，不到三个时辰，士气大丧。时我方喊声更急：“缴枪不杀，我们只活捉旅长黄鹄、刘昆！”又有同志一枪射中伪团长杨的肩部，杨负伤越墙而逃，敌人见状只好跪地交枪，更有人跑步开门投降。黄鹄、刘昆见大势已去，遂趁机越墙逃走。此战俘敌 30 余名，获步枪 25 支，大木箱一口，内装现洋 100 枚，连排营团旅长印 15 颗，伪密令公文一大札。从公文中得知，敌旅已准备农历三月初十，到达盛家圩 7000 人，扫荡盛家圩后，就去扫荡谷城，幸我方主动出击，真可谓攻其不备，扰乱了敌人方阵。斯战我方无一人伤亡，可以说大获全胜，以此有力打击了恶豪势力，大长了四乡人民志气。

然恶豪更加愤怒，伪军亦为之更加疯狂。伪建国军到盛家圩时，有许多地方恶豪子弟和一些流氓之徒乘隙都参加了敌军，失败后又一同逃走。经侦察，得知敌人参谋部和大流氓们多分途潜往保康伪师张联升驻保之部队（一个营）。高如松得此消息，急向各农协负责人嘱咐加强警惕，倍加防范。李晓葛亦召开紧急会议，规定：一、各乡农会多选勇敢精干同志，设岗放哨，日夜提防；二、到处增加武器和装备（即大刀和短服）；三、远近都联合一气，一处有惊，百处响应，且互通消息。至农历三月二十，便有九里坪李陶庵等，老鹄山陈兴志等两路人马，赶来送信，称有大队伪军乘船由水道下来。喘息未定，又闻保康张联升两连敌人精锐步兵乘船奔来。野战团团团长李晓葛速与雷祖殿内 10 位同志，将枪支和重要文件携出，埋伏于雷祖殿旁坟场。时黄宗友、沈德琪等火速率 60 名农军荷红缨枪和滚头大刀，赶赴雷祖殿救应。只见敌人登岸后手持盒子枪直赴雷祖殿来捉李

晓葛。我方却不慌不忙握着枪刀一字儿摆开。敌队长见后便问：“你们在这里干啥？”黄宗友答：“维持地方秩序！”敌队长又问：“你们李团长在哪里？”黄宗友答：“因公赴县城去了。”敌队长厉声说：“刚才我们上岸时，有人说他还在雷祖殿内，难道你在说谎？”黄宗友答：“哪个说的你去找哪个。”敌队长说了声“我们进去搜。”敌兵一拥而进，不一会儿又怏然而出。敌队长怒问：“到底哪儿去了？”黄宗友从容地答：“赴县城去了。”敌人猛扑过来，喝道：“再扯谎我就毙了你”。旁边的同志们忍不住地把枪刀紧握，说：“请吧，你们先开枪，我们后还刀，谁要不了对方的命，不算好汉。”敌队长等正踌躇间，瞄见我四乡农民群众各持刀矛卷地而来，吓得勉强说了一句：“捉住了你们团长再说。”便大步地回去了。然待后面敌人全部登岸，又重下命令包围雷祖殿东北两面和盛家坳附近重要地点。各乡农民协会众同志闻此消息，即火速联络，兼程而进，至是日下午四时，到达盛家坳附近者 4000 余人，并都有领导指挥，各择有利地形静听号令。此时，陆地三面都紧紧围着，仅剩盛家坳塘下一面。敌人见势不妙，遂自动撤出。走时，竟哀求街坊准予进街暂住一宿，显得十分可怜。

是夜，晓葛抽调部分农军渡河埋伏，拟待次日趁敌渡河时击之。不料，敌人由于惶恐竟于深夜集于河边，不敢直接渡河，竟沿着河岸急下，匆匆逃跑。此战，农民协会初显威力，由于部署周密，敌人乘船突袭之阴谋终未得逞，还险遭惨败。实为高如松指挥之功也。

4 月 12 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襄阳驻军张联升于 5 月 20 日亦公开易帜，鄂北继而出现了“屠刀当当响，人头滚滚流”的白色恐怖局面。各地农民运动惨遭镇压，各地党组织受到破坏。谷城也不例外，冲着高如松领导的农民军数次让伪军队丢脸，张联升调集全部军队把雍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左左右右围成铁桶一般，志在活提高如松、李晓葛等人，并以十万大洋

悬赏高如松人头。1927年5月17日，《民国日报》有一则真实报道《张联升部下之不法，包围县党部及县政府屠杀抢掠》：

襄阳张联升部下，见蒋逆介石叛变，遂蠢蠢欲动，准备于阴历三月二十八（即4月29日）对于鄂北同志施行一个大屠杀。谷城县党部闻此消息后，进与县政府召集一联席会议，金谓张氏驻谷军队只有一排，无能为力，遂议决将新成立之保卫团，及近城之武装农民集中县城，届日各区保卫团二百余人，武装农民千余人，齐集县城，举行“四三”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会，游行讲演，晚间风雨交加，农民人众，无处休息，各自回去保卫团亦散居各处，不意当晚驻谷军队，即到河口，四十余人，二十八上午八时正大雨滂沱，该军乘隙进城，将县党部及县政府包围，开枪射击，弹如雨下，同志已牺牲者五人，受伤者二人，被捕者二十余人，越城而逃者跌伤者尤多，后该军大出赏格，缉拿同志，家中稍有资产者，尽行抄掠，杀掠情形，令人惨不忍闻。

时高如松无处可藏，只好回到妻子娘家黄家冲。该冲东面是一条弯曲的流水小湾，常年流水不断。门前四五十步有一片三四亩大的竹园。高如松白天不能露面，只能选择晚上到此躲避。回家时，其身上衣服已破烂不堪，鞋子破得袒露脚趾，实不能穿便履草鞋；头发胡子长得老长，外人很难认出，身上亦长满虱子，进屋后爱人使用布剪帮其理发，兼捉虱子。由于风声过紧，即便进了屋也不敢大声说话。于是，便由妻子玉娥待天黑定后陪他从后门到山上树林里说话。如松说得最多的，是要玉娥保护好自己。还说革命即将胜利，眼下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要学会忍耐。二人常常谈得热泪满面，手握着手，发誓要一起迎接胜利的曙光。然而，良宵苦短。一天夜里，岳父王达三告诉他，这个家不能再待了，明日茨河伪政府便要来黄家冲暗查抓人。高如松听后，只好趁着黑夜，奔出门外。玉娥追了上来，为他披上赶制好的新衣，并将卖草药和医病所得悉数塞给如松。据高

如松长子高军回忆，当时如松闹革命，除三舅王怀书、四舅王玉书和五舅王彩书对其有过接济外，大部分生活费用皆由母亲玉娥提供。后如松一步三回头，连夜来到河边，准备过河去红石岩暂避，可惜此时已无渡船。这时，营子里不断传出阵阵犬吠声，怕是有生人进村了。如松心里甚是焦急。正在这时，只见一个人影朝他奔来。他还没来得及问是谁，来人便先说话：“如松，快走，有好多人进村了。”原来是同村一组的陈发兴，论关系，还是亲戚，平时靠在汉水里打鱼谋生。说完，便拉他朝河边跑去，用自己的渔船把他送过了河。夜晚不便行走，陈发兴便把他掩藏在闫家河一个山洞里。在这儿，如松躲了几天，直到陈在一次夜晚送饭中腿被摔伤，他才离开。到哪儿呢？听说红石岩也贴了布告，悬赏抓他，就只有去襄阳泥嘴大姐高如林家暂避了。于是，借着一个月夜，他来到了大姐家。大姐脾气很坏，历来反对如松革命。如松进屋后怯生生地问：“我想在你家暂躲几天……不会有事吧？”没想到大姐当即垮下脸问：“你说呢？难道你不知道你做的尽是砍头之事，尽是诛灭九族之事？”高如松听了，竟一时无语。这正是他鼓动农民加入农协时所言：“要知道我们办共产党的事就是做砍头的事，怕死的可以站在远处。敢做的就要做好砍头的准备。”想到这儿，他竟流着泪悄然离去……走出巷口时，却遇到一位名叫郭洪昌（郭洪昌，襄阳泥嘴人，本姓陈，因入赘郭姓，故改姓郭）的，郭说：“刚才你与你姐姐的对话我在房后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为穷人甘愿被杀头的汉子，你姐怕，我不怕。你可到我家吃饭，然后我引你到山上白马洞去住。”就这样，如松白天到郭洪昌家吃饭，夜晚上山住白马洞。郭洪昌没有被子，便送一条麻袋和一床席片，当作铺垫。然刚度过几日，即被人发觉，竟把麻袋和席子一概卷走。如松自知在此已无安全，又恐连累他人，只好悄然离开，来到他曾经发动农民运动的王家集避难。高如松离开后，

郭洪昌父亲陈发兴被抓进衙门审问收留高如松之事，因拒绝承认被打成重伤，无钱医治而死。

高如松到王家集后，王家集农会负责人王全芝等对他虽尽力保护，但没过几天，当地劣绅胡子清为首的反动武装也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眼看高如松渐渐不能存身，王家集党组织便想办法帮助他离开了王家集，后高如松一路辗转来到了武昌。

在这儿，高如松遇到了襄阳的董紫绶和枣阳的李金铭，董紫绶是董振的胞弟，李金铭是他的同学，他好不高兴。就这样，他被介绍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此见到了在这里任教的毛泽东、恽代英、方志敏、夏明翰以及在独立师的陈毅同志，并受到他们的亲切教诲。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并在武汉地区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在此紧要关头，高如松受党的派遣，于1927年8月初与李金铭一道从武昌回到襄阳，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时同学马适安被湖北省委任命为襄阳县委书记，高如松被任命为襄阳县委宣传部长。不久，马又派遣高如松到襄谷交界处任特区书记。9月，高如松与老河口共产党员熊玉珩、薛家集共产党员孙碌、褚玉恒等到襄北薛家集组建中共薛家集特别支部委员会，指派孙碌为特支书记，李自修、薛斌为委员；月底，与党员兰伯达到太平、茨河，着手开展农运工作。

此时，谷城较之半年前已安静许多。《民国日报》公开报道云：

张联升倒台，土豪劣绅星散，民众已渐能活动。

最近由襄阳抵省同志报告，自樊总司令克复枣阳，进逼襄阳，张逆及其部下，已仓皇失措，现已将其少爷式的军队，集中老河口，（大概为容易逃跑起见）襄阳仅留防兵二营。据此，襄阳日内，即可克复。南漳，自此次变后之经过、土豪劣绅正为活动，前曾组织保安会，以办理地方事务，近因襄郧革命势力，逐渐发展，该土

豪劣绅，已次第离职潜逃，保安会已倒闭，而县党部前所组织之各人民团体，已渐有活动情形云。

时野战团团长李晓葛尚在外隐蔽。高如松先来到太平店乔岗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便发展王合书、王世统、王道修，陈明珍等人入党。接着，高如松又来到太平店、庙滩、薤山等地，全力恢复农民协会和大刀会。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兵匪为患，西北军岳维峻部两个师尚驻谷城境内，勾结当地豪绅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令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群众欲图反抗，便自动参与了“大刀会”“红枪会”，跟着高如松对抗反动势力。



10月，高如松被任命为谷城县委书记，决定进一步发挥“大刀会”“红枪会”作用，发动群众力量，组织农军正式开展以武装为主要性质的群众斗争。

参加过南昌起义、回 后任谷城县委书记的李绍 棠（李亚声）

年底，谷城籍黄埔生李绍棠（李亚声）从江西朱德部回到鄂北，因其在北伐期间显示出较高军事才能，被襄阳和武汉党团组织致信中央要求调回。李绍棠是谷城

茨河人，原名李堂，派名李圣芳。父亲叫李群林乃驾船出身，母亲靠给人纺线洗衣挣钱维持生活。1924年夏，李绍棠入武汉华中基督教初级师范读书，1925年夏离开教会学校转入襄阳十中，与高如松、宋良猷等一起参加抵制仇货游行活动和斗争。同年与高如松、严家钰等一并入党。11月被中共襄阳特支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深造，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后，到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工作。南昌起义时任暴动总指挥部后方总队长。潮汕战斗中被冲散，撤退途中遇朱德率领的第九军二十五师，遂与朱德部退至闽赣边境，受到朱德赏识。

李绍棠回谷城后，高如松认为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在一起战斗，有革命斗争经验，便推荐他任县委书记，高如松自己则请求担任县委委员，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不求名利、能上能下的高贵品质。

时李晓葛也从外地回。高如松和李绍棠、李金铭、兰伯达一起把李晓葛、李陶庵、李麟、黄宗友、沈德琪、冯英桥、傅万忠、傅伯绩、傅春泉、罗绍堂、王子乾、黄宗镒及盛家以东的党员同志，共20余人集中在骆家坪一山凹间，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内容大致为：第一，不要因失败而气馁，要更加紧密联系，加强组织。第二，发展组织，多多联系农民群众。第三，多开小组会议，准备待机不惜牺牲一切，再图恢复。高如松说：“大家作为谷城农运领导人，对于宣传工作做得太少，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听敌人造谣，说共产党的恶言，这就证明我们于报纸、传单宣传不够，方使群众对共产党没有彻底的认识，对党的行动多不明了。而军阀混乱、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土匪、土劣勾结军队残害民众的事实，我们没在群众中给予揭破，不少群众反为敌人蒙蔽。现在土匪、伪军、民团联成一片向我们进攻，到处是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加紧宣传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怎么宣传，高如松便耐心讲解：“采取一人宣传三户的办法，争取赶明年三月唱春戏前把群众发动起来，来一次大的行动。”大家同意高如松的意见，李绍棠亦很赞同高如松的安排，他强调要加强农民革命队伍建设和唤醒农民、普遍打击杀戮土豪劣绅问题。会后，李绍棠即和高如松、李金铭、兰伯达分赴茨河、庙滩、当铺、盛家垵一带发动群众。其他党员同志都积极沉入各村各湾，开始秘密宣传和发动工作。

为做好示范，高如松每到一地，首先用玩魔术的方式吸引群众，然后宣传革命道理。在栗谷赵湾乡，由于国民党政府抢先一步鸣锣宣传，农民群众谈“戏”色变。高如松便装扮成玩魔术的大喊“玩魔术喽！”很快就引来大片群众。只见他拿出一粒黄瓜种子当即种下，不一会就开始发芽、长藤、开花，继而长出一根诱人的黄瓜来。群众不信，他当即摘下给群众吃。这下观众更多了，高如松趁机鼓动，让群众明年春上到九里坪去看春戏，称到时候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还答应凡加入农协的群众都免费传授魔术技巧。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赶年底，赵湾乡发展农协会会员 200 多名，赶春戏的事儿在赵湾乡更是家喻户晓。

三、领导谷城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谷城县农民能在蕪山建立红军游击队并集结一起攻打伪政府盘踞的县城，在鄂北被称为壮举，在鄂豫边革命斗争上都有着较大的影响。然而，就高如松本人的历史而言，这只是他新的革命生涯的开始。

1928 年春，按照茨河、盛家垵传统习俗，每年春上各村农民都要聚到一块唱三天的春戏。为此，高如松开始布置节目及宣传内容。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时的茨河伪政府允许别的地方唱春戏，独禁九里坪唱。理由是：九里坪系“共党巢穴”。高如松想来想去，这正是发动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良好机会。

于是，一场抗禁春戏的斗争竟悄然地拉开了序幕。

元宵这天，高如松借观灯笼之机，与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李绍棠一起召集李晓葛、李陶庵等到高家垭子共商良策。高如松第一个发言，他说：“伪政府不准我们唱春戏，我们偏要唱。刚好借此机会发动群众来一次暴动。”李绍棠高兴地说：“说得好，省委号召鄂北在8至9月间发动群众暴动，随县已在紧锣密鼓运作，枣阳、宣城都在行动。我们这回把群众组织起来后刚好可以发动。”李晓葛听后十分高兴，他大声喝道：“组织发了话，我们哪有不敢搞的。组织人的事儿就让李麟去干保证成功。”高如松一听，表示同意，李绍棠当即给予了批准。

李麟，原名李楚乔，1894年生于南河镇小笋芽峪村，年龄比高如松大，人称李老虎，高如松系1927年上半年通过李晓葛介绍才认识的。他发现此人接受能力强，信念坚定，为此，去年秋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下用人之际，就需要这种敢打敢冲的人才。他对李麟说：“即日起可通知各农协负责同志，组织农民群众按时唱戏看戏。并要求进场人员一律赤草履、穿短服，肩荷刀、矛棍、棒，但刀矛上不挂红缨，以免招忌。”李麟接受任务后，两日工夫，就发动农民2000余人。李陶庵也率宣传队大贴标语，号召远近群众前来看戏。赶开台之日，涌入九里坪戏场者竟达10000多人。农民们公然打着锣鼓，开台大唱，声势大过往年。

这下可激怒了国民党伪政府。伪乡长立刻派伪保安团队400余人，荷枪实弹前来阻止。该保安团队驻扎在九里坪戏场对岸庙子头，双方隔河对阵。开始只有伪保安团队前来禁戏，说早有声明，今年不许唱戏，怎么突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要是让共产党混进来了咋办？我方代表说：“唱春戏是茨河老习俗，如果有了共产党，我们负责。”保安队头目见众怒难犯，只好让步，最后说：“只准唱一天，如再违犯，即开枪镇压。”

第一天平安过去。晚上，高如松组织李麟等负责人开会，进一步策划。李晓葛说：“敌人驻扎的地点，背

后就是大山，如果明天他们真站在高山上向我们射击，我们定吃大亏。”高如松说：“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李绍棠略加思考，指示选派二百名精壮同志连夜从上游渡河，经老鸱山绕道至敌人背后山上埋伏。明天敌人万一开枪，我戏场中的便衣队，可以随时由上下游浅水处扑河进攻于前，埋伏后山同志突起，夹击于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一切准备妥当，次日便接着大唱起来。果然，伪保安团队又派人来责问情由。李麟拔刀在手，大声说：

“为什么到处都许唱戏，独不许我九里坪唱，莫不是政府没有我九里坪百姓了？既然这样，我九里坪的百姓应该也无政府。”说着，举刀欲砍来人。来人吓得忙跪地求饶说：“钢刀虽快，不斩使者，你们唱就唱，放我回去。”于是，大家都大叫：“快滚回去。”

伪保安队长闻此怒气冲天，当即登山寻找地势准备向戏场进攻。正行动间，伪队中有人报告：“山后有埋伏。”伪保安队长听一惊，仓皇下行，看见农军占尽优势，未敢轻举妄动，到傍晚节目演毕，农军收场时方悄然溜之。

抗禁春戏取得了胜利，群众情绪格外高涨，许多同志提出打到盛家圩去，捉拿恶豪。这正是高如松之前所想到的，他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和李绍棠商量，毅然作出盛家圩暴动之决定，任命李麟为此次暴动总指挥，李庚尧率领九里坪农民赤卫队负责策应。

李庚尧，派名李世贵，又名李华山，李继唐。1909年生于谷城县南河镇九里坪村。1924年考入樊城基督教教会办的鸿文中学，在此结识高如松等。同年与高如松一起被学校开除，转入襄阳二师，1926年随高如松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3月经高如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10日，李麟率农民自卫军400余人出其不意地攻进盛家圩后，李庚尧即率九里坪近200名农军在外策应。战斗打响后，城内恶豪闻风而逃。暴动虽然没有抓到土豪

劣绅，但农军捣毁了盛家垵的国民党公安局和屠宰、烟酒局，并缴获了一批物资，烧毁了公文簿册。

中旬，高如松来到茨河了解农协成立情况，再次策划茨河暴动。这次，他使用化名高子明在这一带走村串户，联络地点设在岳父王达三家。王达三告诉如松，按照他的指示，目前已建立了农民协会，自己担任会长，兰景融任副会长，书记干事王子光、王理书，赤卫宣传兰从周、刘治、苏家保、李宗发（李澄清），并把上磨石、余家冲、马家冲、朱家沟、后庄、茨河上街、下街划归书记干事直接领导，还给所有农协成员指定了活动范围。农协建立后，协会各成员已在指定范围内做发动工作，发动对象主要是长工、佃农和无地可耕者。宣传内容为“打倒土豪劣绅，成立农会，领导抗租，气大户”等，农协运作十分顺利。高如松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暴动很有基础，便召开秘密会议，部署暴动准备工作。时农民协会属地下组织，对外保密，故开会安排在当日深夜，且进入会场都约定了暗号。是日深夜，所有农协成员集聚王达三家房后的山上，听到高子明（如松）说准备暴动，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宣传干事李澄清说：“在陈家湾、苏家洲和黄家冲发动时，所有穷户都巴不得共产党过来把那些地主老财整一整，从二六年天旱至今，农田欠收，地主租课不减，官捐却日益增多。就说我家租种花园地主刘子权那五亩水田，今年共收了八石粮食，却要上交十二石，你说拿什么上交？不反真不能活命了。”大家都说：“澄清说的在理，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我们才有活路。”副会长、共产党员兰景融说：“我们经过七个月的准备，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我看茨河暴动宜早不宜迟，应该立即实施。”

高如松见大家情绪高涨，便决定举行茨河暴动。经与李绍棠缜密研究，决定把暴动时间定到4月21日。

192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二）上午，李绍棠和高如松来到王达三家。200多人的农民队伍一齐集聚

这儿，高如松当众宣布正式成立茨河农民协会，并由农民协会牵头举行茨河暴动。李绍棠讲了具体要求，接着便举行宣誓。誓毕，队伍便列队出发，经黄家冲、上磨石、下磨石，当晚到金牛寺食宿。次日天亮，农民队伍手持大刀、长矛，抬着土枪土炮，从金牛寺浩浩荡荡地向茨河街进发。经马家沟、沈家坑、后庄，行至茨河。孰料，时匪首索金亭早于街上控制住有利地形，当赤卫队队长王子光率领先头部队行至茨河上街西边的灵济寺时，突然，枪声大作，农民军遭到敌军埋伏，上磨石李家湾一会员即被打伤。敌情不明，李绍棠立即命令后面的部队全部撤退。李麟率领着先头部队不敢原道后撤，因背向敌人，怕有伤亡，遂从流水沟下山顺河边经薛家河、胡家冲撤退。当晚赶到兰家湾，住在花栗树下。清点人数时，会长王达三不知去向，农会成员只剩下刘治、苏家保和李澄清三人。第三天早上，匪军和民团分途下乡清剿，群众纷纷逃避，暴动宣布失败。后王子光被捕牺牲，李澄清逃到了外地。后李澄清忆此慨然云：“茨河暴动虽然失败，但它毕竟是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具体表现，为以后谷城地区的秋暴摸索出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高如松自知，此次失败与领导指挥上失误有很大关系。一宣布暴动就应该抢在敌人未到茨河之前消灭民团，夺取枪支，占领茨河，补充武器。而不应该先绕道金牛寺在此过夜，因此延误了时间，导致敌人抢占了先机，使暴动遭到失败。

高如松数次组织农民与伪政府进行斗争，使伪政府对高如松及李麟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痛恨加深。谷城伪县长密电蒋介石称：“共产党气焰复炽，暴动凶猛，宜速防止。”蒋即驰伪总司令岳维峻驻防光谷两县，负“防共剿共”之责。岳维峻又派伪欧师长驻防石花镇，伪伍旅长驻防县城，伪田团长任游击司令。弹丸之地，驻如此之重军，款饷自然加重，农民群众之负担陡增十之有二。1928年5月上旬，伪欧师之队伍，到铜山一带强征

暴敛，高如松再次发动当地老百姓奋起反抗，结果迫使暴征未成。

5月14日，高如松与李绍棠秘密召集李晓葛、李麟、李庚尧等领导人和全县党员骨干到盛家垌附近一山沟里部署抵抗伪军之办法，着重部署攻打石花行动计划。要求各负责同志到斗争地密切联络农民群众，推举有威望有军事经验的同志负指挥之责。委李麟为临时总队长，黄宗友、沈德琪为盛家垌农民自卫军临时正副大队长；刘道一为薤山农民自卫军临时大队长；各大队长又选出李鼎臣、帅正国、冯弱寿、李月如、王子乾、郭爱学、傅春泉、傅万忠、陈兴志、陈明卓、何祖荫、汤宗发、刘胜余、王华国、任在俊、龙作云、柳甫臣、李庚尧等为各路分队长。李麟又委孟国夫为石花暴动副总指挥。

战斗即将打响时，李绍棠接到鄂北特委通知，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在枣阳遭到敌人重兵围攻，形势十分危急，特委改派李绍棠赴枣担任鄂北总队党代表。于是，李绍棠离开谷城前往枣阳。

1928年5月18日晚，在高如松统一指挥下，李麟统率农民自卫军及各大队参战群众近2万人，手持刀矛、棍棒等武器，星夜赶到石花，分别埋伏城外指定地点。次日拂晓，盛家垌、九里坪两支农军按照李麟安排，先从东门摸进城内，干掉哨兵，夺得一门钢炮，当即把炮口转向敌军驻地，发起猛烈进攻。炮声即是进攻信号。霎时间，李麟带领埋伏之众摇旗呐喊，分别从西门和北门冲进城内。时敌人从梦中惊醒，仓促组织还击，调动炮队、马队、步兵队伍计六千余人阻止农军进攻。然李麟已率队占领敌人控制之制高点——天主堂炮楼，向阻挡的敌人发起总攻。枪声、炮声、呐喊声汇成一股洪流，农民军个个怒气填胸，纷纷冲向敌步队、马队，甚至光背赤足，举刀遍砍，不禁让敌人瑟瑟发抖，畏缩不前。如此激战两三个时辰，未分胜负。李麟便让刘荣宗、汪大德、冯国顺、郑先炳、陈宗宽、陈宗义等组成“敢死队”冲入敌阵，在敌人炮火之下，手握长枪，嘴含大刀，

横冲直撞，左右冲杀，身上中了弹，仍前进不止。对此，敌人惊慌不止，丢弃大本营落魄而逃。炮火中，汪大德、冯国顺、陈宗宽、陈宗义等壮烈牺牲。刘荣宗仍拼命追杀敌人，把五个敌人追至数里之外，敌人猛回头，见只一人追赶，调头迎击，刘荣宗和敌人肉搏，气绝时犹骂敌不止，敌人将其舌头绞出，后光荣牺牲。汪大德六人冲入敌阵后，相互策应，左守右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余部纷纷逃窜。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赶走敌人，占领了石花镇。此次战斗打死打伤俘虏敌人 300 多人，敌团长彭国玺被当场击毙。此外，缴获钢炮 3 门，长短枪 200 多支，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衣物等。我方仅伤亡 20 余人。阵亡者有褚兴发、褚兴富、黄大启三人，重伤而死者有汤宗选、傅传宾二人；被伪队捕获枪决有分队长李月如、王华国、龙作云三人。此为高如松回谷城后发动的最光荣最有战绩的一次暴动。

农军攻伪师获胜，敌军很不甘心，一连几天密商计策，以图报复。高如松决定调各路农军回归原地，各负责人密聚一处共商应敌方略。众云，农军获胜之后，勇气倍增，应长驱直入县城，攻打伪旅长伍月友之部队，以使谷城之敌或灭或遁，以快人心。高如松认为，农军虽然人多，对于小股敌人可以取胜，然枪支太少，仅为敌人 1/50，靠粪叉、大刀岂是对手？当慎重考虑。李麟却云：“这次胜利后，各路农军都不肯离去，均要一鼓作气杀进城里，才肯罢休。”尽管如此，高如松还是命令各路农军先回原地，维护治安，防御敌军突袭。攻城之事从长计议。

5 月底，为慎重起见，高如松向鄂北特委汇报谷城暴动准备工作，并请示加派领导力量。6 月初，鄂北特委为加强谷城暴动领导力量，特派工农革命军湖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李实（抱一）到谷城任县委书记。

李实生于 1903 年，襄阳县东津湾人，1925 年入党。1926 年底任中共黄石港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兼农委书记，1927 年 1 月兼大冶区委书记，后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1月任随县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政治部主任等职。李实任县委书记后，高如松续任委员。



曾任谷城县委书记的李实（李抱一）晚年照片。

6月上旬，高如松来到盛家塄黄宗镒家里向李实介绍了谷城的党员情况和农民武装动态。李实得知农军想攻县城，便说：“攻打县城必须有策应，靠一哄而起不行，凭几把大刀和几支农军更不行，得发动方方面面之力量。”高如松便把当地各种红枪会、扇子会、白带子会等一一介绍，说：“谷城西乡的红枪会是地主刘克明依靠地主富农势力所办，与农军心怀不一，倒是姜步瀛在庙滩搞的大刀会和盛家塄黄宗镒搞的佛堂在群众中有些基础，农民都很参与并拥护。”李实建议去找刘克明谈，最好能为我所用。高如松便让李晓葛出面去找刘克明。结果，一听说攻打县城，刘克明很快就达成协议，称：“只要确定了时间，我一定参与。”剩下便是做其他堂会之工作。盛家塄佛堂堂主是黄宗镒，教师是孙孝承，工作不必细做。庙滩大刀会堂主是姜步瀛，姜是党员，高如松把县委意图跟他说后，很快就把大刀会发展到了茨河。时李实来到光化，欲把谷城党组织与光化党组织联合起来，通知左觉农和袁书堂在行动之前带领傅家寨农民武装和袁冲农民武装予以配合。

准备就绪后，县委立即成立暴动指挥部，革命赤卫队由李实担任总指挥，高如松任副总指挥，大刀会由周大贵任总指挥，刘克明任副总指挥，定于6月16日举行暴动。

谷城位于县境东北部边缘，汉水中游西南岸。汉水绕城而过，南北二河夹于其间，加上城墙高耸，城壕深宽，造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势。县城在1928年春驻扎着西北军伍月友一个旅的部队。旅长伍月友及其所部驻谷以后，大肆劫掠，大增捐税，激起了谷城人民强烈反抗。

1928年6月16日，农民革命赤卫队和大刀会众共2万多人组成农民暴动军，在县总指挥部指挥下，从城南中码头和城西过山口，城北后湖3处攻城。农民暴动军攻占三神殿、江西会馆等地，并消灭守城官兵数十人。

军阀旅长伍月友见农民暴动军来势猛烈，力量强大，下令军队撤入城内，固守不出，等待支援。战斗持续到6月21日，暴动军围城5日5夜，县城未能攻破，敌我双方互有伤亡，暴动队伍暂时撤出。对此，一些农民群众很不服气。没多久，大家集思广益，又想出一个摧毁攻坚之法，即用笨重的“大木喷”摧毁城墙。

所谓“大木喷”，即用三人合抱之粗木做成的土炮，一次能装20斤炸药，30斤铁斧头，威力甚大。

7月26日，农民暴动军2万多人第二次攻城。伍月友仍闭城不出。暴动军使用“大木喷”数次攻城，双方伤亡都非常惨重。大刀会小头目、共产党员丁德忠爬城墙时被打死，傅伯绩的大刀会也被打伤多人，其他赤卫队和大刀会都有伤亡，战斗很是激烈。由于农民暴动军围城苦战达一月之久，敌方不仅许多官兵伤亡，而且军需已基本耗尽。至8月3日，农民暴动军围城达整整50天，军阀伍月友已是穷途末路。可就在这时，驻河口的岳维峻却派遣田春生（外号田葫芦）一个团的兵力前来增援。田率队于拂晓从县城北冷家集、龚家洲、仙人渡3处将农民暴动军团团包围，暴动军由于长期围敌，此时已疲惫不堪，当敌人出现时，大部分尚在睡梦中。待敌人枪声大作，农民军方仓促应战。然敌人众多，不得已被迫撤退。此时，伍月友从城内杀出，刘克明由于受伍贿赂，此时竟率部叛变，暴动军陷入内外交困之状态。各路农民军，由于暂时获胜，轻敌思想极其严重，加之此次没上过战场的人过多，一没训练，二不知道约束。这些新参加的，有甘沟、廖家坪等处，有盛家以东雷祖殿、庙滩等处；还有太平店、龚家洲等处。虽说在暴动前，总指挥李实、副总指挥高如松通知过新参加的各路负责同志，但没来得及聚集一处筹商对策，故导致攻城部队先后不一，号令不一，指挥更不一致。俗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农民军对敌之布置几乎一无所获，无疑暴露出失败之征兆。尤其是刘克明叛变后竟做内应，使农民军陷入绝境。时敌人见农民军尚未到齐，也未布

阵，趁机下令所有步队、马队、炮队、游击团队等，分道同时发起进攻。城内伍月友部上到城墙或房子上向外射击。一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敌又趁机焚烧四处民房迷惑军心，以此扰乱农民军注意力。时刘道一大队只顾抢救老百姓和民房，另驻扎城镇左右一带兵众，骤闻各处火炮齐响未经战斗，即已手忙脚乱，莫知所措。胆壮者还想一拼，胆怯者或束手，或逃窜。一时我方尸首遍地，敌人只小有伤亡。黄宗友一队冲锋在前，利用打石花缴获来的枪支拼命和敌伪厮杀，沈忠禄、孙启有等则冲进城内，与敌交战。时敌马队一将官，手握长短枪两支，一枪射住沈忠禄。沈忠禄带伤，仍向该官刺去，不幸被敌将又一枪击倒。孙启有见状不但没退，反而向前冲去，竟将该将官一枪刺于马下，并将其长短两枪夺获于手。余敌多人追赶而来，孙启有至死不丢枪，敌人尾追至河边，孙启有负枪拼命扑河。将要登岸，被敌人一枪射中腰部，孙启有负痛托枪，拼命跑到我农民军前，说了句“见枪如见人”，口吐鲜血，倒地而死。

由于黄宗友之大队拼杀，牵制了部分敌人，前面撤退农军相继脱险。时李麟率一小队，正从对岸浅水处，迎着中码头河边打掩护，使得敌人不敢再追，为农军渡河赢得了时间。高如松与李实也在另一处拼死掩护，虽然炮火密集，二人却愈战愈勇。

由于敌人三面夹攻，农军唯一退路只有扑南河逃生，而南河之中码头，时值涨水，水深流急，故淹毙、打死在河中者甚多。河中漂流了一层尸体，河水也被染红了。此次敌人死伤不满百人，我方死伤至少两千人。大队长黄宗友、分队长罗绍堂、周圣卿战败被俘，一同枪决于县城外中码头；第十分队长冯弼寿被打死于南河中；孙启有、沈忠禄、吕光有、程惠哲、唐炮匠、帅本钧、帅本宝、马顺金、马顺银、帅本银、陈光春、帅本杰、杨月明、廖大贤、廖光财、廖光明、陈光彩、帅立禹、毕时雨、罗国太、邓大全、张棣仁、严国兴、陈兴学、汪光臣、胡晓春、龙作弼、王家言、岳维金、姚照、冯弼

贵、孔献明、韩荣辉、盛大林、饶杰臣、张发成、肖金洪、李正金、李七、李大和、李正成、孙启富、傅世琪、陈德贵、孙先银、帅本相、徐良明、李世禄、孙启才、李广元等均于阵前牺牲，此为暴动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失败。

据襄阳绅士张玉衡的日记所记：一月后，襄阳河滩上仍可见谷城暴动漂流之腐尸。国民党谷城县长李建唐在谷城暴动后上任时，给省政府报告信中对这场暴动牺牲的人数、惨况作了如此描述，曰：

此役众及良民死亡者有二三千人，至城关及龚家洲、水南等处，农房被焚者不可数计……

高如松深知，蕪山革命若楚祖肇始筚路，非蕴韧涵勇者不能越其艰。然真革命者就应该越是艰难越向前，无鸿鹄大志者安能存于蓝天。

就这样，谷城暴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高如松和他领导下的党员骨干始终未有屈服。在谷城县县委的领导下，他们积极准备着第三次攻城。县委吸取前两次攻城之教训，派人到光化与光化县委书记左觉农及袁书堂等联系，让他们牵制敌人，以防敌兵援助谷城；派姜步瀛率农民革命赤卫队到庙滩、茨河一带埋伏阻击南来之援军。

1928年8月24日，农民暴动军第三次攻城，伍月友见势不妙，来不及请示上司，急忙于东门组织轻重武器掩护，不惜一切代价突围。李实一面命令一部分农民军追击，一面率一大部分农民军攻城。县城很快被攻破，来不及逃跑的敌人和劣绅束手就擒。暴动军逮捕了与官府勾结的神甫尼诺，捣毁了劣绅胡国保、熊梦卜的住宅，吓得反动县长王信征仓皇逃走。接着又烧了城门楼，将城墙拆去大半，并将公文簿册收缴一空，投入大火之中，最后连县衙亦烧之。农民军还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鄂北特委杜仲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次暴动作了如实的记述：

谷城农民军将县城攻破，将县衙门烧毁，城墙拆去一半。就这样，历时 50 多天，谷城农民军硬把军阀 1 个旅从谷城撵走了。暴动的成功，显示了谷城人民向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进行猛烈尖锐斗争的力量，扩大了党和革命武装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不久，谷城县农民武装及其领导人即遭到国民党“清乡军”的疯狂报复。“清乡军”每到一处先是清查户口，发现有外出未归的非经商人员，即定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将联保各户全部处决，发现无“清乡团路证”行走者即予处决。仅在薤山一处烧毁民房 100 多间，革命者和群众有路途中被砍死的，有用非刑吊拷致残的，有捕获送县衙枪决的，倾家荡产、抛父母、撇妻子户十有八九。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主要领导人被迫转移。高如松转移到了襄樊李济武牧师家中；李陶庵、姜步瀛也先后到南漳、保康躲避。李实见谷城待不住了，奉特委书记廖划平的指示去了光化。

幸存者李晓葛这样回忆：

时各路敌人不遗余力地四处捕拿我党同志。仅盛家至薤山一线，就有伪清乡军团队，如陈巨川、张棣萼、周协甫、刘教之、盛大连等，专事抓捕之责。他们到处大出赏格，以三百大洋悬赏高如松和李晓葛人头，高如松先逃到了庙滩，李晓葛只得暂时远颍保康以给人放牛挑水方式隐蔽。薤山李陶庵、李麟，庙滩姜步瀛等均逃亡南漳、保康等县。而各伪队对于我方其他同志，也是一样的残酷蹂躏，有路遇途中砍死的，有用非刑吊拷致残的，有捕获送县衙枪决的，倾家破产，抛父母、撇妻子户十有八九。李实等同志，也不得不急急远离，暂避其锋。另外伪“清乡军”四处查获攻欧师缴获的枪支、马匹等，采取逼供和罚款。驻襄阳“清乡军”总司令李纪才，趁我农民军新败之余，又增派一团“清乡军”来谷，督促伪“清乡军”和各团队，赴薤山、九里坪一带“清剿”，计定斩草除根。1929 年 3 月的一天，陈巨川率领伪“清乡军”和伪团队千余人，突冲到九里坪小笋

芽峪一带，沿途大肆捕获，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冲至蕪山坡陈家院子，到了该院子抢掠一空后，竟把该院子一带完全焚毁（因为陈家院子是我党同志往来之地），并在那一带捕捉一些人，带县城收押示威。自是远近同志不得不远离。

至此，谷城革命陷入绝境。

四、辗转南京，寻找党的组织

由于伪“清乡军”和伪民团力量过于强大，使建立起来的农民武装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时蕪山一带的大刀会，以大地主为首的头目摇身一变参加了“清乡”，农民大刀会首领被迫逃离家乡。高如松在庙滩一带党员家里辗转，渐不能住下，又投住亲属，然亲属处久住亦成问题，便来到襄阳北乡找大地主出身的学生党员李自修和住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薛斌。薛、李在襄北混进了民团，很有威望，到他们队伍里暂住一时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便由庙滩附近渡汉水，经太平店，利用社会关系到了离太平店 30 余里的杨家湾住下，这里与襄阳北乡有土匪活动，行人断绝，不能前往。便又由杨家湾到太平店下头龙家巷章仁善舅父家（与其母是叔伯兄弟）。此时章仁善在岳维峻部他家门哥哥章××那里做司书，去时他的父母尚在，高如松在他家二楼上住了几天后，又过汉水到白马洞张大福家。张与他同学，自广东起义失败后一直居家，但其家是破产小地主，不能久住，故二日后又来到武安镇张雄家。张从樊城搬到武安镇，当时任南漳县委书记，以手工织袜子为名。他本是南漳人，生长在襄樊，这里有些亲属关系，夫妇小孩共五人，党员勾颖超与他们是亲戚，时也躲在这里。在张雄家刚住两天，李绍棠便由枣阳也来到了这里。李是到枣阳当工农革命军党代表的，还未到职，工农革命军就被冲散，因无处存身，方到这里。见面后，高如松把李走后之情形一一相告，李这才知道时鄂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已很

困难，便商量想由特委介绍到南阳特委方面去活动。几天后，二人一道由武安镇到襄阳东门外王作宾、王步岳叔侄处，见了特委委员余世颂，谈了到南阳特委去工作的意见，余说南阳特委有信来，说那儿风声亦紧。于是，二人又过河到樊城高如松外祖母那里，高如松找姨母章哲卿弄了十余元钱。当晚，李绍棠在高如松外祖母那里住下，高则由外祖母送到基督教牧师李济武那里过夜。李济武牧师是高如松姨母的老公公，他去时恰遇李金铭也住在这里。李金铭说，他离开谷城九里岗后准备回枣阳老家的，因家父与李济武牧师有来往，故歇于此。高如松说：“我离开樊城基督教鸿文书院就是因为当初自己反对过基督教活动，今晚到此打扰实是迫不得已。”李金铭说：“彼此彼此。”当晚二人约好了往后的通信地址，翌日清晨，便一起出城。李绍棠说要到上海未婚妻处，高如松便未等他。是日，李金铭由东回枣阳，高如松便过汉水到了距襄阳县城三四十里的一个集镇吴家集。这里属南漳地面，该集镇有家药铺，店主姓杨，是他一个叔伯伯姐姐家。住了几天，虽愿意招待，但离襄阳太近，有些不便，遂又到武安镇卫家。这是高如松父亲异母姐姐家，他当喊姑父姑母。姑父是破产地主家庭，以星相过活，他第一次到卫家，姑父还愿意接待他，故打算住过旧历年再作打算。本想再去张雄家住的，因张雄家住的人多，来来往往的客人不少，而家中只有两盘织袜子空机，又没有生产，高如松此次便未再登门。时卫家一个表兄爱抽烟，常在烟馆里吹嘘表弟高如松怎样怎样，此事传入如松耳朵，心里大惊。恰在这时，枣阳革命失败后有一两位同志逃到武安镇，被枣阳民团追到武安镇后捉住，因而震惊武安镇市面。武安镇是鄂北山区一个山货集散地，是个商业很发达的市镇，有一条蛮河往东流入汉水，可以行船。至1928年冬末，再到卫家住下去已很危险，高如松便作往新野打算。从武安镇往新野需经过襄阳南乡，樊城附近。襄阳南乡没有工作，这样便又想沿蛮河下去，拟走旱路到汉口，后往上海。

不久，行至钟祥县上边襄河附近时竟碰着薛斌，称在襄阳北乡不能活动，举家逃到离襄阳城卅多里的地方——薛家巷子，那里人都姓薛，与薛斌同姓。薛在襄河岸边一个过路店住了几天，店老板要他拿出钱合伙开店，他看不能住下，欲回襄阳城西薛家巷子。二人分手前，薛谈到了一个熟人孙伯愚，说他本想到枣阳买枪继续革命，没想到遭到当地群众反对，便去了上海。高如松问了孙的地址，便与薛斌分手，经钟祥、天门、汉川等县来到汉口。

汉口有高如松的一个堂兄，名叫高廉泉，高如松想到堂兄这儿暂住，听说堂兄在一家小报社当编辑，便兴冲冲地赶去，人却不在。此地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久待，高如松只好来到码头，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当晚乘着飞虎轮船，经过三四天的航行，来到了上海。他的目的是来找党组织的，但找党组织得有个居住点。找谁呢？幸有薛斌为他提供了孙伯愚所住信义会朱浩然牧师处的地址。于是，他便到了信义会。朱牧师没有拒绝，问他到上海做什么？他说：“找熟人孙伯愚谋事。”朱牧师说：“我认识孙伯愚，据我所知，他已离开上海。”朱牧师让他先住下，慢慢找事儿。这儿很安全，他晚上住在这儿，白天寻找组织。一天，刚出信义会门口不远，竟又碰到了薛斌。他问：“你怎么也到了上海？”薛斌说：“我和张星若他们一起来找马轶先的。”说完，便把后面的张星若和同来的叔父薛某等作了介绍。高如松知道马轶先，襄阳北街人，给孙中山当过卫士之类，住过一期黄埔，听说在吴淞口当了参谋长。便说：“找到马轶先，谋个当兵的差事应该不成问题。”薛斌说：“找了，不尽然啊，眼下蒋介石正在编遣军队，对非嫡系一直排外，轶先说在上海当兵不如去镇江。我们正是受轶先介绍去镇江当兵去的。”说完，又问高如松：“你找到组织了吗？”高如松摇着头。薛斌说：“不可能吧？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找到？”高如松说：“是的。”

不过，我还会继续找，一有消息，我一定给你们去信。”于是，相互握手，再作告别。

时间很快就到了过旧历年的日子。高如松仍然没有找到组织，正郁闷时，却看见李绍棠亦到上海。信义会的赵彬贞是其未婚妻，李到后就住在赵那里。高如松与李绍棠再次聊起谷城暴动，说：“李实到谷城后，我们一起组织了石花暴动，5月18日打垮了敌人1个团，打死彭怀玺军团长以下300余人，夺获步枪百余支、钢炮3门，可没想到6月16日再搞时竟遭到失败。”李绍棠说：“主要是我们的武器太少，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曾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组织再严密到底不行。”这对老搭档谈了很久，赵彬贞给他们沏茶，弄吃的，还建议高如松搬到她这儿来住。这是高如松巴不得的事。于是，他辞别了朱牧师，便和李绍棠住到了一起。

这天，李绍棠从街上回来，说碰到了一个熟人，是个党员，高如松也认识。李绍棠一说，高如松果然想起在军队时与那人见过几面。高如松有些激动，找到了这人，就能找到组织，于是急切地问：“他现在在哪？”李绍棠说：“我有他住的旅馆地址。”高如松当即拉着李绍棠朝旅馆奔去，可旅馆的人说，此人已经离开。高如松看着李绍棠的打扮，便说：“一定是他见你穿了件麻料外套，怀疑你叛变了，不敢再见了。”李绍棠一笑，道：“是吧！我原只是想让赵彬贞不感到寒碜，没想到倒把自己的同志给吓住了。”

回后，李绍棠便换了衣服。这以后，二人把主要精力用在打听和寻找党组织上。有一天，李绍棠又碰到一个熟人，说是北伐时在唐生智部的同事，原是一名中共党员，名叫曾雄镇，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此时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附中农场当主任。只是曾现在已无党的关系。高如松说：“没有党的关系，能到他那儿做事，躲藏一阵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李绍棠便与曾雄镇商量，让高如松去他的农场做事。曾雄镇很爽快地答应说他的弟弟是农场的领工，几个工人都是邻近的农民。于

是，便叫他的弟弟过来与高如松相识。让高如松与自己同住，白天到他弟弟那儿做工。曾雄镇常跟他谈些关于党组织的事情，说毛主席已经把红旗插在井冈山上了，蒋桂战争很快就要爆发等等。

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一天晚上，曾雄镇突然提起高如松的事，说还是应该补习功课，到暑假时去报考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公费，他可以帮忙。说完，便掏出几块钱递给高如松。高如松知道，这不言而喻是下逐客令，便笑着离开了农场，于次日再次来到闸北李绍棠的亭子间住下。到底是老搭档能共患难，李绍棠没说推辞话，安慰说：“要相信苦心人，天不负。明天起，我们共同去找事儿。”中午，李绍棠便拿着一张报纸回来，上面有一则招工消息，说是一个印刷厂在招学徒工，问高干不干。高如松说：“这个份上了，能不干吗？”于是，二人便兴冲冲地找了过去。没想到，等他俩去了，登记的人却说没有铺保不接收。二人又怏然走了回来。“怎么办？”长期住李绍棠处吃饭总是个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生活问题。正在这时，远在襄阳的姨母章哲卿写来一封信，称高如松高小的同学韩直卿在南京警卫团某营当连副，急时可去找他。高如松对李绍棠说：“现在就是着急的时候，当去找他。”李绍棠表示同意，说不久后自己也可能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寻找组织。高如松嘱咐：“只要找到了组织，一定相互给信。”于是，高如松与李绍棠洒泪告别。

1929年夏末，高如松几经辗转，来到南京。他常住三牌楼一个六福客栈，五分钱一晚。一天，他在三牌楼附近又碰到一个熟人——勾颖超，他不知勾什么时候从武安镇到的南京。勾和他来到六福客栈，告诉他是到北京去的，现住在三楼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通过勾颖超他知道了韩采芹（即韩化龙）自湖北竹山经老河口、南阳去了北京。高如松便与韩通信，方知马适安自襄阳流亡到了安徽，在一所基督教小学教书。

经联系，暑假期间，马适安自安徽来到南京，秋后将到山东青州师范当教员，月薪八十元。还说马与襄阳张家湾尚某通信得知李实（抱一）不久要到上海，马适安已告诉李实经过南京时见见面。快到秋季开学时节，李实、毛定方、陈××三人果然来到南京。马适安便让高如松与他到青州师范，住到他那里。在这儿，高如松获悉前鄂北特委书记廖划平自襄阳到了天津工作，且马适安与廖划平常有通信联络。李实到南京后与高如松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高如松说：“我很想到上海了解党当前的政策和指示。”李实答应帮忙促成这件事情，说有个老乡潘东周就在上海。李实走后，毛定方留南京，枣阳人陈××也从此离开李实。从此，高如松与他们二人就住在韩直卿房东老太太的一间小屋里。李实到上海后一再来信支吾未见着潘东周。当时南京市伪社会局有董老一朋友袁碧堂当科长（湖北光化人），有党的关系，南京市委秘书谭籍安是湖北宣城人，随袁在南京上学。谭籍安知道高如松是个党员，袁碧堂因在武昌他家里与高如松见过一面，也知道此事。袁说与李实很熟悉，高如松知道毛定方、李实和袁碧堂的外孙左觉农都是襄阳二师的同学，熟悉自是当然。时高如松自知去上海了解党的政策之想法不能实现，也未与马适安到青州。后干脆和毛定方、陈××三人与南京党组织发生了关系，来接洽的是一位高个子湖南口音的名叫元顺的中年人。

毛定方侄儿毛锦章属北京某大学毕业，认识阎锡山的参谋长襄城人朱绶光。朱当时是伪军政部副部长，毛锦章是该部一个科员，便为毛定方在该部印刷厂找了个司书职位；陈××到兵工厂当工人；高如松由中共南京市委介绍到中山陵园东凹子小学帮助教员汤藻教书。借此从农民补习学校入手，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当时中山陵园从北平招募了不少旧警察，多是山东人，分区驻守，距这个小学不远设了一个派出所，南郊市委无力量搞农民运动，后来这个工作就放弃了。汤藻是东台暴动失败后跑出来入的陶行知“晓庄师范”，后被派到这个学校

当单级教员，月薪 20 元，另外还有一个东台失败后逃出的农民住在这儿。

1930 年 3 月，襄阳形势有所变化。3 月 8 日，中央派湖北省执委聂洪钧来到鄂北，重新组建鄂北特委，聂洪钧任书记，李金铭任宣传部长，傅良驹任组织部长，宋良猷也被派到了豫南。聂洪钧说要发动均、光、谷连片暴动，故李金铭和宋良猷等写信催高如松尽早回鄂北工作。高如松接信后，心有所动，便由东凹子小学回到了三牌楼原来所住的地方，以作打算。

时值河南、山东等地蒋、阎、冯军阀混战正在进行，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在调集军队，部署陇海战线。中共中央想趁国民党无暇顾及鄂北之隙来一次总动员，以恢复党组织及群众武装。同年初夏，湖北省委在上海召开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李金铭、朱佑文代表鄂北出席，李被选为省委委员，又写信到南京要高如松与他们一道回鄂北工作。这时，高如松正接到姨母章哲卿寄来 30 元钱，需要到上海兑换，遂到沪兑钱后找李实商议。李实说：“李金铭、朱佑文已到南京找你去了。”这时，毛定方也自南京来到李实所住小旅馆内，说也准备到苏区去。赶第二天回到南京住地，高如松果然看见李、朱在此等候。李金铭说：“自李实到上海后，谷城县委已无人主持，你可回去赴任谷城县委书记，朱是特委委员，任老河口中心县委书记。”高如松表示同意，说：“等谭籍安回来后转好组织关系就回鄂北。”朱问：“得几天？”高如松说：“谭籍安现在上海汇报工作，约十来天到我这里来。”李金铭听了，很是高兴，于是便由高如松相陪看了孙文墓。翌日又送他们到船上，没想到小偷竟把高如松刚兑换的 30 元钱给偷走。李金铭临走，便给了高如松 10 元旅费。

后过了很长时间，谭籍安才来见高如松。谭说刚回来，他到市委书记孙津川那儿去了，一到孙的住处，就听房东说孙津川被抓走了。经打听，方知孙在赴下关大江街 58 号共产党员姚佐唐家开会时，被事先埋伏的国

民党特务逮捕。一同开会的7名市委委员无一逃脱。现在风声很紧，所以他匆匆赶来，通知高如松赶快离开这儿。高如松说：“我要回鄂北去，得麻烦您转一下组织关系。”谭说：“放心，你可以先走，关系我给你转回去。”于是，第二天高如松便乘船去了汉口。

到汉口后，高如松住第五小学内李文涛处。该小学校长、教员都是鄂北人，住了几天又到硃口基督教小学教员石田那里，有时到汉口协和医院护士吴德光处。吴是高如松小学同学，是石田的外孙。高如松想等候李文涛作伴走旱路回鄂北，不敢坐汽车，他怕暴露身份。后二人坐拉货的车到花园，走路到枣阳。李文涛乘车回到襄阳家里，高如松则留在高如权处，想弄点路费到南阳去见宋良猷，再由南阳经老河口乡下转谷城工作。去南阳主要想与宋良猷谈谈他对目前形势的看法，高如松认为，汉水东襄阳、枣阳、宜城一带，群众经过斗争有骨干、有条件，汉水西缺乏这个条件。而汉水东襄、枣、宜间受南阳、襄阳两个城市逆势威胁，距离京汉线不远，很难发展。1928年冬工农革命武装失败，无回旋余地便是原因之一。再者，汉水西地处川边、陕边、鄂西北，崇山峻岭，居高临下。高如松曾读过《国策》一书，其中记有秦国国王秦孝公由陕西南下灭上庸（今竹山县）大宛国，准备进兵宜昌，后国内发生问题，秦孝公才转回陕西。为此，高如松建议在枣阳一带恢复发展人枪数百时，即可拉到汉水西一带活动，这样将大有可为，这是他到南京后得出的结论。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着急，想立即赶往南阳。可高如权在枣阳无职业、无钱，还要等表兄、枣阳伪财政局长庄握生从襄阳回枣阳后才能设法弄到路费，这样便让他住了好几天。后庄握生自襄阳回来与枣阳驻军范石生部某营长一起坐汽车，庄为拉关系，请该营长吃饭由高如权作陪。庄介绍高如权是他的表兄，现在无事，营长答应有个书记官让高如权作，饭后即派一个士兵到高如权家取东西即去。高如松看见高如权随着一个当兵的来了，其表弟庄国材在这个时候也

来了，庄国材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走。高如松便随庄国材出去，后出枣阳城沿着小道西走。第二日到樊城北邓城董振家住了几天，因董振早于1927年5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襄阳西门外，故此次上门对其家人多有慰藉。后又到竹条铺附近原鄂北特委地下联络总站站长韩采芹（韩化龙）家住了一晚，得知采芹1928年暴露后到了竹山，曾任县委书记。1929年因形势紧张，又隐蔽到西北军郃子举部，以师政治处参谋为掩护，从事兵运活动，眼下正在临颖隐藏。得知此情后，高如松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这么多革命同事，死的死，逃的逃，至今仍有不少同志为了生存隐藏在敌人内部，为此，这更激起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接着他又来到乔家岗王理书家住了十来天，后过庙滩在姜步瀛家里见到了朱佑文。朱说：“你的关系已经转回来了，特委决定你一回来即任老河口中心县委委员兼谷城县委书记。”并指示高如松发展红军，一旦红军游击队成立，要建立党的组织，并亲自担任红军游击队政委。高如松说：“我想到蕪山李陶庵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开展工作。”朱佑文回后把高如松的想法向特委书记聂洪钧作了汇报，因为聂来后把特委机关由襄东的兔娃岗转到了河口一所废弃的教堂内，所以朱联系十分方便。时聂洪钧又指示，让高如松去襄东找赵英到襄南二区即宜城东王家集地区传达特委指示，布置解除王家集地方反动武装工作。

五、坚持不懈地领导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3月（农历），县委书记高如松与襄东赵英等人一起来到王家集，在北门外主持召开中共王家集特支第一次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以研究武装斗争为中心内容，王星伟、王平章、王清芝、王化清等50多人出席。会上，赵英介绍了枣阳余益庵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经验，高如松布置了解除王家集地方反动武装的工作。会后，

王家集党组织立即行动，调查土豪劣绅的情况，研究应铲除之对象，到处张贴“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参加我们的工作”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开始了武装暴动的各种准备。

4月中旬，鄂北特委在袁冲下四河淤召开红五月暴动筹备会议，因高如松尚住在柳树沟表弟陈尚辉家里联络往保康有关事宜，便让黄子萍前往参加。参加会议的有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五县党的负责同志和代表80多人。具体是襄阳李金铭、王振三、李自修，枣阳程克绳、张履中，谷城黄子萍、均县傅安达，光化袁书堂、杜仲安、薛一字、肖克富、毛亭、袁之惠，老河口熊玉珩、宋大振、高好等，会议由书记聂洪钧部署具体细节工作。聂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的均、光、谷、襄、枣五县举行武装斗争，并宣读了他亲自拟定的暴动计划。

不久，高如松从保康回，来到乔家岗妻子王玉娥哥哥王理书家里打听有关情况。没想到玉娥正住王理书家。王理书说：“现在时局有所缓解，你可以把玉娥带到石花街背后黄家大峪去住。”高如松知道那儿有一个近亲，比较富裕，刚好是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便带着玉娥来到黄家大峪住了七八天，后同一位姓徐的来到保康歇马河，见到了保康县委书记柳德彰。这次主要谈了如何武装问题。听说小地主李子扬掌握着一部分枪支，当下很是活跃，他是哥老会分子，如果争取过来，定有大用。柳德彰便想办法让他与李见了面。没想到与李见面竟话不投机，李说不想离开本地，这样争取李子扬就没有了希望。高如松听说岳父王达三就住在歇马河附近，此时已改姓黄，便又来到歇马河与岳父同住，所有工作均在这里联系开展。黄子萍来到这儿把下四河淤会议精神向高如松作了汇报，说特委红五月暴动中心是光化，谷城可以不那么加紧等等。又说傅春泉已回，并在当铺等地吸收了20多名游击人员，还打了几次漂亮仗，周围的

敌人都怕见到他。为此，特委派人来联系工作多在他家。高如松说：“那我就到傅家去，把谷城行动计划跟朱书记商定。”不久，高如松便来到盛家，到了傅春泉家里。这时已是1930年4月，高如松和傅春泉商量，把当铺游击队正式更名为当铺红军游击队，傅春泉任队长，高如松出任政委。傅春泉很是高兴，便与高如松联手在当铺一带开展活动，声势大大超过从前。不久，朱佑文也来到傅家。于是，高如松便谈了自己这些天思索的活动计划，说想到保康找个据点，再去房县城内去找李民权，到竹山官渡河找芦渊，他们都是党员，但数百里之间往返一趟颇不容易，因此与朱商议，谷城与老河口合并为一个中心县委，朱为书记，自己为委员，仍在蕪山、庙滩一带活动。

朱佑文表示同意，称报特委批准后实行。又说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后，要求鄂北特委加紧准备武装暴动，首先夺取一县和几县的胜利。为此，特委决定五月暴动从光化开始。在下四河淤会议上，特委把时间定在5月1日，还把鄂北第五总队总队长张履中和襄阳的王振三调来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袁书堂任总指挥，目前张履中正和党员薛峰轩、袁国涛们搜集着隐蔽前埋藏的那些枪支，听说刨出了100杆长枪。高如松说：“有了这些枪，就可成立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干了。”朱佑文说：“张履中是想成立光化北乡红军游击队，想让王振三同志担任队长，隶属于光化临时县委领导。”朱佑文又问谷城组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高如松便把傅春泉组织的20多人游击队如实说了，朱佑文说：“人太少了。”高如松便说：“还有庙滩的姜步瀛也拉了几十人的队伍，如果再把均县纪大纲和房县李民权的人手组织起来，谷城即可得到多方策应，这样就能发起暴动了。”

朱佑文知道特委把重点放在光化，谷城发不发起无关紧要，就没有细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光化的袁书堂想把准备工作搞得充分一些，便把暴动时间推到了5月5日，决定4日晚在他家里开会进行部署。而4日晚，

袁书堂、张履中、王振三和北乡区委书记薛一字等刚组织党员薛峰轩、袁国涛、袁德胜、陈三云、肖克富等骨干分子，陆续来到袁书堂家里，刚布置完暴动细节，就被北乡反动民团团团长袁国瓚和土匪头子李士铎的耳目侦悉。袁、李之流串通一气，指派心腹干将袁之芹、孙黑敬、傅五掌柜、高二球等率领一帮土劣，全副武装，悄悄地将袁书堂住宅紧紧包围。由于猝不及防，袁书堂、张履中、薛一字全部牺牲，仅王振三借着桌子掩护，从房后猪圈里突围了出去。

这件事情对聂洪钧打击很大，因为光化暴动流产，会使其他县区受到影响。已经集中起来待命行动的赤卫队得知袁书堂被杀纷纷散去，一部分逃进了鄂豫边大山中。他命令王振三前往联系潜藏的赤卫队，重新集结，伺机再起。然过了很长时间，王振三报告：“进大山里的赤卫队员无法找到，散在外地的也没有人前来联系。”光化暴动就此流产。

特委没有办法，只好派杨秀阡赴枣阳组织武装暴动，以争取战绩；并指示谷城也要组织暴动。

对于光化5月暴动的失败，1930年6月10日《程祖武给中央的报告》（《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214页）如此评述：

5月初特委决定鄂北暴动首先从光化开始。这时，光化县北乡的农民武装已发展到120余人，有长短枪百余支，并在土匪队伍中争取到百余人。但由于保密不够，行动计划被敌人察觉，加之负责人不坚决，恐怕一动要招失败，本来决定5月1日举行暴动，改到5日晚。4日，军事负责人开会时，又携带枪支在外放哨，被当地反动民团团团长袁国瓚（袁书堂的堂兄）之子发觉，随即遭到敌人包围。张履中、袁书堂和光化北乡区委书记薛一字等4人当场被杀害，王振三等脱险，暴动计划流产。



无疑，这是一次“左”倾冒险主义操纵下的失败和教训。

后朱佑文又来到谷城，拟把特委的指示转告高如松。因高如松已去了均房，与纪大纲、李民权进行联系，朱便把指示信给了交通员王大汉，让王大汉转交。

高如松表弟章培耀晚年照片

5月底，高如松从均房回。先与姜步赢取得联系，说服姜把新发展的游击队与傅春泉的游击队合并，组建一支红军游击队。高如松指示，这支红军游击队仍然依托蕘山开展游击活动，等待时机成熟即发起暴动，这与鄂北特委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开会研究，高如松发现目前谷城基础比较好能够举行暴动的，就只有太平店肖庄，因为其间肖庄共产党员肖元凯曾到谷城找过高如松说过暴动的想法。他准备把这个想法向特委汇报时，朱佑文又来到谷城，听高如松这么一说，便当即同意，谷城暴动即从太平店开始。

于是，高如松即派交通员与太平店肖庄共产党员肖元凯联系，于第二天傍晚，来到约好的地点——太平店龙家巷。刚走到巷子口，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跟他擦肩

而过，他立马警觉起来，驻足转身瞄了一下这个背影，觉得有些异常。巷子里面就是他七舅章仁善家，上楼后，太平店党员骨干张秀、肖元凯、肖元铎和表弟章培耀已在此等候。章培耀说：“人都到齐了，等着你指示。”高如松说：“长话短说，我来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怕有情况。”说完，便对太平店暴动计划作了简要陈述：“定太平店王绅士之子王富民为内线，听他的信号行动。到时，庙滩的姜步瀛和盛家坨的傅春泉红军游击队会来策应。”张秀和肖元凯、肖元铎听了都十分高兴，决定挑选 100 名骨干届时举行起义。

正说着，只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朝他们奔来。

高如松说：“有情况。”遂带领大家下楼。刚出门，便看见七舅章仁善跳下马来，急切地说：“赶快离开这里，章培德叛变了，他向李朗星告了密，李朗星已带人来这儿抓你们来了。”说完，又纵马回奔。

高如松当即离开，张秀、肖元凯、肖元铎等也分散撤退。

不到一根烟工夫，李朗星果然带人赶了过来，先把章家楼房团团围住，后令章培德带队上楼抓人。

然而，已为时过晚，楼上仅有章培耀郎舅四人围在一起打牌。章培德不服，他亲眼看到高如松从巷子口进来的，不可能没有。便让随行士兵进屋搜查。然一阵翻箱倒柜之后，终一无所获。

肖元凯回肖庄后，紧锣密鼓地挑选精壮农民，赶第二天下午，便挑够 100 人，且都有大刀长矛等武器。另外，肖元铎到太平店街上发动近百名人力车师傅，以抗车捐车税为由，届时配合农民军找太平店团防局算账。同时，定下起义标记为光着左臂，头系白布。



6月11日，特委又专门派来军委委员熊玉珩亲自指挥这场暴动。肖元凯、肖元铎召集挑选好的百余精壮农民，手持大刀长矛来到肖家庄一间房内树旗宣誓：为穷人而战，为翻身拼命！熊玉珩宣布了特委的指示计划，要求农民赤卫队在消灭太平店团防局后，立即转移到谷城北乡与枣阳、唐河或光化交界地带，依托山地打游击战争。大家情绪高昂，表示愿意听从特委领导指挥。于此，太平店暴动的预备工作全部组织到位。

太平店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肖庄村党支部书记肖元凯

没想到，当晚，暴动计划泄露，当地团防直奔肖家庄试图包围。然而，定好前来策应的庙滩姜步瀛和盛家傅春泉红军游击队还没有来，怎么办？熊玉珩同肖元凯和肖元铎商量，若想等庙滩红军游击队的策应怕来不及了，不如派人就近去老河口通知地下党让他们火速赶来策应，赤卫队可以提前暴动。

方案既定，百余名农民高举着大刀长矛，跟着熊玉珩、肖元凯、肖元铎从村北抄小路，先包围大冲团防，把大门推倒，缴了团董傅光宗的5支长枪。接着，又在往太平店的途中缴了谢绅士6支门枪，抄了数家土豪劣

绅的家，缴获门枪计十余支，于天亮赶到太平店街上。时已有百余名人力车师傅把团防局围住，准备为暴动农军策应。然而，由于王富民经不住其父亲拷问，道出了暴动内幕，没能打入团防局内进行策应，从而导致暴动队伍遭到反包围：太平店南门被王中兴带着团练一大队守着；东门被黄鹏程带着二大队守着；北门由李兴三带着三大队在这儿守着，唯一的通道只有西门。可西门口就是汉水，到了汉水边再无路可走。时外面的敌人正向里面围攻，团防局的人向外面攻打，熊玉珩、肖元凯领导的赤卫队腹背受敌，危险就在顷刻。

就在这时，高如松和傅春泉、姜步瀛率领 40 人的队伍突然从南门码头边杀来，一下让暴动农军逢凶化吉。原来，傅春泉和姜步瀛接受指示后，怕路途遥远，中途误事，便建议提前率队来到太平店。正在两杆团丁恐慌之际，老河口 10 多名地下党员也赶来助战。三军协力合击，很快将敌人击溃，打死打伤 6 人，团防局团总茹树鼎乘乱逃之夭夭。

此次暴动缴获洋枪、步枪 20 余支，物资一批。因担心谷城县民团得知太平店暴动消息后会从格垒嘴、庙滩一带出兵拦截，傅春泉只好作出撤离太平店的决定。走前，高如松劝熊玉珩、肖元凯同去薤山，熊玉珩、肖元凯坚持留下召集群众大会，趁势把此次战斗胜利很好地向群众进行宣传，为成立苏维埃政府造势。高如松再三叮咛，一定要相机行事，方与傅春泉、姜步瀛率领 40 余人的红军游击队从小路经白虎山向根据地撤去。

太平店群众听说共产党要开群众大会，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太平店。这时，聚集在周围的地主团练和反动红枪会看见红军游击队已经撤走，只剩下肖庄为数不多的农军，便纠集一起，决定实施报复。

由于熊玉珩、肖元凯等缺乏军事经验，召开群众大会时，时间过长，直至下午，即被反动团练和红枪会包围。肖元凯和肖元铎虽奋力反击，终因敌众我寡，于战

斗中牺牲。熊玉珩被茹树鼎活捉后坠上石头，丢进汉水被活活淹死。

太平店暴动在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当天就遭到失败。但这并没有丧失高如松争取胜利的信心。7月上旬，高如松与傅春泉密商，带领杜贵年、陈志全、彭国清等5名游击队员，乘夜晚袭击了粟谷联保处，缴获长枪8支，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后高如松又找到傅春泉和姜步瀛再次密议行动计划，经反复斟酌，最后决定当铺游击队与庙滩游击队联手，夜袭庙滩联保处。

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案例。10月6日晚12点，高如松率领傅春泉和姜步瀛的红军游击队赶到庙滩附近联保处埋伏下来。此时，联保处办公室灯火通明，该处主任张品三、屠宰局长朱大康和几个劣绅正围在一起打麻将，而团丁们已经入睡。傅春泉和一名游击队员敏捷地处死了值班哨兵，然后带领盛家游击队冲进了办公室。同时，姜步瀛也率领庙滩游击队闯入偏房团防队住处，高如松和傅伯绩率领几个游击队员隐蔽在原地负责接应。战斗打响后，游击队员们高喊“缴枪不杀”，团丁们魂不附体，纷纷举手投降。办公室里的土豪劣绅也跪在地上求饶。屠宰局长朱大康、劣绅詹义善还未来得及逃走就被打死，詹石安和龚明先两个保董当场被砍伤。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缴获步枪6支，短枪2支，子弹千余发，另有两匹枣红马和几十块现洋。联保处除张品三逃跑外，共打死打伤7人。此战大长了游击队士气，为在蕪山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2月，中共襄阳县苏维埃党代表李庭兰被派到谷城开展地下工作，高如松与他一起确立了开辟和建立蕪山游击根据地目标，并与李陶庵在蕪山脚下秘密发展游击队。至1931年初，队员发展到30多人。

2月，听说兴山到了红军，高如松与蕪山的赵星三赶到保康歇马河想与之联系，到后方知是兴山县地方游击队。于是，赵星三借机见了李子扬（赵亦是哥老会分子），但李子扬很狡猾，见面后仅是一般应酬。赵便未

敢深谈，让柳德彰设法做李子扬的工作。或许是柳德彰做工作之缘故，3月间红三军到达兴山时，李确未配合地主的大刀会攻打红三军。

1931年3月，高如松任谷城县委书记，决定把当铺、三官庙、庙滩三支游击队拉上蕪山，合并成一支70多人、30多条枪的游击队。时红三军已打下均县并转移到房县，这时，朱佑文奉特委指示通知高如松代表鄂豫边特委到均县游击区巡视工作。谷城县委书记的工作由李庭兰同志接任。时红九军游击队亦在均县活动，队长张香山

（1930年底因骑兵连哗变损失70人枪、马，与政委贾步根同被特委撤职离开红二十六师，张来到均房，贾回了河南省委）与当地党委有意见，与当地红色补充营步调也不一致。均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郭潘（红三军所派）提议组织军委会，由红九军游击队长张香山、政委黎青

（陕西人）、均县红补营长徐达、政委金声，均县苏维埃主席高泽普和高如松为委员。后高如松为主任，高泽普为副主任。二人同随红九军游击队活动。高如松于均县任职，鄂北特委便于4月选派宜城县委书记胡培洲

（胡统一）来到蕪山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协助谷城县委书记工作。胡培洲与李庭兰一起，率领蕪山游击队，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栗谷、紫金、石花、盛家坨、当铺、庙滩等地。

5月，红三军北上占领房县后抽调一个团的兵力挺进谷城。贺龙交给团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一个秘密任务，即与谷城党组织取得联系。汤、朱活动数日未能与谷城党组织接洽上，遂离开谷城。走前把联络地方组织任务交给班长龚春林，让他留在温坪伺机完成。

时高如松所在红九军游击队因地主民团和反动大刀会围攻，游击队撤退到房县境内。当时白军五十一师范石生部进攻房县城，均县部队和工作人员随红三军绕武当山打了一圈，白军撤离后又随红三军到了房县城。时均县红色部队成立了鄂北独立团，张香山调红三军。由

红三军派来一个团长，金声为政委，高如松遂离开均县机关。红三军政委邓中夏欲调高如松到红三军工作，中华苏维埃特派员柳克明（柳直荀）在场做工作说要留高如松到地方工作，高如松未轻易表态。后高如松住特派员柳克明（柳直荀）办事处，不几日，邓中夏便派他参加房县近郊土地分配工作。不久又叫便衣队接高如松到谷城等地收买子弹和收集情况，这样高如松便又回到了蕪山。当晚，他找到李陶庵、赵星三等，到龙滩等候便衣队。便衣队由蕪山到盛家镇上缴了民团八支步枪，折回到龙滩后把步枪交给了李陶庵。同时，高如松由房县与马正泉二人带的四支手枪也交给了李陶庵。这四支手枪是从红三军要来的，给李陶庵的目的是想组织和壮大蕪山游击队。李陶庵率队回蕪山后，高如松便来到傅春泉那里与朱佑文见面。将从房县携带的300元法币交给朱，朱当时将80元给了一个青年党员（南阳商会长的儿子，在老河口工作），想让其拿钱回老河口营救一个被捕的党员。后听说这个青年党员拿到80元钱后就跑了。高如松告诉朱佑文，一定要在老河口、襄樊设法为红军购买子弹。

6月，特委任命李庭兰为谷城县委书记。高如松便和李庭兰来到温坪开展农运工作。

时红三军所留联络员龚春林已与蕪山游击队帅本朝联系上，并和李鼎臣等晤面。一天，高如松接到帅本朝报告，说龚春林有意和谷城地方组织联系，请到蕪山与龚洽谈。高如松、李庭兰便以县委名义来到蕪山与龚春林见面，另还有一个姓夏的。没想到此次交谈甚为投机。龚春林向高如松传达了上级指示，欲在蕪山竖起工农红军的旗帜。高如松当即同意，定队名为蕪山红军游击总队，龚春林任参谋长，负责主持一切要务。龚兴高采烈，为扩充实力故，又成立了十个大队。龚提议派人分途提枪采粮，部下俱是拥护，参加者甚众。然龚春林今日派

一队人到东，明日派一队人到西，不分贫富任意抢劫骚乱，引来群众甚为不满。

时李庭兰听说到鄂北指导工作的宋良猷病得不轻，便说要回鄂北一趟，剩下高如松一人在温坪、当铺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忙得不可开交，对龚春林的活动情况一概不知。李庭兰回后大谈鄂北的大好形势，说红九军二十六师正值旺盛之际，军队有 800 余人，枪 600 余支。随着队伍逐渐壮大，边区革命委员会也在傅家湖安顿下来。他去时正逢宋良猷在这里召集襄枣宜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四中全会决议的土地法和整顿襄枣两地县委指示精神。当时枣阳县委书记是陈国忠，襄阳县委书记是王振三。会议开了五天，从时间上讲可谓空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参会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共 30 余人，会议为完全没收地主土地同时不分给土地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涉及很多参加工作同志的利益，所以意见有分歧。当时襄阳和枣阳党员干部中有不少是小地主，所以在确定坚决执行中央土地法政策时，需尽量照顾给予解决同志家属生活的实际问题。有同志建议，土地没收后可搞小商小贩维持生计。这样，工作量就增大了。当时枣阳搞起来的联庄会，有小地主参加。襄阳回去的学生小地主亦多，从武昌回来的大地主亦不少，故需花十二分的精力说服他们。先是在枣阳开了三昼夜会议，因陈国忠工作不积极，便改由王君恩为枣阳县委书记，侯达夫为县苏维埃主席。又说宋良猷病得很重，这时已不能骑马行动，名义上是特委派来负责指导工作的，实际上是不能行动。每天开会，他只能口头传达指示，就是他的指示，鄂北六月份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特委鄂北分特委，由张慕騫任书记，余益庵、吴寿青、王君恩等人为委员，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也做了调整，由吴寿青担任。这时，余益庵又打了几个小仗，进驻到新街等待特委新的指示。

这时，余益庵听说红三军已到均县，又听说段德昌率红九师北上来接应贺龙的红三军。敌五十一师忙着对

付红三军，便使襄枣宜苏区一度安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李庭兰便趁星夜赶了回来。

（当时的鄂北情况确实比谷城好，至9月中旬，红九师从荆门来到宜东田家集与红二十六师会师，红军力量变大了，宜东、钟北大部分地区都建立起苏维埃。为此，鄂北一块开始稳定。后段德昌和贺老总会师后，于10月初离开宜城时又给二十六师留下二三百支枪，二十六师的枪支达到一千多条。此时，宜东、钟北都把贫农团、儿童团组建起来，各苏维埃开始平分土地，坚持地主不分地。但经济政策尚未建立，苏维埃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土豪，以后又建立了被服厂、军械厂，同时，医院也建立起来。至此，襄枣宜苏区正式形成，并进入有史以来最旺盛的时期——作者注）。

1931年9月底，高如松受特委指示到均房工作，途中住当铺傅春泉处。这时，房县已建立红二十五师，并由房县开到石花街追赶民团到谷城，折回到盛家垱。高如松在傅春泉那里听说盛家垱到了红军，以为是红三军的部队，想随部队回房县。晚上到了盛家垱，见到红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等，谷城县委书记李庭兰也在那里。他们好像刚吃过晚饭，朱勉之对高如松说，红二十五师和谷城县委开了联席会，决定了三条意见：一是薤山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二是决定由高如松当主席；三是收缴龚春林的枪支。高如松一听，当即说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当初让龚春林在薤山升旗是他同意的，让他当参谋长主持一切也是他定的，现在突然收缴龚的枪，自己怎么给龚一个说法？再说，当初龚春林与谷城党组织发生关系是朱勉之按照贺老总的意见安排的，如果说缴枪就缴枪，怎么向贺老总交代？于是，他申述了自己的意见。汤慕禹听后从中解和，说：“你不当主席算了。”朱勉之却很生气，说：“如果这样，你可以离开这里。”高如松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关于收缴龚春林枪支一事，我知道龚春林信仰红军，如果你们觉得不

放心，可以派一个人去当政委，给他以均、房、谷游击队的名义，让他发展。”朱勉之说：“我们是怕他会当土匪控制不住，所以才决定要缴他的枪。”望着朱生气的样子，高如松心里清楚，朱虽不是自己的上级，但朱是红军政委，有权指挥地方党。他又看了李庭兰一眼，这个初中生，太年轻，坐在那里竟一言不发，像是已服从了朱的决定。“怎么办？”高如松在心里划算，这时候朱佑文远在老河口，红三军又回洪湖了，要是与朱勉之的关系弄僵，自己怕只有离开汉水西的份了。另外从外部环境看，当时五十一师仅有四个团，与蒋介石有矛盾，不愿分兵去攻打红军，民团力量又不大，盛家离谷城 30 余里，农民看见红军到了都自动地组织起来了。这时候自己这样偏颇，是不是有些右倾？再说自己又不愿意离开汉水西，不如顺从了朱的意思。于是便说：

“如果这样，我答应作县苏维埃委员，推荐赵星三当主席。”汤问：“为什么？”高如松说：“因为他是哥老会分子，与薤山群众有联系，这样方便工作。”朱勉之便同意了高如松的意见。于是，高如松就离开会场到了黄宗镒家，当晚即在黄家过夜。

翌日清晨，敌人突然袭击盛家，红二十五师当时仅有两个营的兵力，未组织反击就撤退到薤山。朱委任了一个县大队长，一个副主席（都是洪湖干部），当即带红二十五师转回房县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日清晨白军突然袭击盛家时，正是红二十五师收缴龚春林枪支之时，当时用梭镖把几个大队长杀了，龚春林带到薤山后亦被杀）。后李晓葛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出来，说是李庭兰向汤慕禹告发的，汤怕龚起事，便设计以攻打谷城为由要龚配合，顺便将龚诱捕。

当然，李晓葛说得很是客观。他在 1956 年写的《薤山红旗永世飘》中这样回忆：

一九三一年三月前后，我贺龙将军率部经过薤山一带，活动于温坪、石花镇等地。后率部到房县，其部下

汤师长离蕪山时，有一位名叫龚春林的，留在温坪一带活动，先和帅本朝接近，后和李鼎臣等晤面。他谈的都是革命事业，并说老红军特留他在此串党。四五月前后，高如松、李庭兰等来蕪山，相谈甚是投机。运动已久，遂人多马壮，龚春林就主张在蕪山竖起红军革命的旗帜来。自是龚春林在此主持一切，兴高采烈地派人分途提枪采粮。当时参加者日众，龚春林又为扩充实力计，成立了十个大队。李庭兰常和龚春林谈心，要他认准党的方针。龚春林总是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始终不主张开什么大小会议，更不谈苏维埃政府，致使新参加的同志从未进行苏维埃政府工作，只是扩军筹粮。后李庭兰又和张茂修、李陶庵、姜步瀛等对他提出批评，龚俱不接受。长久独断专行，仅以十大队意见为意见。李庭兰、李陶庵等同志，以很强硬之态度令他改正，龚春林竟提枪相问，喝动队长直将李陶庵之子李世弼捆绑，推出斩首。后幸赵星三将其抱住和多人苦劝，始释放。李庭兰只得将此事报告房县老红军，老红军汤师长即派政委朱勉之来蕪山调查指导。朱委员调查后，遂在台上讲话，提出龚春林种种不对之处。龚即在台后拔枪欲打朱委员，又有赵星三抢步上前将龚抱住，朱委员始脱离危险。朱委员将龚春林之野蛮行动报告与汤师长，谓龚春林不是来蕪山革命的，是想在蕪山当大王的。汤师长闻报忿极，但知龚春林已拥有二千余众，对一切满不在乎，早已视组织无睹，便欲计取。不久，汤师长率部声明去攻谷城，走到石（花）镇，饬龚春林率队协助攻城，龚遂率队来攻谷城。走到县城附近，因城内有备，便虚张声势打了一下，遂令队转回，绕道至盛家，将所率队伍，驻扎盛家东头，汤师长借故点名，始将龚春林和龚春林所属亲信聂汉章、周于锡、朱朝璧、汤正顺、张树，还有一个姓帅的共七人，一并扣押，带到蕪山之牛角山下，一同正法。将龚春林带至蕪山游泳池边，用枪击毙。其余查得无异心又很忠实者，仍留队工作，不愿者任其解散。

.....

李晓葛在文中对之后情形也有记述：

自龚春林一案后，远近各重要同志，又纷纷拢来，大开会议，重整旗鼓。房县老红军又派来一位委员李健如同志，到薤山和高如松、李庭兰等共同计划，重新整编。又有胡统一（胡培洲）、余益庵等同志来此，分赴其他各地领导一切工作（胡统一多在老鹅山、观音沟、姚家坡一带领导工作，紧张时多隐匿于陈兴志、陈明卓、陈弼德和帅本惠家。余益庵亦多在此一带，往来于里坪之小笋峪领导工作），开始组建薤山苏维埃政府，当时有张茂修、王子乾、赵星三、傅春泉、李洪善、孟国夫、李陶庵、李鼎臣、刘观荣、姜步瀛、帅巨川、任定荣、周满义、李庚尧、李世富、章振银、章振清、冯文训、郭爱书、鲁炳书、李世卓、廖世有、郭仁夫、李楚昭、任在俊、李楚俊、王保廷、李兴让、李世湘、任在朝、周世敬、柳甫臣、刘胜余、王子斌、傅伯绩、周于明、杨兆福、帅本朝、黄升选等三十余名负起政治宣传责、武装责、经济责、交通责、文书责以及其他责。此时由李庭兰同志负全面责，口号喊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地主分田地！”接着组织苏维埃乡政府，不满二十日组织乡政府二十多个。如薤山之张坊乡，组织了两个乡政府；薤山之里坪乡，组织了两个乡政府；薤山之铜山（大岭坡），组织了一个乡政府；薤山之万家老屋场，组织了一个乡政府。还有岛岩沟、真武观、黄瓜河、兴隆乡、财神庙、盛家埧、三官庙（即观坡乡）、甘峰、小沟、回龙观（即张棚村）等。各乡政府都有少数武装同志负责维持，都是生气勃勃、不分昼夜地去干。不料，就在我们整编之后，又去组建乡政府，此时，伪政府趁机迭次派伪队长刘克明等来攻薤山，影响很大。最后一次刘克明等很秘密很迅速地又来袭击，途遇我交通员刘

观荣（外号牛角子），化装采樵。他们当即把刘观荣揪住问道：“你快说红军在哪里？”刘观荣从容地答道：“我在这一带打柴，不曾看见红军。”敌人持枪在手，威胁道：“快说实话，不然，我就这一枪。”刘观荣仍从容地答道：“确实不曾见一个红军。”他们遂把刘观荣放了。蜂拥而进，走不到二里地，“突”的一声，枪声四起，我军冲下山来。骇得敌人连滚带爬，弃枪逃窜。结果，打死敌人六名，活捉十二名，夺获步枪十支。从此，刘克明再不敢来攻蕪山。

从整个事件看，当时李庭兰把情况反映给汤师长没什么过错，只是汤、朱在处理此事过程中过于情绪化。尤其是高如松据理力争后应该有所让步，接受高如松的意见。但在执行中，只接受了高如松推荐赵星三当主席的建议，而关于处理龚春林的建议却未被采纳，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同志之间所评都认为是失策的。对于这件事情，《谷城革命史》是这样评述的：

红二十五师改组整顿蕪山游击队，实际上是从“左”的观点出发，对从旧营垒中投奔革命的地方军政干部以及对同情、支持革命的地方武装人员，采取求全责备，以至排斥、打击的错误政策。龚春林在洪湖苏区参加革命，多年来跟随红军南征北战，随红三军到谷城后，被留下来帮助工作，在敌人两次大“清剿”中，都表现了果敢的指挥能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但由于和县委领导人发生矛盾，便被扣上“不服从党的领导”和“乱杀人”等罪名被处决。而且对他手下的几个神兵出身的大队长，红二十五师由于怕他们在龚春林处决后不服红军领导，沦为土匪，也受株连被处死。这种过“左”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对蕪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此，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85年下发文件，认定龚春林等人属于肃反时错杀，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人员对待。

10月上旬，龚春林被处事件后，高如松即与李庭兰分头下山组织群众，高如松由盛家疃黄土河一带活动。没过几天，“均光谷联防总指挥”余希珍部即联合谷城十大中队计2万余人开始包围薤山苏区，当时全县游击力量共计才1600多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不能硬拼，经商议，我红色游击队由薤山向房县方向撤退。撤退之前，因队伍伤了不少人，便找了四五十个农民组成担架队护送伤员。

中旬，高如松掩护李庭兰率领游击队主力退到房县后，自己率领的最后一支游击队在与敌激战中被打散。时余希珍部联合谷城十大中队在薤山上下路口严密设防，到处可见“清乡”队伍。另外，余命令各地成立“刀子会”，专杀红军和游击队，封锁十分严密。不得已，高如松便来到山脚下一姓陈的一个悬岩石洞里隐蔽，等待薤山游击队回来，以图再起。本来再走十几里即可到庙滩，那儿熟人多，到了那儿沿襄河而下就可脱离危险。但他没有这样选择，他相信红二十五师会打回来，于是决定绕道保康，穿过崇山峻岭到房县去找红军，然后与游击队打回薤山。他经龙滩逆南河而上，当行至粟谷庙时，被守卡的大刀会发现带到粟谷庙里。斯庙两边皆是光秃秃的山，即使跑也不能隐身。他被捆在正殿，腿脚都被磨伤，大刀会的人向他要枪要钱，要红军情况，他只承认是红军宣传员，无枪无钱。大刀会是不脱产的农民，虽受反动保长的指挥，但对共产党对红军尚有同情心。有个粟谷庙附近的人替他说情：“人家是红军，又不在这里闹，让他走了吧！”第二天大刀会便把他带到附近住下，又捆了一晚，次日便送到宋家沟地主罗四贡、罗六贡那里。罗四贡又问他有没有枪，高如松照样说没有。罗四贡得知他认识在这里教书的秀才王天合，便叫王的小儿子晚上过来看他，企图软化。王的小儿子说，襄阳的学生已经组织了义勇军，日军已占领了东北等等。次日天下起雪来，罗六贡让两个农民捆了他一只手送他到伪中队长地主罗子俊家。走出罗四贡家后，罗六贡有

意说：“盛家游击队长傅春泉是我妻舅，前两天跑到离宋家沟 20 余里的地方，被大刀会扣住杀了。念你与我妻舅是一伙的，我不会伤你，送你到罗子俊那里的目的，是想等世道平静些了放你走，但你在路上不要跑。”高如松在心里想，罗家地主一定不知道红三军已回洪湖，他们肯定畏惧红军力量，为保护自己财产，才采取这种两面手法。尽管如此，矛盾毕竟有所缓和。当时他的两只脚筋伤了，不能正常走路，身上又仅穿了件夹衣。他想让王天合的小儿子去黄家冲给妻子王玉娥捎个信，弄点礼物到罗家以延缓矛盾，好乘机脱逃。

到了罗子俊那里后，一天晚上，来了个 50 岁左右、身穿旧马褂的人，伙计们称他侯参谋。侯参谋端视了一下高如松，问认识贺龙、吴玉章否？高如松点着头，说认识。侯说早年在东京搞同盟会时就认识吴玉章，贺龙跟他是朋友。后来相谈时，知道侯清朝末年住过贵州讲武堂，由何应钦主办，侯本人做过团长，在川军杨森部当过参谋。刘湘部下一个旅，自动脱离了刘湘，拖到鄂西的兴山县，刘湘叫侯到兴山县劝说该旅长回川，仍归顺刘湘，该旅长不愿回川，侯也就乘机作了该旅的参谋，想在这一带发展势力。红三军路过保康时，劝该旅长不要打红三军。该旅长不听，结果一打被灭了一个营。后来襄阳五十一师范石生要收编该旅，侯劝该旅长不要投靠范石生，否则无好结果。果然该旅开到谷城县城时被五十一师缴械，旅长被押，侯知其收编后无好结果，该旅由保康经罗家山到谷城时，侯打听到罗家好交朋友，就到罗子俊处而受款待。高如松听着，估计侯身边的手枪可能已送给罗了。侯自称是熊克武派（民主人士，现在北京），红军的发展并不危害他的利益，所以不会伤害高如松。果然，过了几天，侯参谋的勤务兵来叫高如松到侯那里去玩。侯住在后楼，罗子俊新盖的三间正房很高，其余偏房还未盖。高如松便瘸着腿去了侯处，时罗子俊与侯正在大烟铺上靠着，向侯展示着董曦轡、彭养光给他写的两件扇面。董是樊城鸿文中学的校监，齐

鲁大学学生，在鄂北一带很有名气。彭养光是钟祥人，国会议员，是鸿文中学国文教师，孟觉的连襟，教过高如松国文。高如松顺便把董曦轡夸奖一番，他知道董曦轡加入过共产党，1927年病死于公安县，罗子俊不能不知道。他故意说到在鸿文高小认识罗的妻子李必清，想把关系拉近。罗便放松了戒备，大谈房县在清朝年间有十股土匪，惟自己自立为王多年。侯则说到长江流域受帝国主义侵略，红军要大发展，像四川就不容易。并说邝继勋一个旅暴动都失败了，又说原来西南军人对贺龙希望很大，后来贺龙把甘××（一个师）的枪收缴了，一般地方军人再也不敢投靠他了。侯说他的太太住在龙云太太的公馆附近，有意吹嘘与龙云的关系，以在罗子俊面前创造游说条件。侯还说见过红三军的标语，允许贸易自由等。罗说：“贺龙红军一个便衣队到他家附近问过路，他啥都没管让他们走了。”并说龚春林的蕪山游击队在国民党“进剿”时曾捉到了一个民团队丁，问是罗子俊手下时，便把他放了，所以他表示对红军毫无恶感。说到这儿，便转过话头，对高如松说：“放心，只要你在这一带住一时，平静了就让你走。”侯说：“要是上边知道来要，你就说解决了（杀了）。”又说在四川放人就用这个办法。二人像在演戏，他问侯的名字，侯仅把一个篆字图章拿给他看，却不愿说。

处境越来越危险。高如松心里清楚，如果继续在这儿困下去，自己到房县寻找红军队伍的机会就会错过。怎么办？

时有一个孝感县的裁缝姓苏，在这一带做活。这一天来到罗子俊家里，见到高如松时，寻机透露了外面的情况，说大刀会曾派人到罗四贡家问他的情况，罗四贡说人已杀了。高如松不知姓苏的为什么跑到山里当裁缝，他还说到湖南雷亮生牺牲的消息。这时又来了一个篾匠给罗子俊家做竹活，篾匠吃斋，与罗的老婆是一个道门，又是哥老会分子，对高如松很是同情，说哥老会分子参加红军闹革命，死的不少。不久，侯参谋将走。罗派人

对高如松说：“侯先生要到汉口，你家在什么地方住，捎个信回家带点衣服来，衣服这样单薄走路不方便。”高如松一听就知道这是罗子俊想借家人来看在财物上作打算，便给外祖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病，请人来看我，并带点礼物来。后侯经过樊城时，果真将信送到了高如松外祖母那里。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篾匠悄悄对高如松说：“大刀会的坛主还在要你，你得赶快走。”他一边骂着罗子俊，一边说：“他是狼，你是羊，他随时都可能吃你”。高如松说不知道路，请他送一程。篾匠说：“今晚不行，隔几天送”。高如松说：“我今晚就想走，请把往茨河方向的路告诉我。”篾匠说：“由罗家门前下山又上山，见路往左边走，这样就可到南漳地界。”是夜，高如松按着篾匠所指方向下山又上山，见路往左走。一路狂奔，到第二天早晨，碰到一个赶牲口的人，谎称是捉老虎的在山上下药，便没引起怀疑。于是，就溜雪到山下，顺着山沟往下走，来到了南漳地界，这儿离朱家沟仅八里地。到天快黑时，在一户人家过了一夜，次日又顺着小河往南漳县方向赶，第三日便到了界牌垭，此处为南漳、谷城两县交界处。前面便是茨河方向，天快黑时，终于到了茨河附近的黄家冲——妻子娘家住地。进屋后，先让妻子捉身上的虱子。妻子边捉边说，王天合的小儿子来过。高如松问：“那为啥没去看我？”玉娥说：“父亲舍不得财物不愿去。”高如松这才知道，岳父自“清乡军”来后已改姓黄躲到了茅坪山中，二舅子王通书也投了伪政府当了保长。玉娥说二哥是被迫当的，你走后王家被抄了三次。高如松听了非常难过，但心里仍然感到一种愤怒。革命的失败，亲人的背叛，还有战友的牺牲，让他感到十分伤心。他决定趟过汉水到乔家岗王理书那里居住，然后从那里去寻找组织。到乔家岗王理书那里后，他受伤的两脚胫不时地生疼，他使用灯油不断地擦抹。不久，伤口长好，但两脚仍然麻木，他又用野草根熏洗。赶在旧历年前，他终于在李和尚哥哥那里打

听到了李荣群（**文彬**）的下落。时李荣群（**文彬**）正在襄谷边境汉水沿岸活动，曾计划由茨河以东向南漳方面发展，于是，他便想找到李荣群，想一起在茨河附近开展活动。

1932年春，高如松在乔家岗养伤时听王理书说到他的一个家门王氏兄弟也在蕪山游击队，年前因游击队被打散他被地方民团捉住。家人去看望时，这位姓王的兄弟说到蕪山游击队1931年11月撤到房县后，一同送红军伤员的50余名农民（**担架队**）坚持要回谷城。不得已，房县红军政治部批准李庭兰、邹国华等掩护送红军伤员的农民担架队回谷城。孰想到回后发现，谷城各地成立的“刀子会”，十分猖獗，扬言专杀红军和游击队。李庭兰、邹国华等人在谷城不能存身，躲了几天后便决定再上房县。谁知，他们刚动身，就被“刀子会”的人发现，一路追捕，直到天子垭，又遇蔡老九的人拦截。至悬峰山上坡时，又与甘峰的“刀子会”迎面相遇，帅本朝被砍了一刀，李庭兰来不及逃跑，现场牺牲（**见王辅成《蕪山烽火》**）。帅开枪把杀死李庭兰的凶手打死，然后只身逃往房县。

就在这次战斗中，由宣城调来的胡统一（**胡培洲**）也在盛垌小沟被捕，被反动派押至县城杀害。

高如松听说后，心里受到强烈震撼。他改变主意，决定回蕪山恢复工作，为李庭兰、胡培洲等同志报仇。

时为三四月间，他正欲动身，却遇朱佑文从双沟到乔家岗来见他。朱佑文说：“他与鄂豫边特委李明堂以红军代表身份到双沟接应张恒金投诚，遭到五十一师包围才逃到这儿的。”高如松问：“张不是被湖北省地方军阀何成浚收编了吗？”朱佑文告诉他，正因为如此，五十一师范石生部才过去收缴张的枪支，把双沟镇包围了。张不想向范缴枪，便派人到枣阳找红二十六师，说要投红军。要红二十六师到双沟接应张部突围。可红二十六师内部意见不一，迟迟未去接应，故双沟被五十一

师打下，把张恒金带的一连人放走，枪支缴了。清查户口时，李明堂被捕牺牲，他跳寨墙逃出，方来到乔家岗。于是，高如松留朱在乔家岗住下。不久，身上所带30元大洋即用完。时带光洋不便，但又无毛票，以元为单位地到农家送钱，像化雪般地，很快就完了。而高如松的脚还很麻木，走路十分不便，想出去活动却又困难。他曾想找郟阳黄龙滩赵家兄弟游击队，可远在数百里外，难以打听消息。于是，二人又商量决定到游击区去。朱到樊城附近把这个决定告诉给王振三，王却不同意离开这里，说洪湖红军正向汉水东的天门、钟祥，汉水西的荆、当、远等县发展，襄枣宜游击区将与红三军活动区连接起来。现在应该做的是把襄阳、老河口中心县委合并组成道委会。朱认为可行，便又折回把王振三的计划告诉了高如松。高如松知道王振三的妻子家是地主，住樊城有接济，朱的老婆是襄阳东津湾庄家冲人，朱可常到襄枣游击区取得钱用，故都不愿离开游击区。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答应与朱到牛首北的一个村庄外野地与王振三见面，会商组织道委会之事。

这天，高如松与朱佑文来到约定地点，王振三也按时赴约。三人就成立道委会的事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王振三为书记，高如松和朱佑文为委员，并就如何开展道委会工作议出了方案。高如松说：“为充实道委，可以让交通员韩家驹通知汉南隐蔽下来的孟宪之、姜步瀛等一批共产党员，逐步汇集到汉北，和李成群、张正忠一道在太平店、仙人渡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朱、王表示同意。商量完后，朱佑文与王振三便向樊城附近走去，高如松当夜则来到李和尚家。高如松没想到，自此分手后，就再没有朱佑文的消息。

时襄、枣、宜正被“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由于王明篡夺了中央领导权，阻止了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理论的传播，以至于他人在房县工作至今未能见到毛主席总结的“十六字诀”，知道“十六字诀”还是他到延安后的事情。所以汉水西和汉水东的游击区

不会进行游击战争，缺乏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引下，鄂北的土地革命斗争未能很好地开展，劳动人民的翻身要求一度受到挫折。由于盲动主义，南漳东南乡和襄阳西南尹家集的暴动都失败了，参加领导的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党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很坚决。襄阳尹家集的暴动领导人是大绅士的儿子、师范学生曾孟陶，领导农民杀其直系亲戚龙家、王家大地主。茨河的盲目暴动失败后，群众核心分子有的牺牲，有的逃离家乡，工作始终未能恢复。太平店夺取民团枪支的失败，李自修、薛斌率领农民攻打仙人渡被地主率领的民团围攻受歼，都影响了鄂北地区群众的革命情绪。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者又放弃了学生运动与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纵使“左”倾关门主义，失掉了与社会的应有联系。他只知道，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派了一个叫沈宗源的到鄂北贯彻王明路线，在不巩固的游击区域于两条路线斗争中平分一切土地，开展反富农斗争。沈在鄂北干不下去，于1932年2月17日逃跑。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又派了个巡视员尉士筠来鄂北主持工作，不许红军出苏区一步。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引下，鄂北竟一步一步地被丧失掉。现在特委设在韩家营的联络站已被破坏，找特委领导请示工作很是困难，不知道领导同志藏到了哪儿。他与朱佑文也数月未有见面，道委的工作怎么搞，需要商量和安排。过去是朱到王理书家找他，他完全不知道朱的住址。不得已，他便于十月间到老河口熊家茶馆（粮店）通过熊玉英打听朱的情况。熊玉英是熊玉珩的姐姐，熊玉珩于1930年夏在太平店暴动牺牲后就由她负责河口联络站工作。熊玉英说朱佑文已好久未去过，并说仙人渡一家姓高的党员，带信不让朱佑文再到他家去了，因为保长已知道他的身份。又对高如松说：“你也不能在这儿久呆，近日老有民团上门巡查。”说完，便从后门把高如松送走。第二日，高如松回到乔家岗，便听到朱佑文、王振三在樊城下边张家湾接头时被捕的消息。那是他4月份在牛

首与二人分手后的第二个月，即 1932 年 5 月，朱佑文在张家湾联络站与王振三接头时就与王同时被捕（1933 年 1 月，二人同时就义于汉口硚口码头）。显然，此时在鄂北革命活动已步履维艰。如果贸然到新街寻找组织，在到处布满岗哨的襄枣宜区域只能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所以他准备到鄂豫皖苏区去寻找组织，因为他知道鄂豫边省执委宋良猷在那里，红三军方面也有很多熟人，都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六、几经生死，回到党的怀抱

由于找党心切，高如松毅然于 1932 年 11 月到 12 月间踏上北上的路途。他从光化出发，经邓县到南阳，又从南阳到洛河乘“荒车”到信阳。在信阳基督教堂武英牧师那里，知道了白生俊在新二十师并与之取得了联系。又得知鄂豫皖红军已撤退，经枣阳、南阳、老河口之间往西上了，这样他便到信阳中山铺胡家，因谷城傅伯绩此时在那里教私塾，便有了到傅伯绩那里周转再设法到鄂、豫、皖的打算。可傅伯绩教私塾收入有限，还要寄钱回家养家糊口，不能久住。过了些日子，只好又到信阳信义会基督教圣经学校李必焯那里去住。这时，他接到白生俊回信，说他无力接济生活费，因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没有饷，只有饭吃，他可以到那里做客，有的是饭吃。这样他便来到光山白生俊那里。不久所在部队由光山开到周口，到过旧历年时，孙锡（启）类、赵雨时也到周口找韩采芹（韩化龙），他们是襄枣宜游击区失败后流亡到这里来的。听他们说鄂豫边特委在敌人“清乡”后不顾主客观条件，又组织了苏区代表团恢复工作，被国民党包围，特委委员、年青的曹明久（陕西人）不幸牺牲了。过年后，1933 年春，白生俊介绍高如松到连上当帮写，该部队开到信阳有二三月的样子又将其辞退。于是，高如松只好到许昌孔家胡同××号养病。

不久，传来消息，韩采芹（韩化龙）当了连长，想约他一叙。于是，韩、孙和高如松聚在一起，漫话当年，并谈到了今后出路问题。看得出，韩采芹（韩化龙）心里还留恋着革命。韩说两次革命都失败了，将来我还要回去打游击，这样就谈到了设法争取这个连的兵运问题。听到这儿，高如松立即写信到乔家岗，让党员王统祸来当兵，这样可以内外策应。不久，王统祸真的来了，共来了三人。暑假期间韩采芹（韩化龙）介绍高如松到回教商人曹翰臣家给两个小孩补习功课。秋后曹又介绍高如松到回教小学教书，月薪 20 元。曹翰臣的叔伯伯弟大革命前夕在北京住无线电学校，与韩采芹（韩化龙）的弟弟韩直卿是同学。韩采芹（韩化龙）当连长时，他的表弟梁尊友、张寿元常来做客。不久，王步岳、马××二人准备到孙殿英部做事（孙的南京办事处主任张克让，襄阳人，共产党员），另外又来了个姓胡的。时韩采芹（韩化龙）职务升迁，作了上尉营副，该部队一个团哗变，拖到豫皖边境去了。

不久，新二十师调开封。是年暑假期间，高如松得知鄂豫边省委在南阳被敌人破坏，宋良猷、郝久亭等被捕。开学时，高如松准备到回教小学教书，想到许昌与襄阳不远，恐遭意外，便决意辞去。王步岳问去哪，高如松说回家到孔家胡同去住。于是又写信给第五小学李文涛，打听傅伯绩的下落。李回信说傅伯绩在武昌乡下教书，若去可以同住。高如松知道傅家庭负担重，去后困难，遂到郑州太康路韩家宾木匠那里，韩是木匠生活尚可维持。其间，高如松到郑州电报局找过同学夏正午，想借点生活费，到北京去找党。不巧那天正是夏正午调到汉口电报局动身走的日子，自然未谈。高如松心里清楚，眼下找党非常困难，马适安就因为找党在北京被捕。在许昌时，他曾与孙、赵二人谈到红四方面军的问题。红四军由张国焘领导，大革命时他曾听过张国焘一次讲

话，张吹嘘陈独秀，并无动人闻听的内容。他不知道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知道他的老婆杨子烈是枣阳人，北师大学生，两人都是共产党，在鄂北流传甚广。由于粗浅的印象对张国焘感觉不佳，高如松便取消了投奔红四军的念头。但同时也不愿到孙殿英部混事吃饭。怎么办？他站在那儿，仰望苍天，只能托行云以寄怀，迎清风以祛累，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1933年10月，高如松接到赵歧周的来信。信中说白军新编二十师在开封已改编为第二纵队，即将开往江西，言下之意即暗示他随这个部队去江西，以乘机进入江西苏区。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孙锡（启）类、赵雨时二人，二人都点头同意。他知道一个陌生人到苏区是要经过种种困难的，但此时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心里一直想着找到组织，这是他唯一的愿望。想到这儿，他又来找韩采芹（韩化龙），韩想办法让他到伪二纵队六团当上了文书。到开封两三个星期后，该部队便由开封经京汉路到汉口乘轮船到九江，转南昌休整后步行到吉水，在城外一个破庙里住下。时听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高如松想到福建转入苏区，没想到未等前去福建人民政府即已垮台。伪二纵队系国民党匪部河南杂牌地方队伍，担负着进攻红军及碉堡线驻守任务，在吉水县的一条河流以南，从这里到苏区很是困难。因不是他一个人隐藏在这个部队，还有孙、韩、白生俊及王全芳诸人，他不能一个人不言而走，没有一定把握，若进不成苏区还会影响上述等人的安全。所以不能不作慎重考虑，而且必须与孙、赵诸人商量。时间到了1934年2月间，高如松与韩采芹（韩化龙）、赵雨时交换意见，想就机请假离开。先是到新成立的该纵队担架排长刘余三那里，后又在吉水城内一个米铺里住了一些日子，再到该排所住的一个庙上等待时机。不久队伍向富田方向移动，高如松便坐民船到吉安沿赣江上数十里下船。船上的药品，担架排号由几个士兵押送。后起船随刘余三等到了富田，

不几天刘余三跟着部队向他处移驻，高就住富田未走。韩采芹（韩化龙）所部住富田堡线内，富田以外就是苏区。白匪部队到富田驻守不多日，红军有一次在富田外不远的地方构筑工事，准备要攻打富田的样子。时天下着大雨，小河涨水，他同赵雨时又谈到如何进苏区的事情。赵说：“要是我就抱着一根竹竿顺水流去。”高如松见沿小河北面全是该白军的堡线，而水的流向又靠近碉堡线，很容易被白军哨兵发现。便想还是从韩采芹（韩化龙）所在营班守的碉堡线，通过王全芳排长、李明友副班长的岗哨点出去比较安全。高如松把这个打算向韩采芹（韩化龙）谈了，韩开始很同意，并说要写信告诉住在北京的姚启新，也从这儿到苏区去（姚是南阳唐县人，与孙锡（启）类同干过革命工作）。不日韩采芹（韩化龙）又跟高如松说：“该团有便衣队在富田外边，如果出富田进苏区时被扣回来，那我们（指孙、赵、刘等）都不得了。”劝他不要去。并说由他们接济经费让他到北平去看看书。高如松心里一阵着急，这如何做得？费这么大周折就是想到根据地找到组织，现在与根据地相隔咫尺，如果不去就等于前功尽弃。这样，他太不甘心。于是就说：“哪有这么巧碰着敌人的便衣队呢？我一定要进苏区找党。”这时韩说：“你要去我不阻拦你，只是你坚持这样以后就不要再见我了。”高如松无奈，又找孙锡（启）类、李明友（襄南二区即今宜城王集镇人）商量，决定由李明友带他走出碉堡。先让李明友到富田外一个村子上找一个落脚点（当时还想到，如果到苏区后，红军要是来打富田，可以从李明友这个碉堡带进来一些红军便衣，李明友这个班也可以做内应，里应外攻可以解决这个团）。孙锡（启）类把敌人的两周口令告诉了他，等到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便由李

明友带他经过韩采芹（韩化龙）的营部门口。他看见孙锡（启）类朝他点头微笑了一下，便装着到村上去玩，到了一家老百姓家，李明友又跑到其他老乡家去玩。天快黑了，李明友来到这家见高如松安全，就又回到碉堡内。待天黑定，高如松迅速离开村庄向西南山边走去，走了一二里，在稻田里稻草上躺了下来，这样睡到天亮，又向山边走。在一座小山脚下，被红军游击队战士发现。红军战士问：“干什么的？”他走到跟前，说明了来意，战士们就把他带到了山上部队营房。吃过早饭后又把他送到分区司令部。次日，两个红军战士送他到一个高山顶上，在房内见到了省主席曾山同志。曾向他说了一通话，即作思想工作，后又继续走，大约次日快黑时，便到了江西军区司令部。晚饭后，陈毅司令员听说一个认识他的人找他，便过来见高如松，并问了一些情况。陈毅问：“你认识这里什么人？”高如松说：“我认识陈毅司令员。”陈毅故意说：“这里没有这个人哦！”高如松说：“你就是嘛！”陈毅点着头，笑了起来，说了许多慰勉的话。高如松说：“还是在武汉农讲所见过您，时间太长，领导又忙，记不起是自然。”后又往兵站线走了好几天方到瑞金，陈毅让他住总兵站招待所，并委托一名叫贾托夫的到红军大学约他谈话，因他知道河南及鄂豫边工作情况，便谈到了宁都暴动过来的五军团是以其中少数党员为骨干，而这些党员多是襄阳的学生，问他是否认识襄阳城内一个姓罗的（父亲做过县长）等。贾想让他返回白军二纵队六团搞暴动，高如松便谈了和韩采芹（韩化龙）诸人的情况，说如果有红军去围攻，可以里应外合，把这个团消灭。他本人则要求到苏区工作。贾对此表示同意，决定把他送派到该白军六团的一个河南叶县人伊××（是五军团暴动过的）到富田附近接上头后，再返回瑞金。这时，他才知道毛定方、左觉农、黄火青均在中央苏区工作。

高如松由总兵站到总政治部附近招待所住了几天，一天在外边碰到毛定方、左觉农，相互谈了很久，高兴劲儿自不必说。他们已知道他到了瑞金，问他今后打算。他便如实相告，愿留在中央苏区。离开总政的先一日，贾托夫找他与那位伊××同志相见。是日晚，也是与贾托夫相见时在座的那位同志，南方人，邀他谈话，才知道这人原在红三军，到过房县，不知何时到的中央苏区。由于他到过房县，接近过红三军，所以虽不相识，谈话自然比一般人亲切。次日，高如松与那位姓伊的同志，经兵站离开瑞金。待到富田附近的分区司令部时，该白军六团已离开富田。住不久，由于军事情况紧急，遂叫他离开这里，与分区政委、政治部主任等数人返回江西军区司令部。不久，伊告诉他瑞金不能去，说就地分配工作，到政治部破坏部当干事，组织生活会由政治部主任黄亲自与之谈话。时陈毅司令员调走，高如松便同司令部侦察队便衣出去抓白军俘虏，帮助询问情况，又帮助写告白军士兵书草稿等。当时敌人正在紧缩包围圈，而“左”倾路线提出敌人愈前进，后方愈空虚，要求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殊不知江西是敌人围攻红军最重要的基地，并不是一般的所谓后方。当时流传着红军部队要到东固一带去活动，说东固的条件好，在新年过后部队就向西移动，一次过封锁线未成，队伍分散后就再未见到曾山政委和陈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李、黄腿均负伤，行动不方便，离了部队。部队白日隐藏在山上树林里，晚上行军，跑得过快，使不少同志失掉了建制。后来一位团长集合了一二百人半夜冲过了一道封锁线，天快亮时，高如松与几个五军团伤残的同志走到一块，到一个浅山上掩藏。没想到被一个姓宋的（是鲍岗的队伍方振武部下，被收编为独立旅，在龙岗到石头坑驻守）白军排长扣住，留在该部当兵。鲍岗是安徽人，连上士兵安徽人很多。三四月间，一次到龙岗，听鲍岗讲话，在龙岗街上看见了孙锡（启）类那个营的留守处，在石头坑

汽车路上看见伪第二纵队汽车往返龙岗，知道伪第二纵队离龙岗不远。白军宋排长问他知不知道土匪杨三盛，他说知道，杨三盛有一二千人曾在枣阳一带打劫，看样子他一定在杨三盛那里当过土匪。自高如松在龙岗街上看见孙锡（启）类那个营的留守处就一直想趁机逃走。因为到了孙那里就有机会找到组织。有一天他乘厨房墙倒塌之机从墙后上山，逃出了鲍岗部，来到孙锡（启）类的营留守处。没见到孙锡（启）类，却遇到一留守兵。高如松说：我是自家里来的，被部队扣留当兵，能给我一个伪二纵队符号吗？留守兵点着头，遂给他戴上符号。他说出实情，又请留守兵送他出岗哨。留守兵告诉他二纵队住在龙岗西面的山内，他便往那个方向跑去。半路上，他猛然看见了韩采芹（韩化龙），便叫着韩的名字。韩说往河南洛河带新兵去的，叫他去离那不远的刘余三排长那里暂住，他去洛河后为他找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怎么样？他说：“可以，只要有益寻找组织，干啥都行。”一月后，高如松又住白生俊连上，后这支部队由龙岗移到东北弋阳、贵溪等县铁路线上，又开到河口镇，他转住该连留守处，随留守处来到江山县。其间韩采芹（韩化龙）自河南洛河来信说，已在洛河为他谋了个小学教员。赵雨时说洛河离襄阳不远，不方便，便没有去。

1935年11月，高如松经多方打听，均未找到组织，便失望地再次来到郑州太康路韩木匠那里。韩木匠，即韩家宾，襄阳竹条镇韩家营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系韩化龙（韩采芹）的族兄，因身份暴露被反动派追杀从襄阳逃到郑州，在太康路凭木匠手艺开了个木匠铺掩护身份，维持生计。高如松早年都认识他，但此时韩木匠生活也发生了危机，跟几个工人住在贫民窟里，无奈韩便在一个星期日带他来到郑州基督教信义会万捷三牧师那里，称是李珩自的亲戚，想找他谋事，由于初次见面便未深谈。后多方打听，仍无党组织下落，这样又回到江山留

守地。旧历年后即 1936 年春，该留守队移驻上饶，他又随队来到上饶，在一家饭铺住了一些日子，好不容易找到韩采芹（韩化龙）和赵歧周（枣阳人，曾任枪炮厂厂长）。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使他病倒，韩采芹（韩化龙）只好把他送到开封南关让爱人王新陆照顾。直到 1937 年夏，病方痊愈。这时，赵歧周来信说让他到北京或上海去住，看看书，生活上由他们接济。他听后实不忍心，因为他们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党组织，自己的心病自己清楚，只有参加革命身体才会有劲，哪怕是回鄂北联系过去的老同志打游击也行。这就是他，一个鄂北老党员的革命情结。无论环境如何艰苦，不论身体受到多大摧残，他心中那种对共产党的信仰始终如一，至死不渝。

党没有辜负一个于万死中奔向他怀抱的同志。就在这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在武汉活动的李荣群（文彬）来信告诉他，武汉已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正在招收工作人员。他听说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在李荣群

（文彬）的引荐下，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幸运地见到了董必武同志。通过细心交谈，董老被他的一片忠诚所感动，当即给延安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写信，决定把他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



高如松（左四）1946年在东北农村调研

高如松（左四）1946年在东北农村

调研

然而，有了董老的介绍信，又如何到得延安？时如松身上可谓捉襟见肘。不得已，他挤着货车回到襄阳，到太平店乔家岗把此事讲给内弟王理书听。王把他安排到野外一瓜棚与看瓜人黑三爷住下，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直到7月才筹够买一头毛驴的钱。就这样，王理书安排一个名叫万正江的同志牵着毛驴，护送着高如松向千里之外的延安进发。由于二人所带盘缠不多，通常情况下，均为一日二餐。途中渴了，捧口沟渠里的水；饿了，到农户菜园里拔个萝卜充饥是常有的事。即便走到街上，也从未饱餐过一顿。一个月后，方到陕西境内。至西安北河时，如松得知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相距不远，遂把毛驴卖掉，作为万同志返回的盘缠，自己徒步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办事处的同志看了董老的介绍信，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让他好好休息，在此等待去延安的散车。

呜呼，革命何其难矣！念兹催人沾巾。今人知也邪？

1937年8月，高如松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他像一颗即将枯死的青苗在党的

阳光雨露滋润下开始起死回生并茁壮成长。在抗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又于 1938 年调整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事。时正值陈云同志创办中央组织部“窑洞大学”，虽没有正式称呼，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就是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此次学习即以领导干部为骨干，正式参加者有部长、秘书长、正副科长，即陈云、李富春、邓浩、武竞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王林、乐少华等同志，其余的都是列席旁听。据刘家栋所著《陈云在延安》（1996 年出版）记载：

当初参加学习和旁听的 40 多人，现在已有一半作古了。尚健在的有 18 人：袁宝华、刘靖、朱光天、王盛荣、胡其谦、柳文、邱纯甫、华锦城、张忍之、黄耕夫、王林、肖珺、张洪涛、李兴生、王鸿儒、王宏谋、郝志伟、刘家栋。已去世的 28 人，包括陈云、李富春、王鹤寿、陶铸、陈正人、王德、邓浩、武竞天、陈伯村、乐少华、张子衡、贾震、刘鸣、胡嘉宾、荀肇基、刘淇生、王玉清、徐迈、陈耕夫、居众、苏生、陈坦、夏耘、薛光军、韩文潮、王荣祥、高如松、童铤。提到这些当初一起工作和学习的同志，常使我们健在的人回想起那时一起火热学习的情景……

刘家栋在这本著作中介绍，高如松同上述同志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坚持学习了 4 年，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从而提高了革命水平，进一步地成熟起来。凡参加学习的同志先后学习了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

高如松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遇到问题会从各方面去考虑，对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中央组织部见他进步很快，1940 年便把他调到中央财政任人事科长和政务秘书，1941 年又任命他为中央管理局人事科长。在此期间，他一直在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富春、彭真、薄

一波等同志身边工作，能经常听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尤其是 1942 年他参加了党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和 1945 年中央党校的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和素质得到大步提高。之后的他，无论在何地工作，身上都带有延安时期的那种良好作风。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延安抽调一大批优秀干部奔赴内蒙古、东北等地作解放区的发展建设工作，其中就有高如松。

1945 年冬，高如松被派到热河林西县任县委书记，1946 年又任热河赤峰市委书记及南穆陵县长等职，1947 年调嫩江省任省民运部部长，1948 年任嫩江省委研究室主任。其间，他不辞劳苦，任劳任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章。如《对东北农村榜青剥削方式之研究》《关于农村调查》《龙江县富拉基尔李地房子调查》《林西战略位置》《关于中农问题》《牡丹江穆陵县下城子重分土地的方针方式和方法》《集中力量深入检查解决问题》《关于热北的红枪会问题》《关于保安农村干部情况调查等阶级关系》等。这些文章，为党制订方针政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对当时热河嫩江等省党的工作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这些著作的发表，也表明高如松政策理论水平的高度和思想之成熟。

1949 年 5 月，高如松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从东北调回襄阳，任新中国成立后襄阳地区第一任专员，地委常委。由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形成的良好作风，回到家乡工作后，他不徇一丝私情，可谓公矣。最典型的是他在襄阳泥嘴的姐夫胡某因有问题怕被追究与大姐一起到政府找他这个当专员的弟弟帮忙。为表明他的态度，他竟拒绝见面。他把主要精力和心思全用于落实上级下达的剿匪反霸、城乡建设等工作之上。6 月，他负责督导光化、谷城等各县整理思想，整理组织，光化整完后又督导谷城，谷城主要区干近 120 人，直到二十号前后方整理完回到各村。接着又督导襄阳用七天时间召开区长区书工

工作队会议，查出襄阳东津湾区 11 个乡镇诸多问题，收缴私自存枪 209 条。督导宜城召开了 47 个有问题干部的整训会议，让 42 人通过整训通了思想；另督导枣阳开了四天的专门整训会议。

8 月 13 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注：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于 1949 年 5 月 20 日在孝感花园成立。是日起，汉南工委大部地区划归襄阳地委，部队归属湖北军区襄阳分区），省委书记李先念作《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报告，根据“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顾城市”方针，结合湖北实际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明确当前必须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

会后，高如松参与了中共襄阳地委对西线剿匪工作的研究部署，针对国民党鄂北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朗星率保安一、二、六团秘密到保康，勾结国民党第十四兵团高参吴吉六、喻普和鄂北挺进第四团团团长张云等，妄图在重峦叠嶂、地势险要的鄂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建立反共基地的反革命举动，于 10 月与襄阳军分区联合下达命令：匪首李朗星杀人放火罪大恶极，祸国殃民，恶迹昭彰；匪党统治期间，横征暴敛，既经解放野心不死，复行糜烂地方，除将其本人全部财产没收外，并通令各级政府一体缉拿，任其逃到天涯海角，一定缉获归案法办。要求各县在剿匪中必须贯彻“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根据情况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剿匪斗争。

李朗星为襄阳县唐家庄人，出生地主，曾进军统特务营训练，受训结束后任湖北保安第四团团团长，驻守襄阳，常在樊城、南漳一带欺压百姓。1930 年 5 月底，高如松在太平店龙巷村七舅章仁善家与肖庄肖元凯等人商议太平店暴动时，因章培德叛变密告，李朗星曾亲自率领大队人马到龙巷村围捕高如松。后暴动失败，高如松赴均县房县活动，李朗星又在房县、保康、竹溪等县骚

扰百姓。直到 1944 年，被委任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查专员，后任伪襄阳专员公署主任，于襄樊战役中化装逃跑至保康，联合房县、保康、兴山、谷城等地反动武装，在保康马良安营扎寨，设立“鄂西北行署”，自荐行署主任，企图反扑襄阳。

李朗星曾于 1949 年 6 月 23 日发布鄂北行署第一号作战令，抛出了“以保康为据点，在鄂西北地区扩充一个军的兵力，以收复重、马、店，直取南漳，反扑襄阳”的军事行动计划；6 月 28 日，下达鄂北行署第二号作战令，亲率房、保、均、南、谷地方武装和国民党兴山二二三师六六九团共 4000 余人，兵分六路，直扑马良坪。

面对李朗星的武装挑衅，中共襄阳地委召集军区司令员张廷发及保康县指挥部的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为诱敌深入，于 6 月 29 日晚先由八十五团一、四、五、六连按照统一部署，主动出击，集中三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向由沙子岭、艾家店方向来犯的敌人猛射，打死敌官兵 30 余人，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营二连在天池垭俘敌 2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10 多支。撤出战斗后，向重阳方向转移。派出两个连，分别阻击南漳、兴山方向的增援之敌。7 月 19 日晚，解放军指战员从南垭、黄家榨坊、双坪、黄家仓库兵分四路前进，切断了马良、天池垭通向官帽山的通道。凌晨 3 时，指挥长王希永率领的 4 个尖刀连顺沮河越过马良坪，途经竹林口，偷袭小官帽山。当敌人发现解放军行踪为时已晚，匆忙来到小官帽山主峰脚下，在孟福海门前院子集合。王希永抓住有利战机，率部包围敌指挥部，提前发起进攻。子弹像雨点般地撒向敌阵，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军四处奔逃，有的跳下悬崖，有的钻进刺架，有的下跪投降，丢弃的枪支弹药、尚未启封的两门金陵迫击炮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这次战斗，毙伤敌军 100 余人，缴获骡马 3 匹，弹药无数。住在天池垭的李朗星听见枪炮声，连坐骑也顾不得牵，顺着羊肠小道落荒而逃。

7月下旬，李朗星重新组建湖北省保安十七旅，委派温而理为旅长。该旅拼凑了3个团，将谷城的反动地方武装编为第一团，保康的反动地方武装编为二、三团，以支撑残局。李本人则率保安三旅于7月底向四川狼狈逃窜。途中，在房县阳日湾（今属神农架）遭解放军截击，伤亡80余人，投诚600余人。最终，我人民解放军直捣敌指挥部“老鳖窝”，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九路寨。此役全歼顽匪百余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孙秀章装扮成“伙计”，带着家眷、武器、烟土和6名心腹外逃到兴山，被迫于1950年1月15日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至1950年1月26日，保康北部石灰沟一带股匪李从恢部百余人皆被歼灭。境内伪区、乡政权全部瓦解，保康全境解放。

此皆为高如松任襄阳行署第一任专员期间之事也。

其间，高如松还领导襄阳、南漳等县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在襄阳抓住了惯匪头子方水娃；在南漳，发现多年惯匪杨清斋竟混进李庙乡当上了乡长，清理时正准备组织暴动，被剿匪反霸斗争小组捕获，执行了枪决；在剿匪反霸斗争的同时，高如松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还致力完成省政府交给的其他任务，先后组织完成支前粮600多万斤，并用140只小船装好，按时送达，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好评。

1949年6月上旬，襄阳行署召开地区农业工作会议。高如松于会上听到南漳、宜城两县政府负责人在报告中称百姓对修复境内的百里长渠呼声强烈。他听后认真询问详细情况，并亲往现场查勘，发现横跨南漳、宜城东西百里的白起渠，属襄阳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它起源于战国，宋人曾巩《长渠记》载：“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兵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为渠，以灌鄢。”至民国，该渠荒废。然若疏浚，可灌溉南漳、宜城两县23.7万亩良田。高如松出生乡里，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早在30年代，他在太平店龙巷隐避时，就与七舅章仁善谈过引丹江水灌溉襄阳农田的设想。但他知道，

这个愿望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是实现不了的。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自己又成了襄阳一方的行政要员，当为百姓着想。恰在这时，他获悉湖北省政府正在审定各灌区水利工程计划，便赶紧召开会议，安排人起草关于修复长渠的报告，争取将修复长渠列入省水利工程计划。报告起草后，他又亲自赶到孝感花园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将报告交到了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同志手里。李先念同志认为报告里的建议很好，迅速召见湖北省水利局局长夏世厚，要求调集各方面水利专家对襄阳的报告进行论证。不久，夏世厚便将专家论证报告呈上，结论为：“百里长渠工程关系鄂北地区今后的灌溉事业和发展，为了示范，为了宜南两县大部分人民丰衣足食，应及早举办”。

10月26日，湖北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一次水利工作会议。大会在审定各灌区水利工程计划时，将修复百里长渠作为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起点，并决定向中南水利部、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提出修复百里长渠建议。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次水利会议上，原则通过湖北省水利局关于修复长渠的建议，并核批贷款长渠。后因国家困难，贷款未能及时拨付。省政府领导征求高如松意见，高如松毫不犹豫地签字：在国家贷款尚未到位的情况下，长渠所需经费，暂由襄阳地方垫付，确保按时开工。

就这样，1950年3月，湖北省水利局派出了第三、第四两个工程队分别前往南漳、宜城开始施测。后很快拟定修复百里长渠初步意见书，同步进行了工程设计，着手编纂《湖北省长渠工程计划书》。

时高如松接到到武汉任职的调令。行前，他嘱咐即将接任专员的老战友、老同事余益庵，一定要想办法把百里长渠工程修复计划完成。余益庵接过接力棒，在百里长渠修复工程开工时亲任指挥长。于此，1952年1月，宜城、南漳两县投入4万劳力，长渠干渠土方工程全线开工。秋季各渡槽涵管开工，冬季各闸、坝大型工程开

工，至 1953 年春季民工自做支渠竣工，1953 年 4 月 15 日全线竣工。全长 47.6 公里，按设计标准完成，渠道底宽 5.5 米，渠尾段底宽 27 米。这条长达百里、荒废百年的长渠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操作下全线修复，它像一条巨龙，自谢家台起经武安镇、红瓦屋、郭家坑子、王家墩、鲍王营、八卦庙、黎家岗、段旗营、槐树井，尾水入赤湖，至郭海营跃入汉水，南漳、宜城两县 23.7 万亩良田终于得到灌溉保障。

高如松不仅如此，对已故革命烈士亦不忘祭祀追悼，并安抚其家属。1950 年 2 月 16 日，是董曦轡烈士牺牲后第二十二年的日子，高如松组织专署干部，请来烈士家属，在专署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参加纪念会的有：潘慧庵、张廷发、宋□华、马菊若、樊仲远（兄弟俩）、陈涛石、王文萱及董曦轡家属等，高如松亲写悼词，登台宣念，使与会者倍受鼓舞。其文云：

今年二月十六日是吾师董曦轡烈士牺牲后第二十二年，谨写此文，以志追念。学生高如松
1950 年 2 月 16 日

吾师董曦轡烈士在五四运动后，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进步到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党奋斗，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终因执行革命任务，被反动派逮捕而牺牲。当其身处政治黑暗，社会腐朽的军阀统治区内，为革命需要，常与军阀缙绅虚与委蛇，在周旋应酬中而能傲然独立睥睨权贵，并能从中取得革命工作便利，其斗争艺术可谓巧妙。

吾师董曦轡烈士之为人，品德高尚，胸怀开朗，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其对劳苦大众，鱼水

相亲；对革命同志，解衣推食；其大公无私之精神感人至深。复忆吾师在樊城鸿文书院任教期间，学生中确实家庭贫苦，无力缴纳学费、伙食费者，吾师慨然解囊相助，我乃其中受惠者之一，其慈祥之形象至今萦绕于我的脑海。

就吾师这些优点，已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至今二十多年来，吾辈学生每以董曦轡烈士的革命精神及崇高品德，奉为师表，今天共产党红太阳照遍祖国大地，足可以慰英灵于地下矣！

其诚挚的革命感情使与会者甚为感慨，令烈士家属倍感安慰。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他得知谷城县太平店（现属襄阳县）共产党员卓正炳、李成群、张正忠等人在他离开谷城寻找党组织后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于1933年1月30日在谷城英勇就义时，他亲自为这些殉难的战友办好烈士证，然后骑马送到各自家中。

卓正炳，谷城县太平店（今属襄阳）卓家营人。1928年曾跟随高如松参加谷城暴动。1930年7月任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宣传科长，1932年11月任鄂豫边临时省苏区代表执行委员兼襄、光、谷、南、宜五县工交负责人。1933年1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朱坡乐家湾被捕，1月30日在谷城英勇就义；

李成群，太平店（今属襄阳）孙蔡湾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11月任襄、光、谷、南、宜五县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5日在他家里召开五县工委会议时被敌人发现被捕，同年1月30日被押到谷城英勇就义；

张正忠，太平店（今属襄阳）张家湾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11月任襄、光、谷、南、宜五县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5日在李成群家里召开五县工委会议时被敌人发现被捕，同年1月30日与卓正炳、李成群一起被押到谷城英勇就义。

高如松亲民义举深深感动着太平店卓家营、孙蔡湾、张家湾每一位革命烈士家属，其体民之微，无不让人格外钦之。

在襄阳工作一年时间，是高如松一生中仅有的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而他在家团聚的时间却寥寥无几。只要与家人在一起，他总要告诫家人胸怀大志学会自律，时时为政府着想。为此，他特意把儿子高万兵改名高军，把大女儿改名高民，二女儿改名高志。意在热爱军民，胸怀祖国远大志向。

1950年夏，中共中央调高如松到武汉工作，先后任武汉市委企业党委书记、硚口区党委书记等职。其间，他领导全区人民开展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任务；还写下了《二区硚口居民工作试点》《一个棉花商人的调查》等重要文章，为开展中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繁忙的工作之下，对逝去的同志和战友他也无不挂在心上。10月下旬，李绍棠

（李亚声）爱人赵彬贞女士委托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的侄儿戴效理来武汉找高如松介绍李亚声革命活动情况。高如松热情地接待了戴效理，还安排人带戴效理观看了黄鹤楼。10月26日，高如松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了戴效理，他充满感激地说：“赵彬贞是个好同志，在上海时曾接济过我和李亚声同志。”于是欣然写下《李亚声烈士传略》，交给戴效理并嘱转赵女士。其《传》云：

烈士李亚声，原名李绍棠，湖北谷城县茨河镇人。家贫。幼时读过私塾数年，后到老河口官盐店当学徒。有暇看些小说，想求学前进，为官

盐店所不容，被辞退。辗转设法求得基督教公费学习。一九二四年高小毕业，进武昌基督教华中初级师范学习。一期未滿，因受反帝反基督教与南方革命势力的影响，遂退学。因友人资助，转入省立襄阳第十中学。五卅运动积极参加。是年秋加入团又党，送广东学习，入政治训练班。革命军讨伐陈炯明时，他在黄埔刊物上写有《东江血》等话剧。北伐时，任第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武汉政变，参加贺叶军到广东，任过总队长，撤退到江西，后回湖北。一九二八年奉派回襄阳，到谷城任党委书记。不久，调枣阳工作，因游击队被击溃，未遂。胡陶“清乡”，同年冬出走上海。一九二九秋冬间回武汉。一九三〇年夏秋间，他在汉口有党的关系，在武汉日报副刊发表些小说，党内工作不详。住洞庭信义所内，遭国民党反革命逮捕，枪决牺牲。

他爱人赵彬贞是个基督教徒，学医的。她对亚声同志的共产主义不加阻挠，并予同情。他们结婚未久，亚声同志惨遭牺牲。遗有一子，曾在二野军大毕业，派二野某部当文化教员。赵彬贞女士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重庆医院工作。赵彬贞女士含辛茹苦，抚育遗爱，使继乃父之志，投身人民解放军队伍，为人民服务，实属难能可贵。方今中国革命大业告成，烈士家属应予旌扬，烈士献身，史册留芳。于今忆昔，欢凄集肠。共

产主义，努力前往！生者以兹，死者以享；九泉含笑，日月放光！

我与亚声同志同学，同工作，知其历史，特为传略如上。

短短数语，可见高如松对同志真诚、严谨之态度，其人品、文采及所坚持的党性原则皆跃然纸上。此《传》被戴效理同志保存多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方提交政府，为李亚声评烈提供了真实可信之依据，堪称难得。

1952 年，高如松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一机部机车制造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国家基建局副局长、化工部财务司司长、专家司司长、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在此期间，他对铁路运输、钢铁生产、基本建设、水利电力建设以及知识分子情况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写了共 40 多万字的资料和论文。如《关于陇海铁路的运输能力问题》《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三西”——湘西、鄂西、豫西铁路的建议》《关于合理地综合利用钢铁企业焦炉气制氮肥的意见》等等。这些资料和论文，一部分已公开发表，有一部分保存在国家计委，对制定国家经济计划，有很重要的价值。高如松与同志们闲谈时，爱讲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是前半辈子拿枪杆子，后半辈子拿笔杆子。这都是革命的需要嘛！”的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革命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担任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期间，国家拟制定湘西、鄂西、豫西铁路修建计划，他接受调研此项目的任务后，不辞劳苦，深入实地考察，写出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三西”——湘西、鄂西、豫西铁路的建议》，内容长达 40 万字，成为国家制定和修建湘西、鄂西、豫西铁路的重要参考依据，至今被保存在国家计委。赫赫之功，何可泯也！

高如松一生勤勤恳恳，艰苦卓绝地为党工作，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他中学同学，

又与他共沐风雨，同在延安学习，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同志在回忆高如松同志时评价尤高。他说：“高如松任热河赤峰市委书记时，他在热北工作，曾听过高如松作的报告，实在感人，那种对热北封建地主压迫剥削的仇恨让人刻骨铭心。”黄火青同志还介绍：“‘文革’中，高如松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因农药中毒，引起肺气肿，不能动，被送到北京医治时，正逢造反派调查黄火青的材料，他们多次对高如松采用威逼手段，要他供出黄火青的反革命言行。然高如松没有胡乱写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地道出了黄火青同志为鄂北革命做出的贡献。他把写过的材料交到造反派手里时还要造反派签字，留作底稿保存下来。可见高如松是怎样的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仅如此，高如松对鄂北土地革命中鄂北党组织率领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民团、反捐税斗争历史也十分怀念，特别关心鄂北和鄂豫边党史编写工作，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写信给董老，提出了对湖北大革命前后党史编写的建议，对鄂豫边特别是鄂北，提供了较多的革命史料和线索，曾受到董老的称赞。董老委托他办公室人员给高如松回信，并介绍将有关资料和信函转交给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同志。为此，高如松为鄂北及鄂豫边土地革命历史的整理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1 年 5 月 30 至 6 月 6 日，襄阳地委邀请他从北京回来与宋良猷、余益庵一起谈谈鄂北 1925 年至 1932 年革命斗争情况，高如松接函后，很高兴地从北京回到襄阳，与地委宣传部及研究党史的同志谈襄阳二师学生看《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党团杂志）及

《前锋》的情景，谈萧楚女两次来二师当教员，宣传社会主义苏联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亲自起草“二师宣言”的过程，和余益庵同志一起追忆 1925 年程克绳在枣阳隆兴寺组织联庄会，提出抗捐，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民团，反土匪等口号，开辟枣西最初革命根据地的漫天烽

火，谈大革命时期张茂修为国民党特派员，徐永丞、徐子斌等为委员，李晓葛、曾性田、王卓斌、姜步瀛等分别在盛家坊、太平店及庙滩的斗争活动和攻打县城的悲壮；和宋良猷同志谈纪大刚、陈文朝、纪大林、纪大祥、刘家大道子、小道子入党，在1928年春收鸦片捐时斗争的胜利。高如松还记得，青山港靠近谷城红庙河、四方山、银洞山（谷城边境土官垭），这一带有几个党员，如张自新、张家训、刘进村等后来跑到张治中部去了，李龙、叶明德是大地主，但加入了共产党；谈知识分子党员张自新、李龙、孙连甲、吴生白等在反苛捐杂税中做宣传工作的片段，又谈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凭主观杀掉蕪山游击队负责人龚春林和十个大队长造成的损失……

高如松如泣如诉，他说：“襄枣宜钟苏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在枣阳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劣绅，建立工农革命军，建立苏维埃，到1932年失败，前后共五年。五年中，党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土匪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功绩是显赫的，同时教训也是深刻的。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了牵制作用，对鄂北土地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宋良猷对高如松的总结表示钦佩，他说：“鄂豫边良好的斗争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的英勇牺牲和劳动群众革命的积极要求，在程克绳、杨秀阡等同志适当的策略，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由抗粮抗税反大地主团绅斗争直到土地革命，形成革命割据局面，这是鄂北革命运动的一个特点，值得研究。特别是红三军进军均房，对鄂北反动统治震动很大。对鄂北劳动人民起了良好的深远的影响，也是对鄂北革命工作的有力支持。”

三位亲历者道出了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的真实背景，尤其是高如松用哲学唯物主义观点作出的评价，使襄阳土地革命时期的那段历史一直定格在与湘鄂西苏区乃至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斗争水准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在这次会谈中明确表述，鄂豫边革命斗争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同时遭到了严重失败。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对革命是有益处的。当时在鄂北、鄂豫边区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也没有抓紧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在红军中没有形成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核心是失败的根源。从当时的情况看，形势是好的。反动统治使人民到了不能生活的境地，而且社会情况很混乱，封建割据也很分散；劳动群众迫切地要求革命，对共产党寄予极大的信任，虽然他们遭到很大牺牲，但对党还是热烈拥护的；革命干部也并不是太少，英勇的斗争情绪很高；已经建立了红军武装和苏维埃政权；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相距不远，且能互相呼应；如果领导得好，襄枣宜钟苏区对中国革命是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但鄂北鄂豫边区党的领导，没有能够根据马列主义的真理把上级的指示与当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缺少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小苏区依靠大苏区的依赖思想。因此，对鄂豫边区没有一个长期革命的出发点和胜利如何进攻，失败如何退守的战略计划和部署。这才是鄂北苏区最后得以丧失的根本原因。

高如松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了鄂北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其政治眼光和政策理论水平可谓高屋建瓴。他没想到，回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央办公厅及各部门大多数干部被揪斗，高如松也不例外。中办为对这些“有问题”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和审查，便将他们安置到“中办学习班”（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学习毛泽东思想，以使广大干部迅速走上“五七”道路。就这样，1969年1月高如松被下放到中办五七学校进行劳动改造。谁知，高如松在劳动改造期间因长期安

排在农药仓库居住，造成农药中毒，渐而引起肺气肿。到 1971 年便趋严重，被送到北京治疗。

1972 年，高如松的肺病日益严重，他已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生出一个念头：把自己的革命经历写出来，对朋友、对同志也算是一个证明。于是，他便于病床上边回忆边撰写《我的一段经历》，文中用自传的形式真实地叙述了自己在大革命和新民主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写的最多的当属他在国民党的追捕中寻找党组织的曲折过程，尤其对原鄂北特委联络总站站长韩采芹

(韩化龙)、原鄂豫边枪炮厂厂长赵歧周、原襄南二区苏维埃主席李明友隐藏于国民党新编二十师欲图兵变并合力帮助他冲破层层险阻到达江西瑞金苏区的过程叙述得尤为详细，且客观真实。文中写到他途中突患伤寒，韩采芹(韩化龙)亲自送他到开封让爱人王新陆照料整整八个月时间，病好后，韩又亲自将他送过敌人封锁线……促成他如愿到达延安。

写到这里，高如松便想到了韩采芹的爱人王新陆，他十分感念她在开封照料他的这份革命感情，他已于 1949 年 5 月调回襄阳任行署第一任专员后，亲自到韩采芹家，安排她到教育战线工作，并将其子女韩宁华安排到水利战线就业；他离开襄阳后，每年还给她寄钱照顾，并往来书信问询。想到这儿，他便让工作人员发电报给王新陆，让她来京谈谈韩采芹与自己分开后的革命经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爱人谢绍文的促成下，王新陆来到了京城，与他交谈了两个多月。

王新陆再次详细地告诉高如松：韩化龙 1948 年在洛阳伪师营区司令部任参谋主任，是年 3 月 12 日即洛阳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军官枪杀而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韩的一位老战友孙伯蔚(四川自流井蜀光中学校长)写信告诉她的。孙称他在自流井遇见韩的一个参谋李恒久，李的爱人黄德容告诉他说：韩采芹那天化了装，穿着便衣出城去迎接解放大军进城，行至洛阳西门时被

伪青年军官搜查。伪青年军官发现韩采芹携带有共产党的文件，便当场开枪将其打死，安葬时李、黄均在场。

王新陆还告诉高如松：“孙柏蔚本是襄樊人，中共早期党员。幼年时就与韩化龙友好，后为北平燕京大学教授。1945年南下于自贡贵族学校任教。韩化龙奉命隐匿自贡警备司令部工作后，二人接上了头。为安全起见，孙柏蔚与韩化龙商量，到当地给韩化龙找个对象以方便隐蔽。于是便把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戈义演话剧

《渔翁的女儿》的女演员江良碧（1923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小商家庭，1945年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自贡女子中学）介绍给了韩化龙。就这样，为了安全隐蔽，韩化龙于1946年春天在自贡沙湾饭店与江良碧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孙柏蔚为他俩的主婚人。后江良碧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韩宁荃。韩化龙离开四川后，江氏母女便留在四川相依为命，听说因韩化龙的问题受了不少牵连，小女宁荃被打成黑五类子女竟失去了升学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可怜哪！”

听完，高如松再次潸然泪下。他在襄阳任职时就曾听到王新陆说过这段经历，然当他问及李恒久和他爱人黄德容的下落时，王新陆却连连摇头。此次相见，王新陆不仅向高如松谈了很多过去未曾谈出的有关韩采芹的事情，而且还将韩采芹给她的信函交给了高如松。其中一封信云：

爱妻：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近日里我思绪万千，如果我有幸能重归故里，和你和我可爱的儿女团圆，和我年迈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及我的乡亲们团聚，我将感到多么温馨而深切地快乐啊！一想到这些，我就要落泪。你无法确切想象你对我和他们对我是多么珍贵而挚爱。

不想这些了，我是个军人，以国家为重要，舍小家，为国家，有国才有家。等我解甲脱下军衣回家了，我定给你当牛当马，帮你干活持家。若我不幸，为国捐躯了，你不要难过，要砥砺前行，前进定能胜利。我希望爱妻相信我的话，曙光定来。

新陆爱妻，你比我强，你有宁华儿，还有两个女儿，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可我呢，单身一人在异乡。我有职无薪水，战乱国库无钱。我知道你们母子三人缺吃无穿，但是暂时的，你可以去找亲戚求助。待时运好转，立马还债。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试试看，天大的困难，你要克服。无论如何，你得让两个女儿读书，读书的目的是学文化、求知识，多读书明道理，能写字、会算账、不愚昧，今后两个女儿是你的依靠无论是种地、经商都需要文化，让她们具有中学成绩也行。母亲是孩子的家庭教师，家教很重要，你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表里如一，教书育人，教育孩子自小做起，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思想……我深信爱妻是坚强的女人，是有智有谋，培养孩子定能实现，为社会、为国家当有用的人，不会被社会淘汰。

时王新陆已年逾七十，为了不让友妻伤心，高如松不再提及当年之事。为了澄清韩采芹的历史问题，还韩采芹一个清白，1973年高如松又发电报将其子韩宁华接

到北京，就其父亲韩采芹的一些事情与韩宁华进行进一步交流。他告诉韩宁华：“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曾见到过西藏军区司令张经武，我问张走时见到韩采芹没有？张经武说在洛阳办事处见过采芹”。并说：“整风后，张经武死，死前曾写过一个是证明材料，证明韩采芹在部队表现尚好”。

韩宁华将高如松告知的这些情况记在笔记本里。原来，张经武和韩采芹在河南周家口郃子举部队时有活动，韩采芹从郃子举部队搞枪弹是为了支援豫北暴动。高如松还告诉他，后韩采芹的行踪被郃子举发现后，他们向郃子举公开提出说：“你若上报，我们就说你叫搞的。郃怕牵连自己，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不了了之”。又说：“刘子久也和韩采芹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是一线）”。交谈中，韩宁华告诉高如松：“1972年4月，有两个同志带了一本有关父亲韩采芹的铅印航空急密材料，到生产队召开了贫下中农座谈会宣念了此信，称材料中没有发现父亲韩采芹叛变、自首、投敌等问题，念后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很关心，不仅对韩采芹本人负责，而且关系到他的后代’。这个材料有四个名字，另有两个叫彝（彝同）知行、韩机。之后贫下中农又补充了我的家庭情况，说韩采芹的爱人是被敌人打死的。材料中还有一份证明是云南××部队政委写的。父亲韩采芹从未到过云南，为什么有云南材料？”高如松说：“有这件事，日本投降前，韩采芹所在的郃子举部队（当时住四川内江系补充兵训练总处，韩采芹任参谋主任）准备拉到云南去改编成八路军，派刘希程去当军长，派宋良猷当政委，其中也有韩采芹。以后被国民党发现没有搞成，就解放了。所以有这个材料”。



韩化龙前妻王新陆

1976年照片

韩宁华在高如松家住了两个多月，得知了很多有关父亲韩采芹的真实情况。有一天，高如松的长子高军因外调也来到北京看望高如松。高如松问高军：“你怎么来了？”高军说：“是奉单位指示搞外调的，顺便来看望一下父亲。”高如松严肃地说：“搞外调是一件严肃的工作，千万不能道听途说，凭一面之词，要注重事实。”高军说：“我知道，父亲放心，我问的全是见证人，并摁有手印。”高如松这才点了一下头，让高军在旁边坐下。时高如松病情已是很重，他靠在藤椅上，许多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韩宁华见状，便拉出高军，说让父亲歇一会儿。可高如松对韩宁华做着手势，说：“你父亲的问题，可以提请组织调查”。韩宁华玩笑似的说：“现在活人的问题有的都搞不清，哪有精力去搞死人的问题。您还是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吧！”说完，便离开了高如松的房间。

由此可见，高如松对与他同生死的已故战友是多么的关心。

同年夏，高如松在襄阳公安处工作的二女婿熊继川到北京学习，到家里看望高如松。高如松又想起了跟他一起在蕪山、当铺搞农运，最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的原宜城县委书记胡培洲。他说：“我在襄阳时曾把胡培洲的妻子龚传英接到襄阳，想安排她到居委会工作，可

龚传英说在城里过不惯就没有去，执意回到了乡下。后来未来得及再见面，我就离开了襄阳，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咋样，想起来心里怪挂念的。”他委托熊继川回去后打听一下，把情况告诉给他。又说：“遇到能帮忙的，一定要帮帮他们”。后来，高如松的长子高军到北京，高如松再次嘱咐此事，这让高军和熊继川至今都难以忘怀。

熊继川从北京回后按照高如松的嘱咐只身来到宜城，在杨四奶奶（杨士键烈士的遗孀）孙女杨金花丈夫帮助下，熊继川找到雷河镇和平村一组见到了胡培洲的女儿胡钟琴。时胡培洲的爱人龚传英已不在人世，胡钟琴的女儿胡治玉被余益庵的爱人杨进（余益庵第二任妻子）接到了武汉，儿子胡治明已参加工作，仅胡治明妻子在郑集皇城小学当民办教师。熊继川得知胡治明有调妻子进城的想法后，主动找到县文教办一位姓张的主任，谈了想法，但因其是民办就未能办成。



胡钟琴（第二排中）2013年11月25日90诞辰时与孙婿江平（前左一）、孙女胡爽（前左二）、大孙女胡敏（前左三）、外重孙刘胡杨、大孙婿刘建波、小女儿胡治玉（第二排左一）、大女儿胡治芬（左二）、二儿媳刘庆华（左三）、大儿媳李光芹（左四）、大女婿龚新安（后排左一）、长子胡治明（左二）、次子胡治会在一起谈及熊继川为胡家奔波的情景，胡培洲的孙子胡治明至今都充满感激。年逾七十的胡治明回忆说：“高如松在襄阳时，和余益庵一起对胡家百般关照。1950年，是高如松亲自安排、余益庵亲自打电话让母亲胡钟琴（胡培洲的女儿）到襄阳公署为胡培洲填的烈士证。母亲不知道怎么填，余益庵就亲自填，然后让母亲带了回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都十分困难，高如松的女婿熊继川只要得知我们到了襄阳，就接我们到他家里吃饭。他家房子窄，可能熊继川的爱人高志阿姨却十分热情，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高如松自始至终对襄阳、对谷城、对与之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都充满思念。直到1974年4月生命垂危之际还与爱人谢绍文谈及韩采芹的事情，问襄阳地委有没有什么消息？要妻子想办法替他完成这桩心愿。可不幸的是，由于病情过重，高如松尚未看到韩采芹的历史问题得到落实¹，甚至连他写的《我的一段经历》未来得及结尾，便于1974年5月17日在北京溘然长逝，这件事情成了他未竟的遗憾。

高如松就是这样心里一直装着别人，却很少想到他自己及家人。他在北京与后妻谢绍文共生生了三个孩子：

¹注：韩化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列在襄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107名烈士之列，襄阳市烈士陵园编号A2064，FX881，——作者注。

高天明、高天小、高天亮，大儿子高天明凭自己努力读书分配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当上销售局局长，他没有为儿子通融过一次；老二高天小是个女儿，按理他该出面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可当天小考进师范被分配到河北后，他从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即便是他病重时刻，妻子谢绍文从关心的角度问他是不是把天小调回来照顾自己？高如松明白妻子的意思，但他对妻子说：“这时候调女儿回来，就不怕给别人落下口实？”谢绍文知道，高如松说的口实就是怕别人议论，说他借自己病重以需要照顾为名调亲属进京。她这位宣城最早的组织部长，又在国家八机部当过数年的人事处处长，何尝不知道高如松是怎么想的：正直了一辈子，何必因一件小事而毁了自己的清誉？就这样，高天小在河北省省城一中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1985年病逝也没有进京。小儿子高天亮本在北京，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如松1970年主动提出把他下放到襄阳伙牌镇清河店10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里，高天亮一干就是两年。几年间，虽说天亮得到韩宁华堂妹韩庆英和丈夫乔千义的细心照顾，可风里来雨里去，毕竟让小小的天亮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有了回城的机会，高如松仍然没有借自己的权力把高天亮调回京城。眼看着同伴们都远走高飞，高天亮不得已向哥哥高军谈了自己的处境。高军实在看不过去，托人直接找到了时任襄阳地委书记的王耀，道出了天亮的身份，要求给一个名额，让高天亮离开襄阳农村。以此，高天亮被推荐到广东电子工业大学读书，后来出国留学。没想到，高如松知道此事后竟狠狠批评了长子高军，并下令以后不准再打他的旗号办任何事情。1998年谢绍文病重，打电话让高天亮回来。天亮自知家风严格，又逢母亲有病，没提任何要求，在谢绍文病逝后直接下海经商，并离开父母的居所，搬到北京三里河一带居住。

高如松一生廉洁奉公，世人莫不景仰。正如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十一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

的黄火青同志所说：“高如松同志是党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直为党老老实实在地工作，他虽然没有负特别重要的工作，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坚持到底”。

是的，高如松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虽然他并没有身居要职，地位不曾显赫，可他的影响却无不深远。

2007年10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硕士、著名外交官切斯特·朗宁（1894年生于湖北襄阳城内，青少年时代一直随其父母在襄阳生活，1946年任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可以说是鄂北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见证者。）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高如松、李实、黄火青等与谢远定相提并论，称他们是湖北革命学潮和农民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使高如松的名字与鄂北革命的斗争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

如今，高如松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公墓。襄阳的同志和北京的好友常常到此凭吊，谷城县政府领导已决定将其迁回谷城县烈士陵园安葬，以便谷城人民瞻仰，将如松精神世代传承。

呜呼！如此善终，非忠信笃敬者，孰能与于斯？如松厉精不息，以生命而践信仰，虽经万死从未易志，永不二心，为信仰尽忠骏奔，可谓笃矣。

考其履历，其磊落坦直，识者皆为挚友，黄火青、韩采芹（韩化龙）、李绍棠、余益庵、赵歧周、李明友、李晓葛、李庚尧等莫不钦之。其善始善终，所行无偶，身体力行共产主义之信仰，较之傅良驹诸人，何同日而语也。其奔太平，战石花，攻谷城，巡均州，扼马长嘶，何其骁勇，赫赫之功，何可泯焉。

传曰：“自古一国之兴，必有一代信仰之臣”鄂北有如松群仁，无愧乎此。其初在谷城，遣书记职，再回谷城，委苏维埃主席，却为汤慕禹、朱勉之“惩龚缴械”事件而拒赴任。究其所志，岂让古贤哉！后经董必武推荐至延安，于中央组织部领导陈云、李富春、陶铸身边工作，可谓荣耀至极；新中国成立后位极国家一机部局

长之位，此皆竭诚为党奋斗使然，正所谓“纯礼得其果，诚心得其报”是也。

赞曰：“如松抱忠忘躯，犹松卧雪守节，令人仰止。”余惶撰拙文，以申追慕，惟其信仰与忠于百世可知矣。

张璞定稿于壬寅年秋

本书参考文献：

- ①中共谷城县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蕤山红旗》
 - ②中共襄樊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共襄樊党史人物传》第一集
 - ③张银元 刘芳 主编，《谷城英烈》
 - ④中共老河口市党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老河口党史资料》
 - ⑤刘家国 邓有福主编，《谷城革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
 - ⑥吉道明 朱守国 吴德志主编，《宜城革命史》
 - ⑦武汉市硚口区史志办公室，《硚口区志》
 - ⑧刘家栋著，《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年 5 月
 - ⑨蔡康志 段德文 赵一凡 主编《鄂豫边区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 月
 - ⑩郝敬东 主编《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文汇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 刘新平 主编《长渠志》，方志出版社，2003 年 4 月
- 高如松《我的一段经历》
- 李晓葛《蕤山红旗永世飘》
- 李澄清《关于茨河农民暴动之回忆》
- 黄火青《有关高如松情况的片断回忆》
- 李实《谷城暴动》
- 李庚尧《对谷城革命斗争的回忆》
- 傅伯绩《蕤山农民暴动之回忆》

刘家国《九里坪抗禁春戏斗争》

张光年《我在老河口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高如松长子高军《我对父亲的回忆片断》

马宗佑《湖北解放的收官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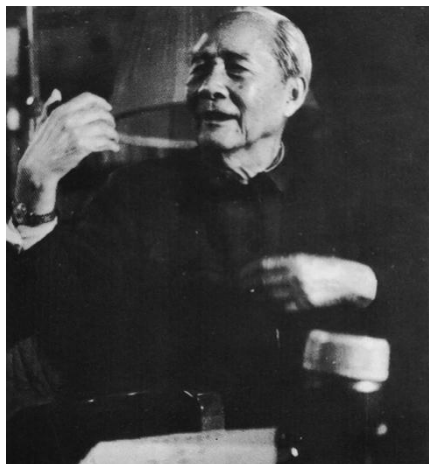
韩宁华《关于父亲韩化龙（韩采芹）的有关材料》

附：

一、黄火青《有关高如松情况的片断回忆》

有关高如松情况的片断回忆

黄火青



谷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收阅来件，仅就事实，时间略加修改，保留原谈话录音形容，现退还你们。

祝新年迪吉！

黄火青 1984 年 12 月 28 日

我看了你们整理的《高如松同志生平简述》这份材料，里面有个问题提出来供你们研究：高如松同志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襄樊学生运动、“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鄂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你们谷城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你们在材料里没有反映出来。

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黄火青同志，介绍高如松同志在襄阳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活动情况

我和高如松相识很早，我们是很好的同志。他在鸿文书院读书时，高我两个年级，但他的岁数比我小几岁。我和李金铭、黄冠群一九二四年春在鸿文书院读书，是秋后考入第二师范的。我和他的感情很好，我了解高如松同志，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应当写他的传记。我给襄樊市委写过个材料，反映了襄樊学生运动的情况，高如松同志是襄樊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襄樊学生第一批入党的党员。我一九二六年入团时，高如松就是团支委，他那时还是我的领导哩！给他个人立传很需要，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你们写的材料，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有些问题还请你们考虑。你们在材料中说高如松受董曦轡的进步思想影响，这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我在鸿文书院读书时，还看不出董曦轡有什么进步的表现。董是一个近视眼，那时是鸿文书院的校监，他对学生管的可严啦！我们夜里想看书，他要叫我们关灯……说受他的影响，要有根据。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听人说，董曦轡入了党。我在鸿文书院读书时，校长是加拿大人，高如松带我去过他那里，他向我们宣传进步思想，开始，我们以为欺骗我们，讲漂亮话，不相信他那套。新中国成立后听说他是一位进步的外国友好人士。董曦轡和潘惠安住在一起，当时，看不出董有进步表现。

还有一点，高如松和宋良猷组织“读书会”问题，那时宋良猷是二师学生，高我两个年级也是闹学潮的领导人之一，他们是怎样组织的“读书会”，我没听说过，可能就是他们组织进步学生参加国民党组织活动吧！我到十中，宋良猷也到了十中，这时，谢远定已去了。谢远定去后，一方面发展国民党，一方面发展共产党、共青团，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宋良猷是不是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你们查查高如松有关自传。

我到鸿文书院读书是春上去的，没放暑假就走了。我到鸿文书院想去补习语文、算术，因没有什么长进，我对教会教育不感兴趣，就离开了。一九二五年秋，我

转入十中读书，我去时，高如松已在十中了。在十中，我们进行过一些秘密活动。记得的有两次：一次是在老龙堤开过一次会，从西门出去，经过一块地，在那里秘密开会，是开国民党骨干会，记不清是谁主持开会了。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冬（十一月间），在十中一进门到第二排教室里开会。那天晚上教室里不叫点灯，只听到有人讲话，看不见人，一听就知道是谁。我记得有高如松、姚昭德、孙孝承、宋良猷等人。人到齐了，由高如松宣布开会，他说：“大家不要讲话，现在请负责人讲话。”接着由宋良猷讲话。内容是：同学们要买几本书，寒假回家去搞好宣传，一个人要宣传三个人，要宣传革命，宣传北伐军……

我在十中时，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参加演节目。一九二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我和光化的张国威、熊玉珩三人是主角，自己编节目，自己导演，开始在谢远定门口场子里演出。以后又到校外去演，一九二六年我入团后，领导谈话要我到广东黄埔军校去学习，我很高兴，我到了武汉因其他原因，没有去成，又回到本县工作。

高如松好像和我说过，他在河南南阳特委工作过，我有个印象，好像他在南阳特委工作过。

张联升是十七混成旅旅长，他的部队有炮兵，是小军阀。

再一点，我们二师学生反对校长单家燊，高如松他们鸿文书院学生是支持的。

我记得，高如松还任过热河赤峰市委书记，也在热北地委工作过，我到热北工作时，听过他作的报告。他讲热北那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很厉害。

你们在材料中提到李金铭等人，李金铭是我很好的朋友，是我同班同学，白生俊和我弟弟是同学；王振三、高泽普是二师开除的学生，高泽普高我两个年级，白生俊高我一个年级。开头时，谢远定去后，成立团的组织，宋良猷是团支部书记，高如松是团支部委员，还有孙孝承等。我们从襄阳分开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才碰见高如松，他也在延安党校学习。延安学习

结束后，我们在热北又见面了。以后高如松调到一机部、化工部工作。你们在材料中写高如松在铁道部机车车辆制造局任副局长，应更正为一机部机车制造局副局长。

高如松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因农药中毒，引起肺气肿，不能动，送到北京治，造反派调查我的材料，采用威逼手段达十次以上，他没有胡乱写一个问题。他写的材料还要造反派给他签个字，留作底稿，一直保存下来。以后病势加重不幸去世。

高如松同志是党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直为党老老实实地工作，他虽然没有负特别重要的工作，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坚持到底。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每年过节日都要到他家去看看。现在人老了，很少去了。

我知道高如松同志的情况就谈这些。

(据 1984 年 11 月 21 日在黄老家录音整理)

严华山、王志成

作者简介：黄火青同志是湖北枣阳人，192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市和辽宁省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并当选为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先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二、《董副主席办公室给高如松同志的一封信》

董副主席办公室给高如松同志的一封信

如松同志：

您十月九日给董老的来信，对湖北大革命前后党史编写的建议，董老看后认为很好，并且对鄂豫边特别是鄂北，提供了较多的革命史料线索，这一定为湖北省委宣传部所需要，同时做这些具体工作，也只有湖北省委

宣传部才能担任。听说他们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为了收集这些资料，设了专门人和设立了专门机构。据我们所知，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董锄平），就是专门收集湖北革命历史资料的机构。

董老嘱我们除将您的信抄存外，并将原信退回，请您转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同志），他们一定很欢迎的。

谨致
敬礼！

董副主席办公室（章）

十月十八日

编后：高如松同志生前很关心党史编写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信给董老，提出了对湖北大革命前后党史编写的建议，对鄂豫边特别是鄂北，提供了较多的革命史料的线索，曾受到董老的称赞。这是谢少文同志（高如松的爱人）处保存的当年董副主席办公室为此事写给高如松同志的一封信。我们将高如松同志的回忆录和董老办公室给高如松同志的一封信一并载出，以飨读者。

三、高如松《我的一段经历》

我的一段经历

高如松

一九二八年春，我任谷城县书记不久，李绍棠自广东潮汕失败回到茨河，由李任书记，我为县委委员，到庙滩薤山一带工作，李金铭在靠均县方面的九里岗工作。这时，薤山一部分大刀会与盛家坎绅士刘家有矛盾，我们想利用这个矛盾组织暴动未能如愿。当时陕西杂牌军岳维峻部驻鄂北，苛捐杂税层出无已，更引起谷城、均县等地区大刀会的发展，但均为地主、富农分子所掌握。我们在庙滩、薤山、九里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中力量微小。由于汉水西的谷城、保康、房县等县以及均县，在大革命时期，乡村未进行过农民运动，除均县仅有为数几个革命青年学生外，这些县属山区，交通不发达，处于半自然经济状况，地主子弟上学的也很少，因而缺乏搞农民运动 and 在大刀会中活动的桥梁。这一带山间有哥老会的活动，学习哥老会的“行话”须得一定时间，以哥老会身份出现还缺乏条件。我们在薤山吸收了一个私塾教员是哥老会的一个小头目。哥老会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穷苦的农民，也有以此为生的乡村流氓，他们依靠小地主、富农对农民进行敲诈过活。我们当时执行的是“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缺乏长期艰苦的工作精神，想学枣阳由反抗苛捐杂税而利用大刀会等组织发展游击战争。枣阳距京汉铁路不远，大革命前全县有十个高小，在樊城、武昌、北京上学的也不少。大革命期间，法国留学生程克绳回到枣西乡村开展农民运动，与大地主展开了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枣阳党利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青年团员等知识青年，进行大刀会活动，首先由反对苛捐杂税发展到武装斗争。汉水西谷城等县缺乏这个条件。我们虽然配合大刀会围攻过驻石花街岳维峻

的部队，参加大刀会围攻谷城，大刀会小头目、党员丁德忠爬城墙被打死了，傅伯绩的大刀会也被打伤了人。事后才知道一九二八年秋间，盘踞河南、陕甘的冯玉祥和桂系军阀合谋，互相配合，围攻陕边、鄂边，驻鄂北的杂牌军岳维峻，驻豫边、鄂北的樊钟秀部被赶到皖北一带投靠了蒋介石。同时，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开展“清剿”鄂北的大刀会，认为大刀会是由共产党所掌握的，公开宣布大刀会为非法组织。这一形势变化，鄂北特委事前不知道，事后无对策，枣阳工农革命军离开枣阳到钟祥北部活动被打散，汉水西谷城一带的大刀会，以大地主为首的头目摇身一变参加“清乡”，小地主、富农、农民的大刀会首领被迫逃离家乡，蕪山李陶庵、李麟，庙滩姜步瀛等逃亡南漳、保康等县。我在庙滩一带党员家不能住下，亲属处久住亦成问题。主要原因是农民还未得着革命利益，生活自顾不暇，当然无力掩护。这样我打算到襄阳北乡找大地主出身的学生党员李自修和住过武汉分校的薛斌。薛、李在襄北当土匪，到他们土匪队伍里住一时。我就由庙滩附近渡汉水，经太平店，利用社会关系到了离太平店卅余里的杨家湾住了几天，这里与襄阳北乡有土匪活动，行人断绝，不能前往。我又由杨家湾到太平店下头龙家巷章仁山舅父家（与我母是叔伯兄弟）。此时章仁山不在家，他在岳维峻部他家门哥哥章××那里做司书一类的事（这里当时农民跑到西安方面当兵的不少）。那时他的父母还在，我住了几天，过汉水到白马洞张大福家，张是我的同学，他自广东失败回家，是破产小地主家庭，不能久住，一两日后我到武安镇张雄家，张从樊城搬到武安镇，当时任南漳县委书记，以手工织袜子为名。他本是南漳的人，生长在襄樊市，这里有些亲属关系，他家夫妇小孩共五人，党员勾颖超与他们是亲戚，也住在这里。我在张雄家住了几家，李绍棠自枣阳也来到这里，李是到枣阳当工农革命军党代表，还未到职，工农革命军已被冲散，也是

无处存身，到这里来的。这时鄂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已很困难，我和李绍棠商量，想由襄阳特委介绍到南阳特委方面去活动。住了几天后，我和李一道由武安镇到襄阳东门外王作宾、王步岳叔侄处，见了特委委员余施

(世) 颂，我们向他谈了要求到南阳特委去工作的意见，余说南阳特委有信来(原文删节)。当晚我和李绍棠过河到樊城我的外祖母那里，还在我姨母那里弄了十余元钱。是日晚，李绍棠在我外祖母那里住下，我由外祖母送到基督教牧师李济武那里过夜，李济武牧师是我姨母的老公公，恰巧李金铭也离开谷城九里岗准备回枣阳、襄阳边境家乡去(李金铭家是大地主，逃匪难住樊城基督教会堂附近，李金铭家与李济武牧师有来往)。我离开樊城基督教鸿文书院(中学)曾与李金铭等反对过基督教活动，这一晚打扰是被迫而去的。我外祖母住了一间当街的房子，便是樊城十字街基督教会堂的对面，周围的人是认识我的，还好李金铭家与李济武牧师有感情，李金铭也不期到李家来了。总算打破了被压抑拘束的心情，当晚我和李金铭约好了往后的通信地址，翌日清晨，我和他一起出城，他由东回枣阳家中去，我过汉水到距襄阳县城三四十里的一个集镇吴家集去，这里属南漳地面，该集镇上有家药铺姓杨，是我一个叔伯姐姐家。住了几天，虽愿意招待我，但离襄阳太近，不方便，我又到武安镇卫家。这是我父亲的异母姐姐(我的姑母)家，我算是第一次到卫家，这是一个破产地主家庭，姑父以星相过活，还愿意接待我，我打算住过旧历年再说。南漳武安镇仅有零星工作，张雄家住的人多，来来往往的有些人，织袜子只有一两盘空机，又没有生产，此次到武安镇就未到他那里去。卫家一个表兄抽烟，在烟馆里吹表弟高如松怎样怎样，已被我知道。这时枣阳失败后有一两位同志逃到武安镇，被枣阳民团追到武安镇逮捕了，因而震惊武安镇市面。武安镇是鄂北山区一个山货

集散地，是个商业很发达的市镇，有一条蛮河往东流入汉水，可以行船。这时是一九二八年冬末，再在卫家住下去有困难，往新野去要经过襄阳南乡，樊城附近。襄阳南乡没有工作，南乡第十中学学生过去都拥护襄阳十中校长陆云龙（陆是襄阳南乡刘家集附近人，北大毕业，有自由主义倾向，二六年我们不应反对他）。这样我沿蛮河下来，准备走旱路到汉口，往上海。我走到钟祥县上边襄河附近碰着薛斌（他在襄阳北乡当土匪已不能活动，举家逃到离襄阳城卅多里的地方——薛家巷子，那里都姓薛，与薛斌是同姓）。他在襄河岸边一个过路店住了几天，店老板要他拿出钱合伙开店，他看不能住下，准备回襄阳城西薛家巷子再说。他说，襄阳县要派孙伯愚（此人现在四川自流井，已退休，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叫他把握时机，拖到枣阳改编工农革命军，自购防匪枪支，群众不愿意去枣阳，要想打死孙伯愚，薛斌说他制止了（自此襄阳县委与薛斌断了关系，他才自己当土匪）。孙伯愚从此离开襄阳往上海谋事，即脱离了党的关系。

我经钟祥、天门、汉川等县到汉口，想找堂兄高廉泉，他在一个小报社当编辑，没找到，当晚就乘飞虎轮船到上海去。住在信义会朱浩然牧师那里，我说是来找孙伯愚谋事的，当时孙伯愚已离开了上海。到快过旧历年时，李绍棠从鄂北到了上海，赵彬贞是李的未婚妻，李就住在赵那里，生活由赵照顾。李在街上碰到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当即将自己住的旅馆地址告诉了李绍棠，此人是个党员，我与李绍棠就到那个旅馆找那个人，旅馆说他已经走了。我当时想找党的关系，那个人从一九二七年秋冬间东江失败后分开到二八年底已是年把了，原来不大熟悉，仅在军队中见过几面。他碰到李绍棠时，李身上穿了件麻料外套，那个人不敢再见李绍棠了。李

绍棠到上海之前，我在闸北朱浩然信义会附近还碰到过来自襄阳的薛斌，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他的叔父薛××，同族薛××，另外还有张星若，他们是来找马轶先的。马是襄阳北街人，住樊城，给孙中山当过卫士之类，住过一期黄埔，由团长调换到上海吴淞当参谋长。当时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正以编遣军队为名排除异己，薛斌在上海当兵困难，后来由轶先介绍去镇江到国民党某部当兵了。他们以为我找到了党的关系，我说没有，他们不太相信。后来李绍棠碰到了一个人，北伐时在唐生智部同过事，原是党员，名字叫曾雄镇，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此时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附中农场当主任。曾已无党的关系，李与曾商量同意我去该农场当工人，曾的弟弟当领工，农场的几个工人是邻近的农民，我与曾等同住。过了月把的样子，曾说我还是应该补习功课，到暑假考劳动大学，该校是公费，他可以帮忙，送了我几块钱。这不言而喻是下逐客令。已是夏初的样子，我在曾那里得知毛主席已经把红旗插在井冈山上，蒋桂战争快要爆发，我又到闸北李绍棠的亭子间住下。这时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小印刷厂招学徒工，我们去接洽，因为找不到铺保不接收。不久，接到我姨母一封来信，说韩直卿在南京警卫团某营当某连副。韩是我高小同学。久住李绍棠处吃饭成问题，这样我就到南京去，想找韩解决生活问题。二九年夏末的样子，我到南京住三牌楼一个六福客栈，五分钱一晚，我有意寻人……一天，我在三牌楼附近碰到勾颖超，不知什么时候，他从武安镇的南京，他是即将到北京去的，我给韩直卿写信，后来他到这个小店找我。他住在三楼附近一家老百姓家里，通过勾颖超我又知道了韩采芹（韩化龙）自湖北竹山经老河口、南阳到了北京。与韩通信中知道马适安自襄阳流亡到安徽，在一所基督教小学教书。暑假期间，马适安自安徽到南京，秋后将到山东青州师范当教员，月薪80元，马与襄阳张家湾尚某通信知李实（抱一）不久要到上海，马适安告诉李实经过南京时见见面。秋季快到

开学时节，李实、毛定方、陈××三人来到南京，原来马适安让我与他到青州师范，住在他那里……前鄂北特委书记廖划平自襄阳到了天津工作，马适安与廖划平已通信联络，李实到南京见面后彼此交谈……但我抱有到上海看些文件、了解党的政策的想法，李实当时亦承认为我办这件事。毛定方留南京，枣阳人陈××也从此离开李实，我们三人就住在韩直卿房东老太太的一间小屋里，李实到上海后一再支吾未见着潘东周，当时南京市伪社会局有董老一朋友袁碧堂当科长（湖北光化人），有党的关系，南京市委秘书谭籍安（湖北宣城人）随袁到南京上学，谭籍安知道我是个党员，袁碧堂也知道我是个党员（仅在武昌他家里见过一面）。袁与李实很熟悉，毛定方、李实和袁碧堂的外孙左觉农都是襄阳二师的同学，毛定方也认识袁碧堂。我本来想到上海学习一时就返回鄂北，但去上海了解党的政策的想法不能实现，也未与马适安到青州。这样我就和毛定方、陈××三人与南京发生了党的关系，一位高个子湖南口音的叫元顺的与我接谈。

毛定方由其侄儿毛锦章（北京某大学毕业，认识阎锡山的参谋长襄城人朱绥光，朱当时是伪军政部副部长，毛锦章是该部一个科员），在该部印刷厂找了个司书职位，陈××到兵工厂当工人，我由市委介绍到中山陵园东凹子小学帮助教员汤藻教书。原来想从这里开展农民运动，从农民补习学校入手。当时陵园从北平招募了不少旧警察，多是山东人，分区驻守，距这个小学不远设了一个派出所，南郊市委无力量搞农民运动，后来这个工作就放弃了。汤藻是东台暴动失败后跑出来入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后被派到这个学校当单级教员，月薪二十元，另外还有一个东台失败后逃出的农民住在这儿。已是一九三〇年春季了，李金铭、金声，宋良猷等写信叫我回鄂北去，我由这个小学回到三牌楼原来所住的地

方。时值河南、山东等地蒋、阎、冯新军大战正在进行，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危机。立三路线在党内正占统治地位，南京下关和记蛋厂以极少数失业工人想打进厂动员在业工人罢工未成。这年夏天湖北在上海开党代表大会，李金铭、朱育文代表鄂北出席，李被选为省委委员，李写信告诉我到南京与他们一道回鄂北工作。这时我姨母给我寄来卅元钱，但要到上海兑换，我到沪兑钱后找李实，李说，李（金铭）、朱（育文）二人已到南京找我去。在小旅馆内看见毛定方自南京来了，准备进苏区。翌日，我回到南京住地。李、朱已在那里等我，李让我回去任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朱是特委委员，任老河口中心县委书记，我陪他俩看了孙文墓。翌日，送他们到船上，小偷把我的卅元钱偷走了，李给我十元旅费。我等候着谭籍安见面转关系，约十来天，谭到我这里来，说是自上海汇报工作才回来，所以说好久未来，他说他到市委书记住处，听房东说市委书记被抓走了，叫我赶快离开这儿。我说我要回鄂北去，他说关系给我转回去。第二天我就乘船去汉口，住汉口市第五小学内李文涛处，该小学校长、教员都是鄂北人，住了几天我就到礄口基督教小学教员石田那里，有时到汉口协和医院护士吴德光处，吴是我小学同学，是石田的外孙。我等候李文作伴走旱路回鄂北，不敢坐汽车，怕暴露身份。我们坐拉货的车到花园，走路到枣阳。李文涛乘车回襄阳家中去了，我留在高如权处，想弄点路费到南阳会见宋良猷，再由南阳经老河口乡下转谷城工作。打算与宋良猷相见后谈我的看法，我认为汉水东襄阳、枣阳、宜城一带，群众经过斗争有骨干、有条件，汉水西缺乏这个条件。而汉水东襄、枣、宜间受南阳、襄阳两个城市逆势威胁，距离京汉线不远，很难发展。一九二八年冬，工农革命武装失败，无回旋余地也是原因之一。汉水西地处川边、陕边、鄂西北，崇山峻岭，居高临下。我读过国策一书，记得某篇中记载秦国的国王秦孝公由陕西南下灭上庸

（今竹山县）大宛国，准备进兵到宜昌，后国内发生问

题，秦孝公才转回陕西。我的意见是：在枣阳一带恢复发展人枪数百时，可拉到汉水西一带活动，这样大有可为。我在南京时就有这种看法，大革命失败后到汉水西活动，也是看到这一带地形好。当时高如权在枣阳无职业、无钱，还要等表兄、枣阳伪财政局长庄握生从襄阳回枣阳后才能设法弄路费，住了好几天，庄握生自襄阳回来与枣阳驻军范石生部某营长一起坐汽车，庄为拉关系，请该营长吃饭由高如权作陪。庄介绍高如权是他的表兄，现在无事，营长答应有个书记官让高如权作。饭后马上派一个兵到高如权家取东西即去，我看见高如权随着一个当兵的来了，我的一个表弟庄国材也来了，给我使眼色，这样我与表弟国材出去，国材叫我快走，他送我出枣阳城沿小道走。

第二日到樊城北邓城董家住了几天，后到竹条铺附近韩采芹（**韩化龙**）家住一晚，接着我又到了乔家岗王理书家住了十来天，后过庙滩附近在姜步瀛家里会见了朱育文。朱说我的关系已经转回来了，告诉我作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我到薤山李陶庵那里了解了些情况，回到柳树沟表弟陈尚辉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又到乔家岗，前妻王氏哥哥王理书要让我把前妻王氏带到石花街背后黄家大峪他们一个亲戚家住。当时不得不应付他们，同时自己也想找一个固定的场所。到黄家大峪住了七八日的样子，我同一位姓徐的到了保康歇马河，在这里会见了保康县委书记柳德彰，主要谈搞武装问题。小地主李子扬（**暗中当土匪抢劫财富**）掌握一部分枪支很活跃，他是哥老会分子。我后来与李见了面谈不上来，他不想离开本地，看来争取李子扬有困难。王理书的父亲王达三改姓黄，住在歇马河附近，我在那里住了一时，大约秋末冬初，我返回谷城，在傅春泉家附近见了朱育文，谈了这个情况。又想到保康找个据点，还想找房县城内的李民权，找竹山官渡河的芦渊，他们是党员，但数百里之间往返一趟颇不容易，因此与朱商议，谷城与老河口合并为一个中心县委，朱为书记，我为委员，仍在薤

山、庙滩一带活动。一九三一年初，听说兴山到了红军，我与蕪山的赵星三到保康歇马河后，才知道是兴山县地方游击队。这期间赵星三见了李子扬，因为赵也是哥老会分子，但李子扬很猾，仅是一般应酬，赵未敢深谈，让柳德彰设法作李子扬的工作。后来三月间，红三军到达兴山时，曾派人作李子扬的工作，李未有配合地主的大刀会打红三军。后红三军打下均县转移到房县，由朱育文介绍，我到均县游击区巡视工作。红九军游击队在均县活动，队长张香山与当地党委有意见，与当地红色补充营步调也不一致。均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郭潘（是红三军派来的）提议组织军委会，由红九军游击队长张香山、政委黎青（陕西人）、均县红补充营长徐达、政委金声，均县苏维埃主席高泽普和我为委员，我为主任，高为副主任。我随九军游击队活动。后因地主民团和反动的大刀会围攻，我们撤退到房县境内。当时白军五十一师范石生部进攻房县城，均县部队和工作人员随红三军绕武当山打了一个圈子，白军撤离后又随红三军到了房县城。这时均县红色部队成立了鄂北独立团，张香山调红三军。由红三军派了一个团长，金声为政委。我离开均县机关后，红三军政委邓中夏要调我到红三军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特派员柳克明（柳直荀）在场说叫我作地方工作，我未表态。我个人住特派员办公处，不几日，邓中夏派我参加房县近郊土地分配工作。仅几日的的时间，邓中夏又叫便衣队接我去谷城等地收买子弹和收集情况，他说以后再便衣队接我回房县。这样我随便衣队到蕪山，又连夜与李陶庵、赵星三等，到龙滩等便衣队。便衣队由蕪山到盛家墳上缴了民团八支步枪，折回到龙滩，把步枪交给了李陶庵。我由房县与马正泉二人带的四支手枪也交给了李陶庵。这四支手枪是从红三军要来的，给李陶庵准备组织游击队。李陶庵等回到蕪山，我到傅春泉那里见了朱育文。我将从房县带回来的三百元法币给了朱育文，朱当时将八十元给了一个青年党员（南阳商

会长的儿子，在老河口工作，拿钱回老河口营救一个被捕的党员)。后听说这个青年党员拿到八十元钱就跑了。我告诉朱育文，在老河口、襄樊设法购买军用子弹。



韩化龙（韩采芹）
潜入国民党新编二十师
第四团第九连任连长时
的照片

一九三一年冬，红二十五师由房县到石花街追赶民团到谷城，折回到盛家垭，我在傅春泉那里听说盛家垭到了红军，以为是红三军的部队，想随部队回房县。晚上到了盛家垭，见到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等人，他们已吃过晚饭，谷城县委书记李庭兰也在那里。朱勉之看见我，他把汤慕禹决定的几条意见通知我：一是薤山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二是决定我当主席；三是收缴龚春林的枪支。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申述了我的意见，汤慕禹从中解和说，我不当主席算了。朱很生气地说，我可以离开这里。关于收缴龚春林枪支一事，我说龚信仰红军，可以派一个人去当政委，给他以均、房、谷游击队的名义，让他发展。朱说怕龚当土匪控制不住，还是决定要缴他的枪。当时朱不是我的上级，但朱是红军政委，有权指挥地方党。李庭兰是个初中生，很年轻，坐

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已服从了朱的决定，而朱育文远在老河口，红三军又回洪湖了，要是与朱勉之的关系弄僵，我只有离开汉水西。当时五十一师仅有四个团，不愿分兵去攻打红军，与蒋介石有矛盾，民团力量不大，盛家离谷城卅余里，农民看见红军到了都自动地起来了。我想，可能自己有些右倾，同时我又不愿意离开汉水西，这样我就答应我作县苏维埃委员，推荐赵星三当主席。因他是哥老会分子，与薤山群众有联系，朱勉之同意了意见，我就离开那里到黄宗镒家去了，当晚在黄家睡觉。

翌日清晨，敌人突然来袭击，红二十五师当时仅有两个营兵力，未有组织反击就撤退到薤山。朱委任了一个县大队长，一个副主席（都是洪湖的干部），当即带红二十五师转回房县去了（后来知道是日清晨白军突然袭击盛家时，正是红二十五师收缴龚春林枪支时，当时用梭镖把几个小队长杀了，龚春林也被杀了）。以后我们分头下山组织群众，我由盛家靠黄土河一带活动。大约没几天，民团向薤山进攻，当时县大队人枪十余，抵抗不住，就由薤山撤退向房县方向去了。

我到山脚下陈家住着，等薤山游击队回来，本来我再走十几里到了庙滩，就可脱离危险。我以为红二十五师还会打回来的，就未往庙滩去。这时地主回来“清乡”，群众未经过斗争锻炼，党员未经过考验，我住在陈家一个悬岩石洞里，一天我到陈家吃饭后回到石洞里，看见麻布大衣被人拿走，不敢再住下去了，就下山经龙滩到浙峪朱八少那里。我说自己姓王，是樊城外王家营姓王的，与朱八少的内侄是表兄弟。朱也相信，后来知道龚春林的一个游击队长是朱八少的一家。有个哥老会分子姓周的告诉我，朱八少通红军，这里不能住，要我快离开。我就告诉朱八少我姓高（朱八少的老婆是我远门的姑姑），我是贺龙的红军，要回房县去，叫他设法

送我经保康回房县去。后来朱八少送我去保康，路经粟谷庙被把卡子的大刀会发现，把朱八少和我扣住带到粟谷庙里。这里两边是光秃秃的山，跑也无隐身的地方，群众随着反动派参加了“清乡”活动。当时把我与朱分开，我被捆在正殿，朱在偏房里被大刀会拷打着。朱说我是姓高，是贺龙的红军。大刀会的两个手工业工人来打我，向我要枪要钱，我说是红军宣传员，无枪无钱。大刀会是不脱产的农民，是先天晚上才集合起来的，他们虽受反动保长的指挥，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对红军还是同情的。当时我也年轻，青年农民都不愿打我。接着朱八少家请人来向大刀会说情，并送粮菜来给大刀会吃。这时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说，高风午到过他家里，我说高风午是我家门哥哥，是哥老会头目，在本地不能住，搬到保康住。有一个哥老会分子是粟谷庙附近的人，指着我说：“人家是红军，又不在这里闹，让他走了吧。”为我说好话。晚上大刀会到对面山上弄了两支枪回来。第二天大刀会把我带到附近住下，捆了一晚，次日把我送到宋家沟罗四贡、罗六贡地主那里，罗四贡问我有没有枪，我说没有（大刀会扣我直到这里未搜查过我）。他叫我吃饭，不要害怕，说王天合秀才在这里教书。晚上秀才王天合的小儿子和地主罗贡的儿子来看我，并说，襄阳的学生已经组织了义勇军，日已占领了东北，这时我才知道“九一八”事变。次日天下雪，两个农民徒手送我到伪中队队长地主罗子俊家里去，捆了一只手，走出地主罗四贡家后，在路旁地主罗六贡向我说，傅春泉（盛家游击队长，是他妻舅）跑到离宋家沟二十余里的地方，被大刀会扣住杀了（傅原想跑到他罗家地主亲戚家避乱，被伪保长周世恭扣住了，周的老婆被群众搜山时捉住杀了，这是以后知道的）。他叫我不要害怕，送我到罗子俊那里，世道平静些了让我走，要我在路上不要跑，罗家地主不知道红军已回洪湖。当时房县有红

军活动，襄阳、枣阳、宜城间红二十六师也甚为活跃，鄂豫皖、洪湖和中央苏区都正在大发展。红三军力量已经很大了，震动了全国，当然他们也畏惧红军力量，这一带没有红军活动，罗家地主财没损伤，这里是南漳、保康、谷城三县边境，地广山高，所谓“山高皇帝远”。罗家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以便对我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由于矛盾有了缓和，当时我的两只脚筋伤了，不能跑路，身上穿了一件夹衣，问路是不方便的。这里又有大刀会，我想给秀才王天合带个信，送信人一定会先给地主，引起地主罗家的怀疑，借给罗家地主写个信，再转给王天合看，通过此信，促进王天合在罗家地主方面的游说。另一方面也让王天合的小儿子到我前妻王氏家捎个信，弄点礼物到罗家来看我，使罗家感到有利可图，以延缓矛盾，我好乘机逃跑。

王家兄弟会用“三道连”下在山中十字路口毒野兽，山路熟，我准备问他们一个道路方向，伺机逃走。一天晚上来了个五十岁左右、身穿旧式马褂的人坐下烤火，伙计们称他侯参谋。他端视了我一下，问我认识贺龙、吴玉章否，我说认识。侯说早年在东京搞同盟会时就认识吴玉章，贺龙跟他是朋友。后来相谈时，知道侯清朝末年住过贵州讲武堂，由何应钦主办，侯本人做过团长，在川军杨森部当过参谋。刘湘部下一个旅，自动脱离了刘湘，拖到鄂西的兴山县，刘湘叫侯到兴山县劝说该旅长回川，仍归顺刘湘，该旅长不愿回川，侯也就乘机作了该旅的参谋，想在这一带发展势力。红三军路过保康时，劝该旅长不要打红三军不听，结果一打被消灭了一营。后来襄阳五十一师范石生要收编该旅，侯劝该旅长不要投靠范石生，否则将无好结果，果然该旅开到谷城县县城时被五十一师缴械。旅长被押，侯知其收编后无好结果，该旅由保康经罗家这一山间到谷城时，侯打听罗家好交朋友，就到罗子俊处而受款待，估计侯身边的手枪可能已送给罗了，想在此弄点路费回川。而罗家则交结了位朋友，一旦侯升官时可有谋事外出机会，两相

为用。总之，侯是川军中一个失意军人，他自称是熊克武派（民主人士，现尚在北京）。红军的发展并不危害他自身利益，所以政治上有中间的可能。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侯参谋的勤务兵对我说：“侯先生要你到他那里去玩。”侯住在我与伙计们住房的后楼，罗子俊新盖的三间（或四间）正房很高，其余偏房还未盖。我去到侯处，罗与侯在大烟铺上靠着，罗子俊向侯展示董曦轡、彭养光给他写的两件扇面。董是樊城鸿文中学的校监，末考秀才，齐鲁大学学生，在鄂北一带很出名。彭养光是钟祥人，国会议员，是鸿文中学国文教师，孟觉的连襟，教过我的国文。我也顺便把董曦轡夸奖一番。董曦轡加入过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病死在公安县，罗子俊不能不知道。我也说到在鸿文高小认识李必清（李是罗的妻）。罗谈到房县在清朝年间有十股土匪，自立为王多年。侯说长江流域受帝国主义侵略，红军想要大发展，像四川就不容易。并说邝继勋一个旅暴动失败了，侯还说原来西南军人对贺龙希望很大，后来贺龙把甘××（一个师）的枪收缴了，一般地方军人再也不敢投靠他了。侯说他的太太与龙云（贺龙）太太的公馆住在附近，显然侯在吹嘘他与贺龙的关系。好在罗子俊面前创造游说条件。侯说，他见过红三军的标语，允许贸易自由等。罗说，贺龙的红军一个便衣队到他家附近问过路，他就不管让他走了。并说蕪山游击队（龚春林的）被国民党“进剿”时曾捉到了一个民团队丁，问是罗子俊伪中队的。把他放回。罗表示与红军并无恶感，并说要我在他这里住一时，平静了就让我走。侯说要是上边知道来要，你就说解决了（杀了）。他说在四川放人就用这个办法。侯晚上常在楼下烤火，问我懂得诗赋否，我说不懂。他把《北军入川行》念给我听，军阀吴佩孚派兵入川与四川的杨森、刘湘等，攻打熊克武，熊当时拥护孙中山，这《北军入川行》里记载了军阀对四川老百姓的残暴行

为。我问侯的名字，他把一个篆字图章给我看，我至今不认识篆字，当时我假装认识。这期间有两个谷城内的人到罗家住了几天，好像是卖大烟土的人。内中一人说，红军怕什么，并指着我说，叫他负责他就敢保。

一个孝感县的裁缝姓苏，在这一带做活，他说大刀会曾派人到罗四贡家问我情况，罗四贡说人已杀了。这个姓苏的不知为什么跑到山里当裁缝，他还告诉我湖南的雷亮生牺牲的消息。那时又来了一个篾匠给罗子俊家做竹活，他吃斋，与罗的老婆是一个道门，他是哥老会分子，对我很同情，他说哥老会分子参加红军闹革命，死的不少。当侯参谋临走的那天，罗派人找到侯所住的楼上，对我说：“侯先生要到汉口，问我家在什么地方住，捎个信回家带点衣服来，衣服这样单薄走路不方便。”这是罗子俊想借我家有人来看我，在财物上作打算，我就给我外祖母写了一封信，说我有病，请人来看我，并带点礼物来，侯经过樊城时将信送到我外祖母那里。

侯离开罗家一两天的一个晚间，篾匠特意对我说：“大刀会的坛主还在要你，你要赶快走。”他一边骂着罗子俊，一边说：“他是狼，你是羊，他随时都可能吃你。”我说不知道路，请他送我一段路。篾匠说今晚不行，隔几天送。我说我今晚就走，请他把向茨河方向的路告诉我。篾匠说由罗家门前下山又上山，见路往左边走，这样就可到南漳地界。这晚半夜间，我就按着篾匠所指的方向下山又上山，往左边的路走。待到第二天早晨，在山路上的路上碰到一个赶牲口的人，我说我是捉老虎的在山上下药。我看到山下有人家，就溜雪到山下，顺着山沟往下再走，已是南漳地界，这儿离朱家沟仅八里地。冬天山间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到天快黑时，我到姓叫的人家过了一夜，次日又顺着小河往南漳县方向走，到了一个三岔口的庄子上，我看天已晚，忙走去找住处。第三日我就到了“界牌垭”，南漳、谷城两县交界处。我再向茨河方向走，天快黑时，到了茨河附近的前妻住

地王家，当时身上满身是虱子。后来我才知道，王天合的小儿子到王家讲了我在罗子俊伪队长那里的情况，让他们着人去看我，而王家舍不得财物不愿去。住了一两日不敢再住下去了。就过汉水到乔家岗王理书那里住。我每晚用灯油摸我的两脚胫，伤痕已长好，但两脚仍然麻木，就继续用些野草根熏洗（大约一九三二年春，茨河街上人传闻我自罗家脱险逃走的情况，朱八少的哥哥是粟谷庙的区长，控告罗家地主通共产党，罗子俊曾一度躲到他乡，向谷城县花了一笔钱）。在旧历年前，我到李和尚的哥哥那里，找到了李荣群（文彬）他在襄谷边境汉水沿岸活动，曾计划由茨河以东向南漳方面发展，那时李荣群正在茨河附近活动。

一九三二年春，乔家岗一个姓王的参加蕪山游击队。蕪山游击队撤退房县后，我回来恢复工作，在房、谷交界地方被民团打散，谷城县委书记李庭兰牺牲，这个姓王的被民团捉住时，自称是进山买羊子的，以嫌疑犯押送谷城监狱；因为没有钱买通监狱，后病死在牢里。三四月间，我不敢到王理书家住了，到他的一个本家去住，不久朱育文自双沟到乔家岗见到了我，他是与鄂豫边特委李明堂二人，以红军代表身份到双沟接洽张恒金投红军一事时，被五十一师包围跑出来的（张是一老匪首，被湖北省地方军阀何成浚收编，依然抢劫。五十一师范石生部要收缴张的枪支，把双沟镇包围了，张派人到枣阳找红二十六师，要投红军。要红二十六师到双沟打接应，张部向外出。因红二十六师对之内部意见不一致，迟迟未去双沟接应，双沟被五十一师打下，把张恒金带的一连人放走，枪支收缴了。清查户口时，李明堂被捕牺牲，朱跳寨墙逃出，到了乔家岗）。自蕪山失败后，朱就回襄枣游击区去了。朱在乔家岗与我住了几天，他

身上帶了三十元大洋，不久就用完了。帶光洋不方便，內部又無毛票，以元為單位地到農家送點錢，因而花完了。當時我的腳還麻木，走路不方便，這兒活動又困難，鄖陽黃龍灘趙家兄弟搞的游擊隊遠在數百里外，打聽消息也困難，我與朱商量都到游擊區去。朱也同意，我到李和尚的哥哥那兒，朱到樊城附近與王振三商量，王不同意離開這兒，說洪湖紅軍正向漢水東的天門、鍾祥，漢水西的荊、當、遠等縣發展，襄棗宜游擊區將與紅軍活動區連接起來。要把襄陽、老河口中心縣委合并組成道委會。朱一兩日就到李家把王振三的计划告訴了我，因為王振三的妻子家是地主，住樊城有接濟，朱的老婆是襄陽東津灣莊家沖人，朱可常到襄棗游擊區取得錢用，他們都不愿離開游擊區，這樣我們就同意他們的做發，與朱到牛首北的一個村莊外野地上與王振三見了面。會商組織道委會的事，決定王為書記，我和朱為委員，朱與王就向樊城附近走了。我當夜回到了李家，分手後再不知道朱育文的消息。

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者領導襄、棗、宜間的工作，在這樣不鞏固的游擊區域，要在兩條路線斗争中平分一切土地，開展反富農斗争。在“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领导下，紅二十六師于一九三一年春夏間打下過河南唐縣（偷襲）。（編者注：紅二十六師打唐縣的時間應為一九三〇年農曆十月中旬，陽曆十一月下旬）。因唐縣遠距襄、棗、宜游擊區數百里，返回游擊區時暴露了自己的兵力不大，沿途遭到民團的阻擊。同時造成南陽方面工作開展的困難。襄、棗、宜依賴洪湖和鄂、豫、皖紅軍的發展，而敵人一進攻就束手無策，遭受了失敗。這一時期，王明篡奪了中央領導權，阻止了毛主席偉大的人民战争和游擊战争理論的傳播。我在房縣時看了些文件，日後很艱難的到過中央蘇區，未在文字上見過“十六字訣”，知道“十六字訣”還是到了延安的事。我與朱育文數月未見到面。九十月間，我到老河口熊家茶館通過熊玉英打聽朱的情況。她說朱已好久未去

过，并说仙人渡一家姓高的党员，带信不让朱育文再到他家去了，因为保长知道了。她说我不能在那儿久呆，就从后门把我送走了（我和熊玉珩是同学，一九三〇年冬，熊玉珩在太平店领导农民夺取民团枪支已经到手、参加行动的是太平店附近萧家庄的农民，因要开群众大会，太平店周围的反动大刀会一见共产党人数不多，就发动大刀会众，把夺民团枪支的农民杀死了不少，熊玉珩是党员，那次牺牲）。第二日我回到乔家岗，朱育文、王振三在樊城下边张家湾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从老百姓口中传到乔家岗。显然，在鄂北革命活动已十分困难。汉水西和汉水东的游击区不会进行游击战争，缺乏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方针，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这一角的土地革命斗争未能很好地开展。劳动人民的翻身要求暂时受了挫折。由于盲动主义，南漳东南乡和襄阳西南尹家集的暴动失败了，参加领导的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党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很坚决。襄阳尹家集的暴动领导人是绅士的儿子、师范学生曾孟涛，领导农民杀其直系亲戚龙家、王家大地主。茨河的盲目暴动失败后，群众核心分子有的牺牲，有的逃离家乡，工作就未恢复。太平店夺取民团枪支的失败，薛斌、李自修率领数百土匪抢劫仙人渡撤到某村庄时，被地主率领的乡团围攻受歼（薛、李当土匪后，表示愿改编红军受党的领导，一般群众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这都影响了鄂北地区群众的革命情绪。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已放弃了学生运动与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由于“左”倾关门主义，几乎失掉了所有社会联系。所以我准备到鄂、豫、皖苏区去，我知道鄂豫边省委有代表宋良猷在那里，红三军方面也有很多熟人，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我就经光化、邓县到南阳，从南阳到洛河乘“荒车”到信阳。在信阳基督教堂武英牧师那里，我知道了白生俊在新二十师并和他

取得了联系。又得知鄂豫皖红军已撤退，经枣阳、南阳、老河口之间往西上了，这样我就到信阳中山铺胡家，因傅伯绩在那里教私塾，到鄂、豫、皖的打算原来是准备到傅伯绩那里设法进去。傅伯绩教私塾的收入有限，还要寄钱回家养活家口，不能久住。过了些日子，我又到信阳信义会基督教圣经学校李必炽那里去住，后接到白生俊回信，说他无力接济生活费，因该国民党部队没有饷，只有饭吃，叫我到他那里做客，可以吃饭。这样我就到光山白生俊那里，该部团部服务员是额外编制。不久由光山开到周口。过旧历年时，孙锡（启）类、赵雨时也到周口找韩采芹（韩化龙），他们是襄枣宜游击区失败后流亡到这里来的。听他们说鄂豫边特委在敌人“清乡”后不顾主客观条件，又组织了苏区代表团恢复工作，被国民党包围，特委委员、年青的曹鸣九（陕西人）不幸牺牲了。过年后，一九三三年春，白生俊介绍我到连上当帮写，该部队开到信阳有二、三月的样子把我辞退了，我到许昌孔家胡同××号养病。这时韩采芹（韩化龙）当了连长，对革命还有留恋心情。一次赵、孙和我在一起，韩说两次都失败，将来我还要回去打游击，这样我们就谈到设法争取这个连上的士兵问题，我立即写信到乔家岗，让党员王统祸来当兵，他们共来了三人。暑假期间韩采芹（韩化龙）介绍我到回教商人曹翰臣家给两个小孩补习功课。秋后曹介绍我到回教小学教书，月薪二十元。曹翰臣的叔伯弟弟大革命前夕在北京住无线电学校，与韩采芹（韩化龙）的弟弟韩直卿同学。韩采芹（韩化龙）当连长时，有他的表弟梁尊友、张寿元来做客。不久，王步岳、马××二人准备到孙殿英部做事（孙的南京办事处主任张克让，襄阳人，党员，我也认识），另外又来了个姓胡的。不久韩采芹（韩化

龙)的连长职务调动了,作上尉营副,该部队一个团哗变,拖到像皖边境当土匪去了。接着新二十师调开封。

这年暑假期间,得知鄂、豫边省委在南阳被敌人破坏,宋良猷、郝九(久)亭等被捕。开学时要到回教小学教书,王步岳等都知道,因许昌与襄阳不远,恐遭意外,我就决计辞去,说要回家,就又到孔家胡同去住。写信给第五小学李文涛,叫他打听傅伯绩的下落,后来李回信说傅伯绩在武昌乡下教书,我若去可以住。知道傅有家庭负担,去后也困难,我就到郑州太康路韩家宾木匠那里,韩木匠生活还可维持。在这期间,我还到郑州电报局找过夏正午,他是我中学很要好的同学,想借助一点生活费,到北京去找党,不巧那一天正是夏正午调到汉口电报局动身走的日子,自然未便谈。虽然我已知道马适安在北京被捕的消息,找党困难。在许昌时,还与孙、赵二人谈到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在大革命时,曾听过张国焘一次讲话,他吹陈独秀,并无动人听闻的内容,当然我不知道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知道他的老婆杨子烈是枣阳人,北师大学生,他俩都是共产党,在鄂北流传甚广。由于粗浅的印象对张国焘不佳,不愿前往。又不愿到孙殿英部混事吃饭,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得知新二十师改编为第二纵队,将开往江西,我想随这个部队到江西乘机进江西根据地。我把这一意见告诉了孙、赵二人,他们也同意。我知道一个陌生人到苏区是要经过种种困难的,但我把它置之度外。这一想法我也告诉了韩采芹(韩化龙),他就介绍我到伪二纵队六团当文书。到开封有两三个星期的样子,该部队由开封经京汉路到汉口乘轮船到九江,转南昌休整后步行到吉水,在城外一个破庙里住下了。当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我准备到福建转入根据地,但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垮了,所以未能前去。伪二纵队系国民党匪部河南杂牌地方队伍,担负进攻红军、碉堡线驻守任务,在吉水县的一条河流以南,从这里到苏区当时有困难。因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部队，还有孙、韩、生俊及王全芳诸人，我不能一个人不言而走，没有一定把握，如果进不成苏区还会影响上述等人的安全。所以不能不作慎重考虑，而且必须与孙、赵诸人商量。已是一九三四年二月间了，我与韩采芹（韩化龙）、赵雨时交换了意见，就机请假离开，我到新成立的该纵队担架排长刘余三那里，开始在吉水城内一个米铺里住了些日子，后到该排所住的一个庙上，不久队伍就向富田方向移动，我坐民船到吉安沿赣江上数十里下船。船上有些药品，担架排号有几个士兵押送。后起船随刘余三等到了富田，不几天刘余三跟从部队向他处移住，我就住富田未走。韩采芹（韩化龙）的营部住富田堡线内，富田以外就是苏区。白匪部队到富田驻守不多日，红军有一次在富田外不远的地方构筑阵地，准备要攻打富田的样子。这时天下雨，小河水涨，我同赵雨时谈到如何进苏区的事，他说：“要是我就抱着一根竹竿顺水流去。”我看沿小河北面是该白军的堡线，而水的流向又靠近碉堡线，很容易被白军哨兵发现。我想还是从韩采芹（韩化龙）所在营班守的碉堡线，通过王全芳排长、李明友副班长的岗哨点出去比较安全。我把要想到苏区的打算向韩采芹（韩化龙）谈了，他开始很同意，并且谈到要写信告诉住在北京的姚启新，也从这儿到苏区去（姚是南阳唐县人，与孙锡（启）类同干过革命工作）。不数日韩采芹（韩化龙）来到我住处说，该团有便衣队在富田外边，如果出富田进苏区时被扣回来，那我们（指孙、赵、刘等）都不得了。劝我不要去了。并说由他们接济经费让我到北平去看看书。我说，哪里就会凑巧碰着敌人的便衣队，我还是执意进苏区找党。这时他说：“你要去我不阻拦你，只是你坚持这样以后就不要再见我了。”我就与孙锡（启）类、李明友商妥，决定由李明友带我走出碉堡。

先让李明友到富田外一个村子上找一个落脚点（当时还想到，如果我到苏区后，红军要是来打富田，可以从李明友这个碉堡带进来一些红军便衣，李明友这个班也可以做内应，里应外攻可以解决这个团）。孙锡（启）类把敌人的两周口令告诉了我。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样子，由李明友带我经过韩采芹（韩化龙）的营部门口，看见孙锡（启）类点头微笑了一下，我装着到村上去玩，到了一家老百姓家，李明友又跑到其他老乡们家去玩。天快黑了，李明友来到这家看了我一下，就回碉堡内去了。天黑了，我就离开这个村庄向西南山边走，离开村子一二里，我就在稻田里稻草上躺下睡，天还未大亮，我就向山边走。到小山脚下，红军游击队战士发现了，他们走到我跟前时，我说明来意后，就被带到部队。吃过早饭把我送到分区司令部。次日，两个红军战士送我到一个高山顶上，在房内会见了省主席曾山同志，他向我作了政治工作后，又继续走，大约次日快黑时，到了江西军区司令部。晚饭后，陈毅司令员来向我问了些情况。问我这里认识什么人，我说认识陈毅司令员，他说这里有没有这个人，我说你就是，他笑着点头，给了慰勉的话。后又往兵站线走了好几天到了瑞金，住总兵站招待所。一天贾托夫到红军大学约我谈话，他知道河南及鄂豫边工作情况，他谈到了宁都暴动过来的五军团是以其中少数党员为骨干，而这些党员多是襄阳的学生，问我是否认识襄阳城内一个姓罗的（父亲做过县长）等。他让我返回白军二纵队六团搞暴动，我就谈了和韩采芹（韩化龙）诸人的情况，并说若果有红军去围攻，就可以里应外合，把这个团消灭。我本人要求到苏区工作，后来贾也同意。决定让我送派到该白军六团的一个河南叶县人伊××（是五军团暴动过的）到富田附近接上头后，我仍返回瑞金。这时，我才知道毛定方、左觉农、

黄火青在中央苏区工作。我由总兵站到总政治部附近招待所住了几天，一天在外边碰到毛定方、左觉农，他们已知道我到了瑞金。临离总政的先一日，贾托夫找我与那位伊××同志相见。是日晚上，也是与贾托夫相见时在座的一位同志，南方人，邀我便谈，才知道这人原在红三军，到过房县，不知何时到的中央苏区。由于我到过房县，接近过红三军的关系，所以虽不相识，谈话还比较亲切，可当时我也未问他的姓名。次日与那位姓伊的同志，经兵站离开瑞金。待到富田附近的分区司令部时，该白军六团已离开富田，住不久，大约由于军事情况紧急，就叫我离开这里，与分区政委、政治部主任等数人返回江西军区司令部。住不久，告诉我瑞金不能去，叫我就到这里分配工作。分配我到政治部的破坏部当干事。过组织生活由政治部主任黄与我谈话，此时陈毅司令员已调走了。我曾同司令部侦察队便衣出发数次，抓住白军俘虏时帮助询问情况。也曾帮助写告白军士兵书草稿等。敌人在紧缩包围圈，而当时“左”倾路线提出敌人愈前进，后方愈空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殊不知江西是敌人围攻红军的最重要的基地，并不是一般的所谓后方。当时流传着红军部队要到东固一带去活动，说东固的条件好，在新年过后部队就向西移动，一次过封锁线未成，队伍分散后就未见曾山政委和陈司令员了。政治部主任李、黄腿上负了伤，行动不方便，离了部队。白日隐藏在山上树林里，晚上行军，跑得很快。队伍有的失掉了建制。后来由一位团长集合了一二百人半夜冲过了一道封锁线，天快明了，我与几个五军团伤残的同志走到一块，到一个浅山上掩藏……后来碰着一个白军排长姓宋，（是鲍岗的队伍方振武部下，被收编为独立旅，在龙岗到石头坑驻守）被扣住，留在该部当兵……

（鲍岗是安徽人，连上士兵安徽人最多）。三四月间，一次到龙岗，听鲍岗讲话，在龙岗街上看见了孙锡（启）类那个营的留守处，在石头坑汽车路上看见伪第二纵队

汽车往返龙岗，知道伪第二纵队离龙岗不远。白军宋排长问我土匪杨三盛，我说知道，杨三盛有一二千人曾在枣阳一带打劫，大约他在杨三盛土匪那里干过。自我在龙岗街上看见孙锡（启）类那个营的留守处就打算趁机逃走。有一天我见厨房一间破屋墙倒了，就从那儿上山，逃出了鲍岗部。到了孙锡（启）类的营留守处，我说是自家里来的，被部队扣留当兵，我让留守兵给我带了伪二纵队符号，就请那个留守的兵送我出岗哨，该人告诉我伪二纵队住在龙西面的山内，我就往那个方向走，半路上碰见了韩采芹（韩化龙），他要往河南洛河带新兵，叫我到离那不远的刘余三排长那里暂住，他准备到洛河后为我找一个小学教员当，约月把样子，我又住白生俊连上，后该白军部队由龙岗移到东北住弋阳、贵溪等县铁路线上，后开到河口镇，我住该连留守处，又到江山县仍住留守处。这中间韩采芹（韩化龙）自河南洛河写信给我说，在洛河为我谋了个小学教员。我与赵雨时等人商量，洛河离襄阳不远，不便去当教员，就未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我到郑州太康路韩木匠家里，韩木匠生活也困难，在一个星期日，我与韩家宾一道到郑州的基督教信义会万捷三牧师那里，说我是李珩自的亲戚来看他，当时想找他谋事，由于初见面未便谈，“一二·九”时我在郑州，学生游行时，有教员模样的人手持喇叭筒，时时喊叫不要闲人插入队伍，显系反动的学校当局，想阻拦学生与市民接触，当时有豫西洛阳地带的青年木工失业，找不到活做，晚上睡在韩家，由于韩家生活无着，我自己由赵雨时供给的钱也有限，与韩家共同生活下去有困难，这样我又回到江山留守地方。旧历年后该留守队又移到上饶，开初我在上饶一家饭铺住了一些日子，后来找到一家姓高的老百姓家住，赵等曾说让我到北京或上海去住，看看书，生活上由他们接济。这样无目的地住在那儿看书不是事也不忍心，因为他们

都过的是奴隶样的生活，我若是能找到党，他们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参加革命……（原稿到此完）

四、《高如松年谱》

高如松年谱

1905年5月5日，高如松出生于湖北谷城茨河高家垭子。

1908年春，高如松3岁，父亲病逝，其与姊妹三人与母亲章氏一起回到太平店龙港娘家生活，靠外公哺养。

1915年，高如松10岁，母亲章氏患病离世。时姐姐随伯父生活，高如松随外祖母和姨母章哲卿（在襄樊城内一小学任教）生活。

1920年，高如松年15岁。经人介绍，娶茨河黄家湾王达三之女王玉娥为妻。

1923年，高如松考入襄樊鸿文中学。5月，借襄樊各学堂举旗纪念“国耻日”之机，高如松和董振一起，带领鸿文中学学生，来到街上，挨户查抄各种日本货物，限期卖完，不准再进，迫使外货降价销售，给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以有力打击。

1924年初，董曦轡的学生孟宪章携萧楚女来到鸿文中学。在董曦轡的引荐下，高如松与萧楚女晤面。

1924年冬，鸿文中学“读书会”渐成气势。高如松常与董振发起声援会和查账活动。为此，校方宣布将高如松、董振及校监董曦轡一并辞退。

1925年春，高如松与董振等来到襄阳十中，在此又接触姚昭德、孙孝承、宋良猷等进步学生。5月18日，萧楚女从上海来信，鼓动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斗争。高如松、董振、李金铭受到鼓舞，引导襄樊学生运动正式转向反帝国主义之革命斗争。

6月18日，高如松和董振带领国货维持会会员在襄樊商业区上街演讲，坚决抵制英货和日货。

1925年7月，在谢远定介绍下，高如松与方复生、宋良猷等第一批加入共青团；10月，高如松在谢远定介绍下，光荣地成为谢远定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1925年11月，经上级批准成立中共襄阳党团特支。谢远定任特支书记，高如松任委员；

1926年2月，高如松接替谢远定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后对襄阳党团特支进行改组，成立了襄阳党团特支干事会。

3月，高如松率学生骨干上街游行，因遭伪警察阻拦被打伤，后避于檀溪舅父章大河家数日，方摆脱伪警察追捕。

5月，襄阳党团特支实行分立，成立中共襄阳特别支部委员会，李实、马适安先后任书记。从此，高如松由领导襄樊学生运动正式转变到领导鄂北革命运动上来。

1926年8月，中共襄阳县委成立，高如松任襄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农民协会负责人；

1926年底，高如松与枣阳人余益庵，襄阳人李金铭与宜城人胡培洲等陆续到谷城参加谢远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筹建雍山农民协会事宜。

1927年3月初，传闻蒋介石有叛变动向，高如松与李金铭等召开秘密会议，由农民群众公选一位野战团团团长，以应付动荡时局。此举甚得各协会会长之拥护。5日，高如松来到盛家东首大场上，召集三千余农会会员，按举手方式，选举李晓葛为野战团团团长。

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襄阳驻军张联升于5月20日亦公开易帜，以10万大洋悬赏高如松人头。高如松回到妻子娘家黄家冲躲藏；其间曾到宜城王家集，受到农会负责人王全芝等全力保护；因当地劣绅胡子清为首的反动武装亦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高如松不得已辗转来到武昌，与襄阳的董紫绶和枣阳的李金铭相遇，因董紫绶与武汉农民运

动讲习所有联系，高如松便被介绍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儿，他见到了在讲习所任教的毛泽东、恽代英、方志敏、夏明翰以及在独立师的陈毅同志，并受到他们的亲切教诲。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并在武汉地区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在此紧要关头，高如松受党的派遣，于1927年8月初与李金铭一道从武昌回到襄阳，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时同学马适安被任命襄阳县委书记，马派遣高如松到襄谷交界处任特区书记。

同年9月，高如松与老河口共产党员熊玉珩、薛家集共产党员孙碌、褚玉恒等到襄北薛家集组建中共薛家集特别支部委员会，指派孙碌为特支书记，李自修、薛斌为委员；月底，与党员兰伯达到太平、茨河，着手开展农运工作。

10月，高如松被任命为谷城县委书记，决定进一步发挥“大刀会”“红枪会”作用，发动群众力量，组织农军正式开展以武装为主要性质的群众斗争。

年底，谷城籍黄埔生李绍棠（李亚声）从江西朱德部回到鄂北，任县委书记，高如松任县委常委；

1928年春，高如松组织李麟等负责人与当地伪政府开展了抗禁春戏的斗争。

4月10日，高如松领导和参与了盛家塆暴动，率领农军捣毁了盛家塆的国民党公安局和屠宰、烟酒局，并缴获了一批物资，烧毁了公文簿册。

192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二），高如松宣布正式成立茨河农民协会，并由农民协会牵头举行茨河暴动。

同年5月14日，高如松与李绍棠秘密召集李晓葛、李麟、李庚尧等领导人和全县党员骨干到盛家塆附近一山沟里部署抵抗伪军之办法，着重部署攻打石花行动计划。

1928年5月18日晚，在高如松统一指挥下，李麟统率农民自卫军及各大队参战群众近2万人，手持刀矛、

棍棒等武器，星夜赶到石花，分别埋伏城外指定地点。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赶走敌人，占领了石花镇。此次战斗打死打伤俘虏敌人 300 多人，敌团长彭国玺被当场击毙。此外，缴获钢炮 3 门，长短枪 200 多支，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衣物等。我方仅伤亡 20 余人。

5 月底，为慎重起见，高如松向鄂北特委汇报谷城暴动准备工作，并请示加派领导力量。6 月初，鄂北特委为加强谷城暴动领导力量，特派工农革命军湖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李实到谷城任县委书记。

1928 年 6 月 16 日，农民革命赤卫队和大刀会众共 2 万多人组成农民暴动军，在县总指挥部指挥下，从城南中码头和城西过山口，城北后湖 3 处攻城。战斗持续到 6 月 21 日，暴动军围城 5 日 5 夜，县城未能攻破，敌我双方互有伤亡，暴动队伍暂时撤出。

7 月 26 日，高如松率领农民暴动军 2 万多人实施了第二次攻城。至 8 月 3 日，农民暴动军围城达整整 50 天，由于敌人援军三面夹攻，最终惨遭失败。

1928 年 8 月 24 日，高如松与李实一起率农民暴动军第三次攻城。此次攻城，农民军逮捕了与官府勾结的神甫尼诺，捣毁了劣绅胡国保、熊梦卜的住宅，吓得反动县长王信征仓皇逃走。接着又烧了城门楼，将城墙拆去大半，并将公文簿册收缴一空，投入大火之中，最后连县衙亦烧之。农民军还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暴动的成功，显示了谷城人民向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进行猛烈尖锐斗争的力量，扩大了党和革命武装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不久，谷城县农民暴动队伍及其领导人即遭到国民党“清乡军”的疯狂报复。高如松被迫转移到襄樊李济武牧师家中避难。

1928 年冬末，高如松悄悄来到武汉码头，乘着飞虎轮船，经过三四天的航行，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1929 年夏末，高如松几经辗转，来到南京。与李实、毛定方谋面，继续寻找党组织。

1930年3月，中央派湖北省执委聂洪钧来到鄂北，重新组建鄂北特委，李金铭任宣传部长，傅良驹任组织部长，李金铭和宋良猷等写信催高如松尽早回鄂北工作。

同年初夏，湖北省委在上海召开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李金铭、朱佑文代表鄂北出席，李被选为省委委员，又写信到南京要高如松与他们一道回鄂北工作。10天后，高如松回到谷城，接任谷城县委书记。

5月初，高如松按照特委的指示巡视均房，并任均房军委会主任，其间，与纪大纲、李民权联系，秘密组建农民武装，拟伺机暴动。

5月底，高如松从均房回。先与姜步赢取得联系，说服姜把新发展的游击队与傅春泉的游击队合并，组成一支红军游击队。

6月，高如松来到太平店，与肖元凯等一起策划了太平店暴动事宜。

7月上旬，高如松与傅春泉密商，带领杜贵年、陈志全、彭国清等5名游击队员，乘夜晚袭击了粟谷联保处，缴获长枪8支，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12月，中共襄阳县苏维埃党代表李庭兰被派到谷城开展地下工作，高如松与他一起确立了开辟和建立薤山游击根据地目标，并与李陶庵在薤山脚下秘密发展游击队。至1931年初，队员发展到30多人。

1931年3月，高如松任谷城中心县委书记，决定把当铺、三官庙、庙滩三支游击队拉上薤山，合并成一支70多人、30多条枪的游击队。

6月，鄂北特委任命李庭兰为谷城县委书记。高如松和李庭兰来到温坪开展农运工作，并与红三军留下的联络员龚春林取得联系，成立了薤山红军游击总队，龚春林任参谋长。

1931年9月底，高如松受特委指示回均房工作。

10月上旬，龚春林被处事件后，高如松即与李庭兰分头下山组织群众，高如松由盛家墩黄土河一带活动。

中旬，高如松掩护李庭兰率领游击队主力退到房县后，自己率领的最后一支游击队在与敌激战中被打散。时余希珍部联合谷城十大中队在薤山上下路口严密设防，到处可见“清乡”队伍。高如松来到山脚下一姓陈的一个悬岩石洞里隐蔽。后到房县寻找红军时，行至粟谷庙被守卡的大刀会发现带到粟谷庙里，被打伤，几天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夜中逃离脱险。

1932年春，高如松在乔家岗养伤。

4月间，高如松与朱佑文、王振三在牛首镇北的一个村庄外野地与王振三见面，会商组织成立襄阳道委会之事。决定王振三为书记，高如松和朱佑文为委员。

1932年11月到12月间，高如松踏上北上的路途，从光化出发，经邓县到南阳，又从南阳到洛河乘“荒车”到信阳，与白生俊、韩采芹（韩化龙）取得联系，准备通过他们寻找党组织。

1933年10月，高如松趁国民党新二十师改编为第二纵队开往江西之机，混入部队到江西，乘机进入江西根据地，在省主席曾山的引荐下，他见到了陈毅司令员，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高如松半路中遭到敌人冲击，与部队分散，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5年11月，高如松经多方打听，均未找到组织，来到郑州太康路韩木匠处暂避。

1936年春，高如松病倒，直到1937年夏痊愈。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高如松接到在武汉活动的李荣群（文彬）来信，遂赶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幸运地见到了董必武同志。经董老推荐，前往延安抗大学习。

1937年8月，高如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1938年调整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事。

1942年，高如松参加了延安党的整风运动。

1945年春，高如松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冬，高如松被派到热河林西县任县委书记。

1946年，任热河赤峰市委书记及南穆陵县县长等职。

1947年，调嫩江省任省委民运部部长。

1948年，任嫩江省委研究室主任。

1949年5月，高如松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从东北调回襄阳，任新中国成立后初建的中共襄阳地委副书记，同年7月任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

7月，高如松领导各县进行剿匪反霸斗争，在襄阳抓住了惯匪头子方水娃；在南漳，发现多年惯匪杨清斋竟混进李庙乡当上了乡长，清理时正准备组织暴动，被高如松捕获，执行了枪决。

1950年夏，湖北省委调高如松到武汉工作，先后任武汉市企业党委书记、硚口区党委书记等职。

1952年，高如松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一机部机车制造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国家基建局副局长、化工部财务司司长、专家司司长、中科院副院长等职。

1961年5月30至6月6日，高如松应襄阳地委邀请从北京回来与宋良猷、余益庵一起座谈鄂北1925年至1932年革命斗争情况。

1969年，高如松下放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其间因农药中毒，引起肺气肿，且日渐严重。

1972年，高如松开始撰写《我的一段经历》。

1974年5月17日，《我的一段经历》书稿尚未结尾，高如松便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同年，其骨灰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对父亲高如松的回忆片断

对父亲高如松的回忆片断

高军

一

听父亲讲，我们高家是从山东搬过来的，与河北景县同源。听说景县姓高的就是从山东搬过去的。我们的家谱是士德如恒正，仁新世照昌。安怀开国义，子路定家邦（我只知道二十代）。爷爷名德贡，膝下二女一子。大女名字失传，只知后来嫁于襄阳泥嘴黄埔二期学生胡子寿为妻，二女高如林，后嫁南漳武安镇卫姓。我家是中农，爷爷三个孩子，两个姑姑家我都未去过。也未见过面。都不认我们，怕牵连他们。大姑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我家来过，我见过一面。名字改为叫胡子奇，住泥嘴胡家巷子，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没有从过政，是教书的，他引了一个女孩，未见过面不知去向。他们家是地主，1949年他们找我父亲，我父亲未见他们。大姑脾气坏，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听别人讲，1957年反右胡去了襄北农场，我请了不少人查他的情况都未查到。我1973年到两个农场查53年的反革命案子，有个叫朱吕明的屈了几十年还是还了清白。还有两个反革命头目，一个叫陈富财，一个叫何重庆，都是太平中学的学生。当时湖北省的公安厅长姓韩，将二人定为终身监禁。我只听人讲过姑父的大哥是伪团长，襄阳解放时被镇压了。姑父的名字后面一字到底是奇还是寿我记不准，因为没有查到他的资料。我问了他的学生，说叫胡子寿。



新中国成立后高军一家与母亲王玉娥在一起



高如松大女儿高明

父亲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姐姐叫高如林，武汉硚口区志写的清楚。再一个就是父亲调到武汉后的任职问题，严华山写的资料高如松调武汉后是硚口书记，硚口区志书中也是书记。可谷城县第一本组织史上不是这样写的。对大革命时期谷城县委的领导只写了各个方面主席的名字，其他委员没有写上；茨河农会主席王达三写成了刘跃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记得父亲说过，茨河农民起义就是在王达三家开的会决定的。

我爷爷的名字高德贡。我的原名高万斌，是外公王达三起的。他说干革命家里没有兵不行，必须有要很多兵才能胜利。所以我的名字取为高万斌，二姐叫高万青。一九四九年六月份父亲给二姐改名高志，改我高军。大姐叫高明，因家里经济困难十四岁结婚，父亲在家里时就喜爱她，经常抱她，时常多次让她骑在自己的肩颈上。“文化大革命”中还给他寄过一百元钱。当地群众都知道的。有的老年人对大姐讲你爸爸还没有忘记你们全家，还给你们寄钱来，你们太幸福了。有这样的爸爸真了不起呀！！



高军 1959 年与母亲、二姐高志合影

太爷辈三兄弟，大的叫高士龙，清朝从政经商，在湖南。去世后运回老家安葬，没有后人了。老二高士府，老三高士良，父亲高如松是他们的孙子辈。老辈子们没有分过家，住在一起，是三进的房子，几百人住在一起。房子坐西面东，左右两口水井。右边的填了，水是甜的，花园里有一棵冬青树，九十多岁的高荣昌小时候爬上爬下玩过，谷城快要解放那年时又重新发芽。从远处看，就像一匹大马，马上骑了个了不起的人。这棵树现在还在。很多游客在树上留影，表示到过如松家乡。村子原名叫高家埡子，新中国成立后叫洪山大队，现在叫白龙庙村。因村子西南有座白龙庙，水绕白龙庙转一圈入汉水，故名。这里新中国成立前是一条下河（汉水）的山货码头，船只很多，据传湖南船队从此过必放鞭炮。再往下不远处就是白马洞，离高家老屋比较近。

二

关于外公王达三一家人的情况：王达三因茨河农民起义，被抄家三次。全家人逃避在外乡不能回家生存，为求全家生存，二舅王通书被迫接受了当地伪政府的委任，当了保长，才得以安身。

外公家里没有钱，无力支援我父亲革命，只有少量物资支援。我们能长时间住二舅王通书家，是外婆在病危中把五个儿子叫到床前说：玉娥的男人不在家，又没有房子住，你们只当我多生了个儿子的，不要赶他们母子走，让他们母子长期住下去，要等如松回家来了再让他们母子离开你们。五个儿子都表态同意了，外婆才闭眼而去。王通书当保长对我们家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以前母亲带我们到处躲藏，在狮子岸三舅家躲过，在太平店乔岗王理书家躲藏过，乔岗王家是大姓，人多外姓少。再加上王作宾由党组织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区长（**王作宾参加过共产党**）。一九四九年王作宾找过我父亲，我父亲让他上东北去，作宾因离不开自己的家未去，后来，李实和另外一位同志三次到作宾家做工作（作宾妻子徐英美可以证实此事），叫他离开襄樊，作宾还是那句话，说他走了他老婆带着孩子不好办，因为为孩子们都小，后来土改时被镇压了。



王达三的二儿子王通书，
茨河暴动失败后，为保全家性命，被迫当上了伪保长



吴集杨家

药铺杨氏外甥

女刘永清

(左) 与高军

老人合影

王通书自己有八亩多田地，在黄家冲。靠田边上的东面有一条弯曲的流水小湾，常年流水不断，特别是夏天水比较大小沟里有小鱼，我亲自抓过。在门前只隔一条四五宽的小路下边，就是一片三四亩大的竹园。竹子长的有碗粗，家里用的筷子都是用竹子自己作的。据传这里出现过竹人竹马。具体时间不详，有人告到京城，说这里有青烟升天，京城便派人把竹子砍了，在砍时见到了有的竹人骑上竹马，多数人还未骑上竹马。在东面有一个圈椅形的山坡旱地，靠下边的小路边有棵大榆树，长得高大枝叶茂盛，有十来丈高，像一个大雨伞一样，说有一个仙姐常在树上住，当时烧香纸的人不少，本县外县都有人去烧过香表纸。我与侄女小名王春花为客人服过务。在树的旁边用砖和石头砌个小灶，用小锅烧点热水，让来客洗个脸洗个手再上香烧表纸。客人给一二分钱，有时间一天收入三四角钱都感到高兴。后来茨河区政府不让群众烧香纸，把树砍了。

王通书另外租了八亩水田在下磨石，是乔岗后岗王世珍的水田。在土地改革时因八亩水田划成了两家地主。新中国成立后乔岗划归襄阳县管。王通书虽然当过保长，不少的老人都知道他是被迫当保长。再加上他在当保长时没有做过恶事，在土改时只关了几天就放了。王通书自己讲没有人打过他。干部对他讲：“土改工作队来了你把绳子拴上，走了就取下。”土改后一九五〇年我们迁移乔岗前岗五舅王彩书家居住。我与姐姐高志的生活费用由襄阳县民政局每月给十四元供上学读书，土改时由茨河区政府送了红军家属锦旗，是尚区长送来的。

三

父亲 1931 年 3 月任谷城中心县委书记，因红三军北上正向均县、房县转移，朱佑文便介绍父亲高如松到均房游击区巡视工作。父亲在均房见到了原二十六师师长张香山，当时张是均房红军游击纵队队长，父亲跟他共过事，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父亲回来后，谷城与老河口合并为一个中心县委，朱为书记，父亲为委员，仍在薤山、庙滩一带活动。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父亲去延安时是带着董必武写的介绍信去的。没有路费，是内弟王理书筹的。王把他安排到野外一瓜棚与看瓜人黑三爷住下，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直到 7 月才筹够买一头毛驴的钱。这样，王理书才安排一个名叫万正江的同志牵着毛驴，护送父亲高如松向千里之外的延安进发。这个细节也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茨河农民起义是在王达三家里开的会决定的，我有谷城党组织史第一卷，开始调查人严华山和后来的易成军都对我讲过，文字资料，录音录像带都还在，这个细节我特意奉上。



章大河的女儿章俊英

1949 年的照片

四

父亲讲，他闹革命时经历了无数次风险。1926年3月间，他率学生骨干上街游行，遭到伪警察阻拦被打伤，他瘸着腿跑到檀溪舅父章大河家，由于是半夜，不敢喊，便躲在舅父家门前劳师草堆里。直到第二天早上舅父起来拿稻草才发现浑身是血的外甥高如松，把他扶进屋里躲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到舅爷章大河家，其女儿章俊英（我喊姑姑）也谈到此事。

父亲说：那时间他回家总在晚上，白天从不敢露面。虽然后来舅舅王通书被迫当了保长，但茨河伪政府仍经常派人到王家暗查抓捕他。父亲还说，王通书接受当伪保长，完全是为了全家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间父亲闹革命，就是这样隐蔽地发动着农民运动。父亲还谈到有一天晚上，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是本村一个叫陈发兴的用渔船送他到汉水对岸脱的险。陈发兴后来到泥嘴当了上门女婿，改名郭洪昌。“文革”时曾到我工作的单位三道河管理局找我，说我父亲高如松当年被他送过河后，白天由他送饭，晚上则送他住白马洞，一个麻袋下边铺一床席片，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被人发觉了，把麻袋和席子拿走了，父亲便离开了白马洞。1984年我看了父亲的回忆录确实有这回事儿。郭洪昌1970年多次到我家吃住，走时我给他买车票，那时我的工资才二十多元，爱人李冬芝的工资24元（临工工资），那时全家七口人生活多难啊！我三弟高天亮在广州上电子大学，我每月还要给他寄10斤全国通用粮票，我的定量每月27斤。我经常买红薯吃，节省点全国通用粮票寄给弟弟天亮。在年关时他请学友给孩子们带过白兔盒糖果。因天亮“文革”中在襄阳伙牌投亲靠友参加生产劳动，1972年考学，托襄阳南街的张金保找王耀书记解决了一个指标才走。那是1972年，我接天亮到三道河我家住了三天才到广州上学，多难呀！



从左至右为高江红、刘永清、主高军、刘永忠、刘永杰、刘永雄、杨红卫、张书、魏建合影留念

1984年我调到襄樊来，郭洪昌还经常来我家玩，直到80多岁去世，那时我的工资42元，李冬芝的工资35元。我的经济困难得没法说啊！



郭洪昌（右一）晚年的照片

母亲王玉娥是一个坚强的女子，靠自己的智慧双手积累资金供全家穿衣服。王玉娥在农闲时纺线织土布，土布拿到茨河街上卖点钱慢慢地积累。同时，王玉娥还是一个民间医生，她认识山上的药草，会挖药草治妇女病，月经不调，不生小孩的女同志的病都会治，最多三副草药就治好了。治好的女同志们都感谢她，有的送鸡蛋，有的送米，还有送猪肉的，特别是生男宝宝的，还送老母鸡感谢，也有送少量钱的。鸡蛋有时吃不完拿到街上卖，把钱都积累起来。当地的人十来里左右都称王玉娥为高大姐。



有天中午，母亲没回家，我与二姐找她时，她竟坐山凹处的路边上号啕大哭。我问她为啥哭？她说想到自己的生活太艰难……还有一次，母亲因一件小事与二舅吵嘴，她想到自己的生活艰难，她忍不住在夜间哭了。哭声把我们惊醒，我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余益庵，枣阳余家畈人。1927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

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余益庵前辈讲过男人在外边跟敌人打仗，女人在家冒着杀头的危险，事实真是那样的艰险呀！！

茨河农民起义后，父亲回家都在晚上天快黑了日头落山的时间，一米以内才能看清人脸时，才从西边伙房的后门进屋。要是早了就躲在住房的周围树林里，一直等到日落西山才能进屋，怕外人看到有生命危险。茨河街伪政府有个内部奖赏，谁能抓住高如松奖励10万元大洋。因此父亲特别小心。有一次到泥嘴（现在的卧龙）我姑姑家，父亲天黑了才进屋，他问姑姑我住一晚上没有危险吧？可以吗？姑姑当时阴阳怪气地讲：那……哪个晓得呢！他听了这话，二话没有说，就从后门走了。这正是下雪天，父亲连夜踏冰雪向家里赶，回到家里时双脚都被冰块磨破了。他在家住了一段时间，不能久住，便拐着脚到乔岗王理书家，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闹革命的……王理书是医生，给治疗了一段时间，但为了寻找组织，父亲不得不离开。离开王理书家时脚还未全好，革命实在太难了。

父亲每次回家身上穿的衣服全破烂了，有时脚穿破布鞋，有时穿草鞋，头发，胡子长的很长，外人都很难认出他。身上长了许多虱子，母亲用布剪子给他理头发。他不敢出门，实在住闷了就由母亲陪他等天黑定了从后门到山上树林里谈些心里话，父亲叫她坚强下去带好孩子，保护好自己。革命快胜利了，二人口头协定，谁个要变了心就被雷打死，每次离家时二人泪水满脸。每次

回家走时都穿的新衣，母亲把积累的钱交父亲带走，有时舅舅们也支援点盘缠钱。

父亲后来到了外地寻找党组织很少回来，母亲带着几个姐姐便住在二舅王通书家东边一个偏房子里。房子很小，只能靠墙顺着放一张床，床面前只能走一个人。门前一个台阶五步下去便是伙房，门口有一个鸡笼，养了五六只鸡，过年二舅们杀猪给五六斤肉，肥肉炼油，我母亲与姐姐们都不吃肥肉，平时主食靠高家老屋八亩靠天收的旱田地收入生活，由二舅帮助办粮的事。不足部分由二舅补贴。母亲一米七八的个头，不仅会医治妇科病，还会纺线，织粗白布。布织好浆线后，拿到街上去买多半是上等价。这样积累着钱用于父亲衣食住行和路费。

当时外公王达三家境也十分不好过，先后被抄三次。他为了支援父亲高如松革命，开了砖瓦厂、造纸厂，父亲躲避后，这些财产都被抢光了。最后一次伪政府把外婆抓到谷城县关押，准备枪毙，幸亏当时外婆娘家人陈世谷在县城有面子，才保了一条命。后来，二舅王通书被迫请人说和当了伪保长，这才安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外公家分了四亩水田在下磨石，由于没有劳动力，靠当地政府代耕。还分了三间旧瓦房，我记得母亲带我们去看了一次，在河边尾部梢子上，我们没有住过一天。1950年母亲就带着我们迁到襄阳县乔岗前岗八队，住五舅王彩书家。当时我在伙牌上小学，住在高恒山家。班主任姓傅，平时没时间去母亲那儿，只有在过年放寒假时才能过去母亲呆一段时间。五舅有三间草房，南北向，我们去后，五舅便请人在他房子的东面接了一间草房，让我们住，合作化前我们种了近三亩早稻田。后父亲调到武汉，带我在武汉上了两年的小学。父亲离开武汉时叫我回到母亲身边，一起生活。记得那是1953年，由县民政局补助14元生活费，我和二姐高志，都在刘河小学上学。母亲对我管得特严，有一回我没有上学，母亲罚我跪在地上打我，骂我不争气，不好好练书。从此以后我努力学习，成绩相当优秀，语文成绩总在98分左右。

右。1956年我们有三位同学保送太平中学，其中就有我。这时，二姐高志已被安排到襄阳专署拖拉机厂工作，直到退休。



此为1976年
10月高军母亲王玉
娥去世时，高军两
个女儿高江红、高
江清及儿子高江伟
(左)、高威武
(右)与堂兄之子
高正午(中，已去
世)外甥女熊红英
等合影

我参加工作后，母亲住樊城十字街，靠给别人看小孩(每月3元)生活。1963年我的大女儿出生时才将母亲的户口迁到我工作的单位——三道河水利管理局，跟我们一起生活。

1976年10月，母亲病逝，时年73岁，比父亲晚两年走。当时我借了80块钱为母亲买了一副桐木棺材。

整个家族的人都过来为她送行，包括我的外甥孙们。

五

关于后母谢绍文：后母绍文妈妈与父亲是战场上的伴侣。有一次与敌交手时，由于敌众我寡，撤退时，父亲右腿受伤过不了急流的河水，绍文妈妈水性好，便设法把父亲扶过河，脱离了敌人追捕，并护理伤愈，由此建立了革命的友情。绍文妈妈革命性很强，在家乡领导过农民起义，十八岁在本县当县长。一九四九年任宜城县组织部长，从武汉调北京后任八机部人事处长。一九七三年时，韩宁华（韩化龙的儿子）与市农机局李传新到北京找谢要了一台拖拉机，在十堰二汽提的货，是绍文妈妈写的批条。也是襄阳的第一台拖拉机。是李找到韩宁华一同去北京要的。因李是父亲的好友。父亲调武汉时把李的第六个儿子李重尧带到武汉管吃管住上学养活了三年，李家庭困难，还送了重尧日本军用毛毯一床。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襄江活塞厂当过厂长。我二女儿在厂里当过办公室主任。



韩化龙的长子韩宁华 1973 年在北京时的
的留影



韩化龙的女儿韩宁
荃

我二女儿出生后，由于经济困难，单位妇女干部做工作对爱人李冬芝讲：部队有一位团长无小孩，叫我们把二女儿送团长，她不同意，与我讲我也没同意。我们对她讲，既然生了就要养她，讨饭吃也要带大，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工人，由于本人艰苦努力，坚持工作，晚上有时加班十二点左右完成生产任务，坚持自学取得了大学毕业证，后来努力工作还被评为高级会计师。



高如松的长孙高江伟、孙媳胡琼、重孙高浩

宇一家人合影

大女儿高江红高中毕业，由于家里困难上了三技校，毕业后进了市肉联厂当了工人。自己努力边工作边坚持学习，考上了会计专业，带工资学习毕业后在单位销售科当了科长，由于自己的工作努力也评为高级会计师。

大儿子高江伟大学毕业后进市冶金公司八一钢铁厂工作，当了一段时间工人后调后勤处工作，评为建筑工程师，由于当时砸三铁的政策下岗了。二儿子高威武大学毕业进市水产公司工作，由于受砸三铁的影响破产，花了一万元调市商科所工作，后来仍然破产了。

可以这样说，父亲没有仗着自己的面子为家人谋私利，我们一家人也从未想过沾他的一点光。他调到武汉任职，没有安排我家一个人到武汉工作；他调到北京任职，我家无人进京工作。相反，只要见面，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给组织、给领导找麻烦。我们谨记父亲的教诲，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情，至今，我们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我们觉得没给父亲抹黑，心里感到很安慰。大儿子虽然下岗在家，可我的长孙高浩宇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到了大学，现分配在武汉工作，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看到这些，我相信去世的老伴李冬芝也会感到安慰。

老伴开始与我成婚她妈妈不同意，哭了几天说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怎么生活呀！老伴李冬芝自己很坚定，他对妈妈讲要饭吃不找你们。我没有让她要饭。在三道河管理局当仓库保管兼管汽油库。调襄樊来在我单位后来当储运科科长直到退休。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号因脑溢血去世，我对她下了评语：风雨同舟四八年，恩恩爱爱忆不断。工作勤奋人人敬，同志相处无闲言。我个人认为一切工作坚持就会胜利！！！！

六

父亲高如松是 1920 年结的婚，母亲王卫国（小名玉娥，别名高大姐，她是民间医生会挖草药治妇女，月经不调。不生小孩的最多给开三副药便可治愈。周围十里左右小有名气，民间都喊高大姐）。据母亲讲，王达三参加过茨河农民起义，大舅王理书是党员，是太平乔岗的党支部书记。二舅王通书也是党员，联系下磨石、篮家湾一带群众。母亲的大名叫王书娥，她说自己是党员，父亲对她说不能说自己是党员，就是敌人抓住了也不能说，死也不能说。她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父亲的人身安全，回到家里负责父亲的生活调养。我们自己也养了十来只鸡。夜晚陪父亲在家屋后山上散步改闷，父亲总叫母亲坚定信心，革命一定会成功。在家里带好娃们，革命成功了我就回来接你们。母亲相信父亲的话，便在白天利用给别人送药的机会了解敌人的情况。母亲是民间医生，出入方便。她送信到余家老馆家。也常去茨河上街谢家药房以买药为名送信给李澄清（当时是农民武装头目），叫他到黄家冲开会。苏家洲的苏家德，篮家湾的蓝伯达都是父亲的同学，母亲讲过外地的白同志（叫白俊生）也到黄家冲向父亲请示工作，共同商量事情。新中国成立后蓝伯达在咸宁工作。三舅王怀书也参加了共产党，他住狮子岸联系群众，了解敌人的动向，

父亲也说过不要讲是共产党，说了敌人知道后要杀头的。他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划为地主。四舅五舅都参加过共产党。母亲讲过实际上是个家庭党小组。父亲特别说抓住了死也不能说出其他共产党员。茨河伪政府胡大头等人说黄家冲是“共匪”窝子，为此在这儿抄了三次家。

新中国成立后，大舅和二舅、三舅都划为地主，王达三是农会会长，书上也没有写是共产党员，只是大舅王理书在书上写了个党支部书记。其他的也未写，二、三舅在书中也写过是共产党，他们都未背叛过党，也未出卖过我们。

后来我们搬到了下磨石，分了地，二舅和三舅都给我们家代耕过田。分的房子是草房，不像样子，我们没有去住过。当时个别村干部对母亲不客气地讲：不要当地主的防空洞。母亲受不了这个气，便搬到乔岗上前岗五舅家住。我回黄家冲，当地的友人说：你妈妈高大姐多好的人哟，怎么搬走了呢？我不知怎么对别人讲！



抚养过高如松的章哲卿（右一）晚年照

一九四九年六月，由二舅的大儿子王世太（大名王辅平）送我们母子三人，从小茨河下街生秋子上柴货船。

我们高兴地乘着下水船，不到中午就到了火星观码头下船，到了樊城十字街姨奶奶章哲卿家。过了约一小时左右，我要小便，便出门到下船的地方去解。可我没有记住回家的路，走不回去了，不记得拐弯就到，我顺着直路来回走，但我心里想着，我没有回主人家一定会出来找我。到了吃中午饭时未见我回，他们果然出来找我。回到家里，姨奶奶章哲卿开玩笑地说：把专员的儿子丢了，我怎么赔得起呀！天啦！叫我以后不要单独出门了，大家哈哈过后便吃午饭。我们住了有三天的时间，父亲太忙未过江来见我们。第四天下午，父亲过江在姨奶奶家见了我们，开始父亲很生气地说母亲：你是共产党员怎么骂人，你为什么骂我，为什么又哭又闹，来了就好吗？母亲也很生气说，我没有骂你，也没吵闹。父亲气稍平了，母亲也说：你不赌咒不在外边找女人吗，我在家拖儿带女多苦哇！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父亲心平气和地说：人家救了我的命啊！母亲讲：你把娃子都带走，父亲说：那怎么行，我忙得很，要工作，还是你带着好。下午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天快黑了，后来父亲和母亲谈话一直心平气和，谈完话如父亲还给了母亲十块钱。这次父亲与母亲如愿见面，是姨奶奶的撮合，她教过父亲，又抚养过父亲，为此，父亲对姨奶奶很是恭敬，她捎信让父亲早点来见我们，父亲第三天接的信，第四天就来了，记得我们在姨奶奶家又住了两三天，后由章培跃陪我们回的家，早晨四五点走的。

为了报答姨奶奶的养育之恩，父亲曾安排章培跃在襄北农场当过场长。但由于他没有文化，只当了三个月自己就回家了。

父亲又安排王世太（大舅的儿子王世昌）工作。他们怕，都没有干。后来参加了教育界教书。王世太在本地，王世昌在张湾教小学，成了襄阳县的模范教师，在55年调太平中学当教师直到退休，活了近九十岁才去世。父亲还经常训导侄男侄女，要本顺做人，多为国家着想。抗美援朝那年，国家四处征兵打美国鬼子，凡是去见父

亲的人，他都要鼓动报名参军，为国效力。记得有一次高如柄去见父亲，父亲问他的儿子恒辉多大了，高如柄说有十八了吧！父亲便说服这位族兄送儿子报名参军，说国家正处用人之际。高如柄听了我父亲的话，真把儿子高恒辉送到了前线，后来，恒辉还立了三等功。一同去前线的还有父亲的族侄高荣昌。绍文妈妈见如松为抗美援朝如此焦急，见人就动员参军，便写信给老家的哥哥谢绍武，让他了却如松的心愿。谢绍武接信后便到登记处报名，成了一位志愿军战士。父亲听说后，脸上一直充满了微笑。



高如松第二任妻子谢绍文在北京时的照片

七

前面写后母绍文妈妈是河南人，我印象中好像是开封市人，什么街具体地址就知道了。

王达三是母亲王玉娥的父亲，母亲是茨河黄家冲人，出生在王达三住的地方。

妹妹高天小，在河北省三合县一中从事教育工作，85年去世，弟弟高天明当过中国工业汽车总公司销售局局长，退休后养老。三弟高天亮是广州电子学院毕业，

出国留学回祖国后从事电器行业工作，现在北京，他的电话出国后变了，我的电话也变了，未联系上。

1973年春，我到东北佳木斯外调一位老干部的抗日战争中的历史问题，来回都在父母家住。绍文妈妈叫我好好工作，把孩子们带好，多读点书，将来才能干好自己的工作。父亲讲生活上要节俭，不要浪费。我上学时买一个烧饼的钱都没有，才起来干革命，我没有给你们讲。我去时韩化龙的儿子韩宁华在父母那里住着，天小妹妹也在家，照顾二位老人，父亲有病咳嗽，身体很瘦，身上披着棉衣陪我坐着，问我到东北搞什么？我说去了解一个老干部抗日战争的事。父亲说：那一定要办好，要想办好，就得重事实，不要道听别人乱说。因为父亲病重，不想多说话。韩宁华把我叫到另一个小屋批评我，不要说混蛋话，不要听别人乱讲，爸爸没有问题。在学校读书时连买一个烧饼的钱都没有，多苦呀，看到这个社会太不合理，才起来领导穷人闹革命，在最艰苦时跟党走，打倒不合理的旧社会。我说：我没乱说，便退了出来。父亲又叫住韩宁华，说起了宁华父亲韩化龙的事情。

父亲是1905年生的，应该是1920年（15岁，结婚时被子锅碗都是外公外婆送的）。那时确实穷，我看着父亲，很是心疼，父亲前半生为了革命担惊受怕，后半后却重病缠身。而我作为儿子却不能为父亲做些什么，甚至连多一点的钱也拿不出来，实在惭愧！

八

1982年春，绍文妈妈把她给襄阳地委写的信寄给我，想让父亲回襄阳安息。我找过尚立学，他批给市民政局，我也找了范局长，陈隆友局长，他们同意在隆中任何一个地方安排都可以。后来谷城县有人去讲，在谷城县建烈士陵园，安排父亲，信在我这里，到现在不了了之。



我是 1938 年 2 月 10 日出生的。大舅王理书，二舅王通书，三舅王怀书，四舅王玉书，五舅王彩书，母亲叫王娥书，母亲讲过多次，结婚时她十七岁，父亲 15 岁。应该是 1920 年。

父亲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父亲姊妹三人，两个姐姐，我没有见过两位姑姑；爷爷叫高德贡，我小时候听一个伯伯说的，别人叫他贡爷。

当年与高如松同在蕪

山开展农民运动的宜城县

委第一任书记胡培洲

父亲是 1974 年 5 月去世的。1992 年 6 月我到北戴河疗养，到北京再次见到了绍文妈妈，绍文妈妈哭，我也哭了，我们一起到北京八宝山，买了鲜花祭祀父亲。回家吃中午饭，绍文妈妈特意买了一只北京烤鸭还有熟食，特意打电话叫大弟天明回家吃饭，我听他说话称没有时间，绍文妈妈说不行，高军从湖北老家来了，你一定要回家吃饭，天明回来吃饭，我们高高兴兴地见了面，说了很多话，绍文妈妈和弟弟两人给我夹菜。弟弟对我说多住几天，来一次不容易，我单位有客人，不能久陪，得先走了。我说：你忙去吧！我们握手言别，难舍的分开。



高军（左二）与市史志研究中心原宣传科长梁发双与胡培洲长孙胡治明（左一）一家人合影（右一为高军次子高威武）。



从右至左依次为胡
培洲长孙胡治明，长孙
媳李光芹，重外孙刘胡
杨，曾孙胡敏，曾孙婿
刘建波。

我从北戴河回来，我们的团队住北京西郊部队招待所，我几次抽空去绍文妈妈那里，我没有让绍文妈妈再给弟弟打电话，我知道他太忙，只是让侄儿子华华一起吃饭，绍文妈妈叫我努力工作，不要出事。教育孩子多读点书，才能工作好，我走时给了侄儿五十块钱，侄儿说不要，我强勉塞进他口袋里，他又拿出来给我，绍文妈妈说不能要，你也没有多余的钱，我又塞进侄儿子的口袋，绍文妈妈快速把钱拿出来还给了我。

我走时没有让绍文妈妈一起去八宝山。我怕她受不了，我一个人去的，买了鲜花祭祀父亲。

绍文妈妈对我讲，谷城县的同志对她讲过说准备写父亲的传略，还说：“父亲的好友黄火青同志也对谷城县讲了要他们写父亲的传，我也不知道谷城县写了没有”？我说：“暂时没有。”绍文妈妈说：“你父亲风风雨雨一辈子，为了找党，吃的不是苦，我听了就流泪。一定要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做个念事。”我拉着绍文妈妈的手说：“放心，政府会考虑的。”为让绍文妈妈不再挂念，我安慰她说：“或许正在写”。绍文妈妈勉强地笑了笑，嘱咐我完成这件事情。



佳木斯市

谷城县

高军 1973 年到佳木斯外调时的留

影

绍文妈妈是 1998 年去世的。父亲写的有书，在 1972 年以前就出版了。我姐夫熊继川到北京学习时到过父亲家，见到了那些书，父亲给他，他不敢要，怕在“文革”时期牵连自己。他回襄阳后父亲给他写信，说想回襄阳休息，熊不對我讲就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保护父亲，担心出事。他当时未对我讲这事，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对我讲。还说他去北京看望父亲时父亲还嘱咐他回后看望宜城第一任县委书记胡培洲的事情。父亲说，他在襄阳任专员时曾把胡培洲的遗孀龚传英接到襄阳，想安排她到居委会工作，可龚传英说在城里过不惯，没有去，执意回到了乡下。这一别就未再见面，想起来很是愧疚。当初胡培洲在谷城当铺搞农运，自己曾和他同住

在一个屋。现在自己侥幸活了下来，一定要得起为了今天而拼了命的同志。父亲嘱咐熊继川，回后一定要找到胡培洲的家人，想办法帮帮他们。姐夫很讲诚信，后来几次到宣城，找到胡培洲的老家，见到了胡培洲的后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去北京时父亲也对我说过帮帮胡培洲的家人，但我没有力量，主要靠姐夫熊继川跑。（余益庵住公安局，我去见余和杨进，二位老人对我很热心，我走时叫我多去玩。张金宝住襄阳南街）。

一九七三年春，我受单位安排到东北的佳木斯调查落实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的老干部王又春同志的历史问题（他是中医在当地名声大，医术高明，以行医为名，走街串巷传递党的情报，联系发动群众抗日，当时敌强我弱非常艰苦，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在三道河时，他住的离我的家很近，我母亲王玉娥病危只吃了王老的两副中药就好了）。调查后作了正确结论。王老的大儿子王大同当了南漳县一中学校校长，后调襄阳四中任奥赛班主任。小儿子王文同（小名王小同）从南漳财政局调湖北省财政厅工作。后来当了省财政厅正厅级干部。



高军二姐高志（右一）年轻时
与母亲王玉娥（右二）及家人高恒
秀（左一）、易德英（左二）合影

自我从北京回后，我按照绍文妈妈的心愿，多次到市档案馆和市图书馆查找有关父亲高如松的文件和文字资料，并复印保存。我是单位主管政工的负责人，多有机会接触红色史料，数年来，我一直惦念着父亲移葬谷城的事情。

一九八〇年我到东津去办事，见到了一位姓尚的同志亲自对我说我父亲去过他家，农民起义时用过的一把斧头还在他家一直保存着，可惜了！我当时没有向他要，我也想过怕人家不给，后来我打听多次未有问到尚的住址。我与梁发双，孙久全去过东津，是李实的孙子李宇带我们去的。我要了李实小女儿李满的电话，并与其通了话。我想请她出面把当时的李家药房作为红色景点办起来，后来她的联系方式变了就未能再联系上（她住湖北省农学院，还健在）。

后来，我找到绍文妈妈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给我的一封家信，让我关心大姐们，也略谈了对北京当时的看法，他说：一切问题党中央会解决的。他们在北京也安全，叫我照顾好自家的家。

九

襄阳高氏文化研究会方面，自高中华同志担任会长以来，十分重视高氏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尤其对我的父亲鄂西北早期革命领导人高如松历史的挖掘和编纂作了细致安排，这使我对出版父亲传略的信心倍增。我无时不在搜集父亲高如松的革命活动资料，并倾心搜集着有关父亲及我姊妹的照片。几年来，我先后从舅舅家得到了我二姐照片。

戴围巾的女同志是我二姐高志，紧靠着二姐抱小孩的老人是我母亲王玉娥。靠高志抱小孩的是高荣昌的爱人，叫易德英，另一位抱小孩的我们叫小姐，（抗美援朝时是部队首长的警卫员的小姐，我叫不出名字）。

樊城区太平店镇龙巷村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章红珍得知我在搜集高如松的相关资料，专门为我提供了父亲当年隐藏过的章家房屋照片。如下图：



稿 纸

今年二月十六日是吾师董贇烈士牺牲后廿二年。谨写此文以誌追念，并生亦如松的。2.16日

吾师董贇烈士，在“四二一”运动后，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份子，进到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党奋斗。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终因执行革命任务，被反动派逮捕而牺牲。当其身处敌强我弱，社会腐朽的军阀统治区内，为革命需要，常与军阀诸种矛盾委蛇，在周旋应酬中，能傲然独立，绝不屈服，并特从中取得革命工作便利，其斗争艺术可称巧妙。

吾师董贇烈士之为人，品性高，胸襟开阔，志气高昂，肝胆相照，人亦对劳苦大众，如水相融。其对革命同志，解衣推食，莫大公无私之精神，感人至深。忆吾师在狱中，被反动派囚禁期间，牢中确实家庭贫苦，无乃缴纳学膳费者，吾师慨然解囊相助，我亦其中受惠者之一。其慈祥形象至今仍然萦绕于我的脑海。

忆吾师这些珍贵，已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

鹿会乡人民政府 地址：鹿会乡门后街 电话：513097 513922 邮编：441021

稿 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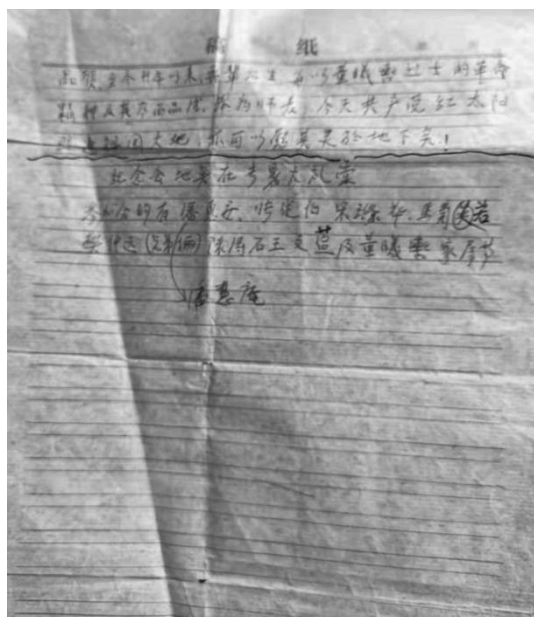
今年二月十六日是吾师董贇烈士牺牲后廿二年。谨写此文以誌追念，并生亦如松的。2.16日

吾师董贇烈士，在“四二一”运动后，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份子，进到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党奋斗。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终因执行革命任务，被反动派逮捕而牺牲。当其身处敌强我弱，社会腐朽的军阀统治区内，为革命需要，常与军阀诸种矛盾委蛇，在周旋应酬中，能傲然独立，绝不屈服，并特从中取得革命工作便利，其斗争艺术可称巧妙。

吾师董贇烈士之为人，品性高，胸襟开阔，志气高昂，肝胆相照，人亦对劳苦大众，如水相融。其对革命同志，解衣推食，莫大公无私之精神，感人至深。忆吾师在狱中，被反动派囚禁期间，牢中确实家庭贫苦，无乃缴纳学膳费者，吾师慨然解囊相助，我亦其中受惠者之一。其慈祥形象至今仍然萦绕于我的脑海。

忆吾师这些珍贵，已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

鹿会乡人民政府 地址：鹿会乡门后街 电话：513097 513922 邮编：441021



高如松
二女儿高志
与女婿熊继
川



高军

1964年携妻
子李冬芝(后
左)与二姐高
志(后右)合
影

十、关于我的几个舅舅

我的大舅王理书、二舅王通书、三舅王怀书、四舅王玉书、五舅王彩书及母亲王玉娥都是父亲高如松发展的党员，为了保密，父亲嘱咐不许对外说，就是死也不能说出其他党员的名字。为此，我的几个舅舅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自己是党员。后李澄清于1986年2月给我来信中提到了此事，其中说到了我大舅王理书、二舅王通书，称他入党就是我大舅介绍的。过去，我只是听母亲讲过这事儿，由于没有文字依据，我就没对外说。现在李澄清也证明了，我就可以正式对外讲了。现特把此信附上。

朝平同志：
高舅同志你好！
你向来信我收到，读后尽知。
天津黄河革命开始时间是1927年农历9月初。地点在山西祖
父高家，发起人是我父亲。当时化名王大明，首先建立地下党组织。
我大舅王理书是中心，以便发展地下党人，我就是王理书与王通书介绍的。
我前次和我父亲见面，问在山西祖家书房。为了严格保密都是单独
接见的。到1928年的春季，以父亲以拜师为名在太原开委员会，由王通书
以清李密为名介绍。与你父亲有联系，这开会地点
在山西祖家后山。雇地，到会的有王志明、王理书、王通书、王彩书、
王景源、王以周、王伯志、李景源、刘正中、吴成保等；开会目的打
大仗，政便利，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组织群众，对外不提党，以
农民协会名义，即与山西国共合作进行介绍。与北负责，谁负责，
谁负责，由我父亲。董庆华、陈永清、上下崖子、苏永清。组织
很密，不公开。组织不公开。任何情况向农民报告，与王

近三时夜三景看报、书记王理书、指导员王子光、支部支培清、刘业中、孟尔清等人。会后党员百余人，在1924年经历三月二日国王
图书、宋国光、暴动、当时在干达二派并去宣布在区城与政。口号打
倒土豪劣绅，要求地主把地租，穷人养活下去，吃大户等。当天到至
牛特，第二天由马永沟、泥尔坡后庄淘泥湾到茨河与到匪巢
在干达费身布坊、马城以取白人进利矩敌向某处，突然发理后
以干部后撤，情况不明，前赴已内应，又礼后援，情况甚急，以此
原路后撤是有的，决是不以流水的，静尔河、自派冲激
速去呢到马永沟庄在花村村，第二天隆德去永沟党员员方
后撤是到总部探报，这给领导已先撤去，同时派中帮
级匪巢到处捕人等。
大敌的包围，没有快能，不到至半路时时间，给
敌人留空子，不强给有极而五分。敌人抄大部追至响应
及总暴动意义，4没有打没想总结，只有分之，物成结果
失败。以干某河的存在。

另外，还是在文革时期，由史后在襄阳、南阳、谷城、光化等地
活动，七十年代打拉山，九里坪，盛家坡，石花子等。这些地下
党组织是下基础。

再后来王辅平来信问我母亲是否是在黄河边，
王辅平与张信是兄弟，当时不是我说不能把信交给任何
人，黄河上经常有交卸解一，我当时不清楚，原因当时工
信总归要回地，当时也经常有信，我们到黄河，他们
找兵劫，结果兵吃了大亏。所以这一次被抄，我也没有很找。
我在当时，就在阳泉，把着法，与剪石与避难。

王辅平口说无凭，请着底下转给李平看。

我想到成河这一代人，在反右的肃清下都要到这样那样
地步。取消政治生命，到现在无生身之地。

以1927年至1937年大反后，李密仁湖北进行暗杀活动，
鄂北胡景峰陶翰副记，鄂北满河司令李板才。当时李
密仁受打要反翻天了，当时能伸，用调花着山计。

为我无干。我的总结失掉的原因，没有根据，又写错了，刘
和打建书，当时党也不指示，到1949年解放，我为党工作
二十二年，到民主改革时，那位工作组不承认，叫二
后有地下组织，以我的身份定案，我的罪很大，小柳和
女有戏，遇信到信有戏，三自一包回来由有我同志，这
都真的很认识—— 敬祝何年平安。

我时期是压迫在院治疗，而手民却不听我指
导了。

请代候地方表亲友，

李平清

86.2.4

以上这些资料都很珍贵，它既展示了父亲高如松对革命同志的尊敬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用亲历者的证明

还原了当时真实的历史，借此书出版之际特附上以飨读者和亲朋好友们。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高军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口述，张璞整理)

六、难忘的关怀

高如松嘱咐女婿熊继川帮助胡培洲家人二三事儿

胡治明

我叫胡治明，是胡培洲的长孙，从小我就听我奶奶和母亲讲述过爷爷胡培洲的革命事迹和高如松、余益庵两位前辈对我们家的关怀和照顾。这里，我只写一下我知道的高如松爷爷安排他女婿熊继川寻找并帮助我们一家人的二三事儿。

据我奶奶龚传英讲述，宣城刚解放不久，即 1949 年秋的一天下午，县政府派一个同志把我奶奶接到县招待所里住下，叫我奶奶等一会儿，说：“金县长过一会儿要来看您”。约半个小时后，这个同志把金县长引过来了，金县长到我奶奶跟前问：“您就是胡培洲烈士的家属吧？我是县长金×华（中间那个字记不得了），今天我接到襄阳行署余专员的电话，叫我明天到行署参加县长会时把您带过去，说高专员要见您。”我奶奶问：“哪个高专员？”金县长说：“就是高如松专员。”我奶奶一听说是高如松，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后金县长便安排我奶奶在招待所住下，说：“明天吃早饭后就走。”

第二天早饭后，我奶奶就和金县长坐了一辆雇来的马车到了襄阳行署。之后，金县长先把我奶奶引到余专员的办公室，接着，余专员又把我奶奶引到了高专员的办公室。高专员立即起身相迎，口里喊道：“嫂子，这些年您还好吧？”奶奶说：“好好好！”高专员又说：“培洲兄年长我一岁，我叫您嫂子您不会怪吧？”我奶奶忙说：“哪里哪里，您当了专员成了大官，叫我嫂子是瞧得起我，哪敢怪您这位大专员呀！”相互问候过后，高专员便向我奶奶说起了他和胡培洲是在襄阳二师学潮

时认识的，两个人都是学潮的积极分子，并且都是在谢远定介绍下于 1925 年 10 月第一批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后来，胡培洲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直到 1930 年 7 月胡培洲把中共宜城县委会迁到新街后才又在新街见过两次面。高专员说：“1931 年 4 月，胡培洲被中共鄂北特派员到谷城后，我先安排他到白庙沟学校里，他的公开身份是教员，实际上是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来没让他教书了，便和我还有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庭兰，我们三人到乡下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得差不多了，我们都转到了蕪山洋人堂，就是外国人走时留下的别墅。后来，我们把谷城县委会也迁到了洋人堂，从此我们三人吃住都在一起。白天分头到各乡开展农运工作，晚上便在这儿会合。直到 1931 年 11 月蕪山被敌人占领，我和胡培洲、李庭兰两人被敌人打分散了，我侥幸活了下来，胡培洲和李庭兰却都牺牲了。我对不住胡培洲啊！胡培洲是我的好兄弟，好兄长，好战友，我没有保护好他，他帮助我们建立蕪山根据地和县乡苏维埃政府，没想到自己却牺牲在了谷城”。奶奶流着眼泪，说了很多互相安慰的话，高专员又问了我奶奶的生活状况，听后连说：“真对不起嫂子和您的女儿啊！”谈完家常，高专员便跟奶奶说：“为了你们娘儿俩不再受苦，我和余专员商量决定，把你们全家搬到襄阳来住好吗？”奶奶说：“我不识字，来做啥子呀？”高专员说：“您不识字，我们给您安排到街道居委会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姑娘识字有文化，我们另外给她安排工作，您看行吧？”我奶奶听后说：“不想给您和余专员找麻烦啊，我和姑娘还是到雷河老家过日子好！我们的亲戚家门都在那里，有个啥事都互相知道，也能够互相帮衬，不用两位领导操心！”高专员和余专员再三相劝，我奶奶硬说到城里过不惯，不搬到襄阳住。高专员见此，便征求了一下余专员的意见，余专员也只好同意我奶奶的意思。高专员最后说：“你们不过来也可以，但你们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会让当地政府帮你们解决好。”

说到这儿，高专员又对我奶奶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征求您的意见哩！”奶奶问：“什么事情？”高专员说：“出卖胡培洲的叛徒被抓到了，想问一下您，这个叛徒是押到你们宜城枪毙，还是就到谷城枪毙？”我奶奶说：“培洲人都死这许多年了，不管在哪枪毙都行。没必要押到宜城吧，那多麻烦？就在谷城打了算了！”高专员和余专员两人都说行，就叫谷城公安局把那个叛徒枪毙算了。说完这两件事后，高专员又对我奶奶说：“这两天您就到襄阳玩，来一趟不容易，况且您还没有来过。等后天县长会结束了，您再和金县长一块回去。”就这样，我奶奶便在襄阳玩了两天，第三天和金县长一块回到了宜城。

下面我再说一下高如松爷爷的女婿熊继川叔叔寻找和帮助我们的事情。

那是1982年秋末的一天，时在襄阳公安处工作的熊继川叔叔到武汉出差，顺便到武昌武珞路小八栋的省委家属院去看望余益庵爷爷的遗孀杨进，正好我妹妹胡治玉中学毕业后被杨进奶奶请到她家给她做伴，杨进奶奶便向继川叔叔介绍说：“这是宜城第一任县委书记胡培洲的孙女。”继川叔叔一听，忙说：“我找了好几年一直没找到她们家，今天真是巧遇，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胡培洲伯伯的后人。”当时，继川叔叔向我妹妹要了我们家的住址，并对我妹妹说：“回襄阳后一定抽时间到宜城去看望你的父母家人，看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的，我一定尽力”。后来，继川叔叔回襄后果然抽时间来到宜城，找到他认识的宜城城关中学的一名老师（杨世健的孙女婿，我忘了他姓什么。杨世健曾任过宜西特区委书记，1932年牺牲，胡培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该老师用摩托车把继川叔叔送到雷河和平村我的家里，后因还要上课没有吃饭就走了。继川叔叔问我母亲，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我母亲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娃子们由于是农村户口，工作一直不能转正。”继

川叔叔吃过午饭后就急着到县城去找有关领导。我把他送到雷河街北头的大井那里等班车。下午他到县城后就找到县工业办公室主任杨超同志，请他把我从粮食系统调到他所管的工业口里工作，说我在雷河粮管所干了7年还没有转正。杨超主任说：“他不是正式工怎么能调到我工业上来呢？等他转正之后，我可以把他调到县城单位工作。”由于我不是商品粮户口无法转正，因此调动之事也就落空了。接着，继川叔叔又利用他的关系找到宣城公安局长徐良勇（继川叔叔说，徐良勇1950年和他在武汉湖北革命大学是同学，毕业后，继川叔叔分到襄阳行署公安处，徐良勇分到了宣城公安局），继川叔叔把我们家族和我个人情况向徐良勇局长说了，请他帮助我转个商品粮户口，便以我转正。可徐良勇局长说：“我这个公安局长还没有权力给任何人把农业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转户口的权力在县里，我实在给您帮不上忙。”就这样，我转户口的事情也搁浅了，我继续当我的亦工亦农。继川叔叔听说我爱人还在另外一个乡镇学校教书，没有和我在一起，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才能回家。接着又找到县文教办的张主任，想请张主任把我的爱人从郑集调到雷河。张主任得知我的爱人不是正式工当即一口回绝了，说：“民办教师根本不存在调动问题，如果是公办教师，我可以把她调到雷河去，但她不是公办就不能调动了。”

以上几个问题虽然都没有解决，但继川叔叔却为此跑了无数趟路。他一心想给我家办事的热情劲儿令我感动（他已于10年前去世，这使我常常怀念他）。想起来，他确实尽了努力。后来，没有办法，1983年我自己硬着头皮找到黄保发县长，批了一个指标，后被分配到板桥水泥厂，隔河过江，搭班车还要过轮渡，而且每天只有上午、下午各一班车，上午错过了，就只能乘下午那一班。上班很不方便。我把我的想法跟继川叔叔说了，我说不想到水泥厂上班了。继川叔叔又到杨超主任那里

说情，杨超主任亲自到劳动局找一位姓汪的局长，这才把我调到县城。回想起来，是继川叔叔给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非常感激他，不然的话，我还在离家乡 70 里远的板桥店工作。而继川叔叔却说：

“他是受他岳父高如松之托才这样做的，因为只有这样做了，才对得起躺在黄泉下的岳父大人和胡培洲烈士”。

目前，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十分幸福。值得安慰的是，我的女儿胡敏（即胡培洲的曾孙女）竟成了襄阳一中的一名教师，而这所学校的前身正是当年高如松爷爷就读的鸿文中学。

前不久，奇特的因缘又让我和高如松爷爷的长子高军叔叔见了面，我把这些谈出来，八十五高龄的高军叔叔把高如松爷爷当年如何交代他和姐夫熊继川寻找胡培洲家人的事谈给我们听。我如痴如醉，想着高如松爷爷在北京身居高职还那样关心着我们，他的一家人遵照他的嘱咐又那样帮助着我们，心里总是充满一种幸福和感激。

现在，我和高军叔叔都已进入暮年，记忆力也有所衰退，但心里对高如松爷爷的那份怀念却一直健在，而且从未有间断过。

胡治明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

贺《鄂北赤子高如松》出版 跋

高先超

昔太史公作传，皆属祭将雄文，宣拓帝王洪业之功，铭其丈夫之志以垂之不朽。惟国之栋梁，方公诸其人。公遂自成一百三十卷，成一家之言。尤其五体结构编纂文体，对诸子列传加以适当评论，一直为正史所仿效，秉承至今，致《二十六史》文体以同攸。今读《鄂北赤子高如松》，张璞先生行文平直，丽藻不多，淡雅有余，其间亦见公正评述，令人欣喜，其临事立挥之捷，令吾若在史公之堂者哉！故恍然有感，吮毫书跋，唏矣慨言，以同悼鄂北革命先驱高氏如松，惟如是也！

高如松者，湖北谷城县人氏也。正如《传》所谓取如同松柏正直有用之义也。若以族言，即吾茨河高家垭高公，自幼侷傥有志，气度不凡。读书时便起“鸿文学潮”，“五·卅”运动中已露头角，由谢远定介绍入党，与董振、李金铭、李绍棠、李庭兰、胡培洲等同为蕪山农民运动创始人。他亲率李晓葛、李凝、李陶庵、王达三、傅春泉、姜步瀛、李世贵（即李庚尧）等农民军大举盛镇、茨河暴动，继而攻打谷城县城，身经百战，奋勇杀敌，叱咤风云，威赫一时。然摘其精华，可存者仅一二卷而已，甚为缺憾。幸有张璞先生东奔西走，撙文考证，又搜集不少失阙，写出迄今最为全面、最为信服之传，使高如松生平诸多细节得到详解，令吾族推尊者甚至，若言如松，当紧依此传是赖。

高如松去世已四十余年，于鄂北之斗争相距百年，年世久远，诸多遗物经于兵火，鲜有存者，故英名伟节

得以不泯，全仰研史志述者功焉。然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各级党史部门不断走访，搜集鄂北乃至蕪山革命斗争文存，并陆续刊印出张天儒《信念如磐高如松》、刘家国《高如松同志传略》、严华山、李启吾、王志成《高风亮节如松长青》，使高如松生平渐为人知，广为人传。或襄阳，或武汉，或热北，或北京，高如松大名轰若雷霆，功勋敢揭日月，史册所载，美不胜收。今《鄂北赤子高如松》再付梓于世，后先辉映，何其盛欤！

古之立传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神同貌合方能托以不朽。《鄂北赤子高如松》善议论，表气节，所言皆与吾族高公如松性情契合。列传卷帙传入太平龙巷村和茨河高家垭子后，闾巷田里竞相传诵，人所快睹而称信者众焉。

高公如松自1923年首举鸿文学潮，至1926年2月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正式转变到领导鄂北革命运动上来，革命活动若汪洋浩博。10余年间，其殚精竭虑，仆之心力，尽于信仰。从戎之初，拯民国之横流，扶共和之沧桑。破昏荡疑，拒邪归正，功绩隆盛。旋遭缉捕，襄阳、宜城隐蔽不成，遂辗转上海、江西寻找组织，至死不渝，“抱忠忘躯，犹松卧雪守节，令人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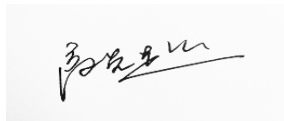
循其经历，尚重名节。1937年夏，高公如松病愈。时赵歧周来信让他到北京或上海去住，看看书，生活上由他们接济。高公如松听后婉而拒之，面对赵、韩皆过着奴隶般生活，何敢受之馈赠。可见心中所奉惟自立而已。新中国建立后，高公如松调北京工作，身居高位，仍傲骨丹心，为人处世，若松正直，无一讥讪留人，故其一生与松有深契也。

呜呼，高公如松之功非一文而能尽显，亦非斯传而能尽叙。自古良臣有传尚矣，求其全者皆不多见。此《传》将高公如松于谷城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之斗争基本道尽，惟如松调热北和北京之经历欠丰。如松长子高军剖因，称北京方面一直失去联系，故如松手迹及热北相关资料惜缺。然《鄂北赤子高如松》虽非完帙，但

必无讹阙，且引据独多，传承之功可谓伟哉！深味是《传》，不仅可享纯正、典雅之古人文风，其文字读之亦不忍释手，由此敬重之情可知之矣。夫愿读是传者，当戮力张扬高公如松之光华，立高公如松之品望，续高公如松之文章，践高公如松之信仰，砥砺前行，让高公如松之忠节响天下万世也，如日经天而不容旦夕晦焉者也！

嗟乎！吾望后辈尽存珍藏，将此卷帙广留后世，代代相传耳！

湖北高姓文化研究会 执行会长



敬跋

公元 2022 年 3 月

后 记

本书是高如松长子高军老人应其母亲谢绍文生前要求，委托我写给后人人们读的一部高如松史料，根据是高如松的《我的一段经历》、李晓葛的《蕪山红旗永世飘》（手稿）、李庚尧的《对谷城革命斗争的回忆》、傅伯绩的《蕪山农民暴动之回忆》、李澄清的《关于茨河农民暴动之回忆》及王辅成的《蕪山烽火——回忆蕪山革命斗争的

前前后后》、温志明提供的《高家垭子的传说》、韩文奎提供的《韩庆英所谈高如松资料》等笔记和高军老人的回忆，因此简单、质朴，没有顾忌，没有渲染，如一杯淡茶，品尝的只有不起波澜的缕缕云烟。但它记录的一大半却是从1923年到1937年间鄂北土地革命的斗争史，后一小半是关于高如松本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上海、江西寻找党组织的经历，是他自己的亲见亲闻。

书中第二部分（1926~1927年从襄阳县委至盛家，再到蕪山），很大程度上引用了李晓葛的回忆手稿，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个手稿才能算作蕪山革命斗争最真实的史料，所以引用篇幅较大。再就是高如松的《我的一段经历》，这是本书的蓝本，是高如松自己对那段寻找过程的陈述，几乎没有一点隐瞒，其间对韩采芹（韩化龙）、赵歧周的介绍，全属真实，为此读完后让我感到高如松是个诚实且讲原则的人，是个敢说真话的人，以此更加引发了我对他的景仰。书中关于茨河暴动和王达三的情节，多源于高军老人的回忆，经查历史资料，基本与史相符。值得说明的是，书中不少情节可能与市面上流传的不一，这是因为作者统览回忆者的手稿后所作出的甄选。如关于李庭兰的死，很多传略上写的是其到房县后主动请战，带领120人回谷城恢复根据地，返途中于旋风山战斗牺牲。而亲历者王辅成在他写的《蕪山烽火——回忆蕪山革命斗争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则这样写道：“在决定往房县撤退之前，红军伤了一些人，派了四五十个夫子抬担架送伤员到房县。夫子们到房县后又要回来，政治部又决定叫李庭兰、邹国华、帅本朝送他们回蕪山，回来后看到

各地都成立了刀子会，属县里组织的，专门杀红军。李庭兰、邹国华等人在此地不能存身，勉强躲了几天，又准备上房县。他们一走，刀子会的人就追捕，一直追到天子垭，又有蔡老九的人追上了。李庭兰穿着长布衫，走到悬峰山上坡时，甘峰的刀子会又追上了……李庭兰来不及逃跑，在此牺牲了。帅本朝回头一枪又把杀李庭兰的那个凶手打死了，从此蕘山革命失败了（见《蕘山红旗》第99页）。”因王辅成是此事件的经历者，说法比较准确，所以，本书便以王辅成的回忆录为准，以此类推。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为使本书最大限度地得到完善，我们在此书出版之前（2022年4月28日）特意邀请湖北文理学院王奎、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叶朝、襄阳市第一中学周满工、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梁发双、襄阳高氏文化研究会高中华、茨河镇陈红、陈尚启、王娟、襄州区史志研究中心孙久全、宜城市史志研究中心吴德志及鼎力印务孙康敏等专家、学者，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研讨和校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了襄阳史志研究中心梁发双老师的帮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审读，并提供了高如松手迹等相关资料；谷城县档案馆、谷城县茨河镇政府、宜城市原党史办常务副主任吴德志、襄州区原党史办副主任孙久全及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赵乾文、襄阳高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高中华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读；湖北省高氏文化研究会和襄阳高氏文化研究会及海南悦安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瑞、湖北杨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程等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璞 2022 年 11 月于襄阳